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道格拉斯·C·诺斯著

● 刘守英 译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当代经济学译库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沪)新登字 117 号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根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版译出

责任编辑 虞 红

封面设计 宋珍妮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

刘守英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印数: 1-3000

ISBN 7-5426-0661-1 / F·156

定价: 9.00 元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社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 当代经济学文库；(2) 当代经济学译库；(3) 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 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

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的话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译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的一部新作。道格拉斯·诺斯这个名字对中国的经济学同仁来讲，也许并不陌生。在短短的几年内，他的几本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与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理论章节，就已先后在国内问世，并引起较大反响。连同这本新作，我们已基本上能了解诺斯的制度经济观和理论演进历程。

同以往几本著作相比，这本新作尽管篇幅不大，但可以说它已集诺斯思想之大成，堪称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给出了一个用于分析制度的理论框架。通过将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联系，从而实现了制度方法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整合；它更全面地探讨了人类迄今为止为

了便利相互交往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制约形式。在这里，那些以“文化”形式沉淀下来的对于人们的交往不可或缺的非正规制约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诺斯通过将这些非正规制约与人们的行为决策巧妙地联系起来，从而为经济学家用经济方法来分析非正规制度的作用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此外，对制度的实施能力及其效果也引起了重视。有大量的制度规则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制度选择的因素外，实施制度的机制和能力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种新的制度如果用与之背道而驰的老的组织来执行，显然会适得其反。正是由于有前面的方法及对制度制约形式的全面探讨作为铺垫，诺斯的理论才能更现实地透视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并能比较理性地看待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正如诺斯所指出的，各个国家由于其文化遗产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差异，就决定了它们走不同的道路。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来讲，产权的明晰程度对其经济绩效的好坏确实影响甚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产权的明晰程度也是其他制度(如非正规规则、政治决策规则和统治者偏好等)的函数，因此，无论是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症状，还是从事制度改革，如果不注意各项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走简单地照搬和引进某一国家的单一

制度，必将失败。

诺斯的理论和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的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不再将现代市场经济视为人类的恶魔的今天，意识形态的障碍将会减小，但是，制度的选择与实施能力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各种制度(明晰的产权结构、民主的政治制度、发达的交易规则)的组合，我们既要解决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组织的低效，又要改变原有权利结构在演变中导致的社会不公，还要为便利经济交易创造更为有效的制度。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讲，在中国这场大转变时期，更应实实在在地分析和记载目前各种制度的演进过程和结果，通过先进研究方法和我们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使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对于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的几位朋友：林毅夫先生将此书的英文版从美国带回来并推荐给我；上海三联书店的陈昕先生为本书在国内尽快问世作了大量工作，以及虞虹小姐对本书所作的认真的编辑和联络工作。

刘守英

1993年4月19日于上海

前 言

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中去，是推进理论与历史的实质性一步。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概要。尽管它是建立在我过去 20 年关注的制度研究基础上的，但它在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它们是怎样变迁的方面要比早期的研究更加深化。本书大部分分析的核心是，对什么是制度，制度与组织的不同，以及它们是怎样影响交易和生产费用的予以准确的说明。

我们要集中研究的是人类合作问题——尤其是那些作为亚当·斯密《国富论》核心的允许经济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合

作。制度的演进为解决复杂交换时的合作方案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它决定了经济增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合作都是社会生产性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本研究在解释制度框架的演进时，对那些诱致经济停滞和衰退的部分比对那些诱致经济成功的部分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我的主要目标是要形成一种接近问题的方法——这是衍生出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所必需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有很大部分是致力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我在研究中包括的历史是例证性的，它们被用于展示这一方法的前景，但它们还远未提供对各类假说的检验，而对这些假说进行检验则是最终必须要做的。尽管本书的主要对象是给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但我相信这里的论点对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同样有意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已力图把经济学术语减到最小，并使分析让非经济学家也明了。

有许多人在本书思想的发展中起过作用，在此我简直难以说清应从哪儿开始感谢他们。本书初稿草稿是我在作为国家科学基金并BNS8700864资助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成员时写成的。G·林德泽，B·斯科特及其工作人员为这一事业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我尤其要感谢C·巴格斯特，他

向我不厌其烦地灌输了计算机的神奇性(它使我能更好地写作)。R·基奥恩、S·克拉斯纳、M·马希那、K·索科洛夫都对本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都是那一年该中心的成员。

我还要特别感谢B·温格斯特和J·奈。我同他们讨论过这里所发展的许多思想,他们还几次阅读和广泛评论了本研究的草稿。

当我正在撰写本书初稿时,我曾阅读过T·埃格山在《经济行为与制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精彩评论。他的研究澄清了我正在思考的许多观点,并帮助我勾勒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其他同事——L·贝纳姆、A·登扎、J·德勒巴克、G·米勒、N·斯科菲尔德——他们都阅读了早期草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还有其他几位也阅读了早期草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他们是:J·阿尔德、R·贝茨、R·埃利克森、S·恩格尔曼、P·霍夫曼和M·莱维。不过,我要感谢的远不止读过初稿的这些人。在过去6年里,我还将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在会议和大学座谈会上提出过,并得到过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也决定了我的研究议程。

刘跃华,特别是W·特勒斯肯、B·汉森

都是勤奋的值得信赖的研究助手，A·米尔福德为初稿草稿付出了长时间的艰辛劳动。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 E·凯斯将我的一些粗糙的文字译成英语。不仅如此，她还忍受了我在本研究进程中的情绪波动。

道格拉斯·C·诺斯

1990 年 1 月

目 录

经济周期理论

出版前言
译者的话

MULU

第一部分 制度

1 制度与制度变迁	
导论	3
2 合作: 理论问题	14
3 制度理论中的	
行为假定	23
4 关于交换的交易费	
用理论	37
5 非正规制约	50
6 正规制约	64
7 实施	75
8 制度与交易和转化	
成本	85

第二部分 制度变迁

9 组织、学习与制度	
变迁	99
10 稳定性与制度	
变迁	111
11 制度变迁的路线	123

第三部分 经济绩效

12 制度、经济理论与	
经济绩效	143
13 经济史上的稳定与	
变迁	157
14 制度分析与经济史的	
结合: 前景与疑难	177

参考文献	191
------	-----

第 一 部 分 制 度

1

制度与制度变迁导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不同时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受到制度演进方式的根本影响也是无可争议的。遗憾的是，无论是流行的经济理论还是计量史，都未能揭示制度作用于经济绩效时的一些征象，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分析框架来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去。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作为分析基础的框架。这一分析的意义是要对几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理论进行再检验，并提供一个理解历史变迁的新方法。

在这一研究中，我要检验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对经济(社会)绩效影响的结果(第一部分)，然后概括一个制度变迁理论。

在此我不仅要提供一个分析经济史及其他历史的框架，而且还要解释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和将来的，以及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对一定时期选择集合的影响，它们所依赖的路线的性质(第二部分)。这一研究的首要目标是要理解在历史进程中经济绩效的差异。

1

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因此，当我们想在街上向亲朋致意、驾驶汽车、买橙汁、借钱、经营实业、安葬死者时，我们就能知道(或能很容易地学到)如何去完成这些工作。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到，如果我们试图在另一个国家(比如孟加拉国)进行同样的交易，制度也是不同的。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

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制度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二者兼而有之。我对正规制约(如由人类设定的规则)及非正规制约(如习俗和行为准则)都有兴趣加以探讨。制度可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如美国宪法；也有可能仅仅是随时间演进的，如普通法。我对创立的制度和演进的制度都感兴趣，尽管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对它们分别进行探讨。此外，我还将揭示制度的许多其他属性。

制度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予以禁止的方

面，有时也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因此，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它们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们完全类似于一个竞争性的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它们由正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与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后者诸如对对方运动队中核心队员的非故意伤害。正如这一类似所暗示的，规则和非正规的准则有时是对犯规和惩罚的规定。因此，制度在发挥其功能中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就是确定犯规和惩罚严厉性的成本。

继续以体育运动为例来说明。总的来说，正规的和非正规的规则，以及实施的形式和有效性一起决定了一个运动项目的整体特征。有些运动队由于从不违反规则(而有一个好的名声)，由此给对手以威胁，它也因此而获得成功。在比赛中是否采取报复性的策略，这显然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和惩罚的严厉性。有时，行为准则(良好的运动风格)会约束运动员，尽管他们可能在犯规时会侥幸成功。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和制度一样，组织也提供了一个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当我们在探讨由制度框架所引起的成本时，我们确实会看到它们不仅是这一框架的结果，而且还是这一框架下所发展的组织的结果。从概念上讲，必须明确区分开来的是从运动员那里产生的规则，规则的目的是用来确定所进行的运动的方式。但是在这些规则下，运动队的目的是要通过技能、战略和合作来赢得比赛的胜利，它们有时是通过正当的方式，而有时则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的。将运动队的策略和技能模型化是一个分别将规则的创立、演进以及结果模型化

的过程。

组织包括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参议院、城市委员会、一个有规章的机构)、经济团体(企业、工会、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团体(教堂、俱乐部、运动协会)和教育团体(学院、大学、职业培训中心)。他们是为达到目标而受某些共同目的约束的个人团体。将组织模型化,就是要分析控制结构、技能以及边做边学是如何决定组织在一段时期的成功的。什么样的组织能存在下去,以及它们是如何演进的,这两方面都会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制度框架的演进。但是正如上面所注明的,本研究所要强调的是作为游戏规则基础的制度,我们对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的关注就主要集中于它们对制度变迁的代理人的作用;因此,我要强调的是制度与组织的相互关系。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有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这些约束包括制度制约和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制约,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企图实现这些目标。

在分析中将对作为其基础的规则与运动员的策略区分开来,这是建立一个制度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制度定义为人类给他们自己施加的约束,这是对新古典选择理论方法的补充定义。这一在个人选择基础上建立的制度理论,是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更进一步发展。由于一系列在逻辑上一致的、潜在可检验的假定必须建立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上,选择理论方法就是必不可少的。微观经济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假定基础上的(尽管我在第3章将论证这些假定的变化)。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它们是演进的,并为人类所改变。因此,我们的理论必

须从个人开始。同时，制度对个人选择所施加的制约是很普遍的。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来，是使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重要一步。

制度通过它们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这些再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就决定了构成总成本的交易成本和转换(生产)成本。本研究的初级目标(第一部分)就是要解释用来阐释那些进入一个经济的成本函数的制度的存在与性质。

2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这一事实。从习俗、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制度是处于演进之中的，因而在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获得的选择。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十分缓慢的，犹如历史的长河。为了揭示它们，我们还得像历史学家一样来回顾过去，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速度非常快的世界。

由于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规制约、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此外，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它们是如何渐进式变迁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非连续的变迁(如革命或武装征服)为什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些都

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

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征差异甚大的原因？毕竟我们都是从原始采集和狩猎阶段发展过来的。这一差异如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会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在这些理论看来，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经济在交换物品、服务与生产要素时，最终将逐渐趋同。尽管我们确实观察到某些主要工业国之间在相互交易时确实有某些趋同，但是最近一万年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世界已演进成许多在宗教、伦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根本不同的社会。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一差距？或许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导致差距更加拉大或趋同的条件是什么？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何解释社会中经济福利的长期停滞或绝对下降？阿尔钦于1950年提出的演进性假说认为，普遍存在的竞争将会扬弃那些不好的制度，而那些有益的制度则会幸存下来，它们将被用于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下面让我简要回顾一下我在研究这一中心议题时的进展。1973年，我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我们视制度为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价格的变

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实质上是要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的激励。无效制度的存在，如西班牙的情形，是统治者为了财政的需要，导致时间水平线缩短，因而使私人激励与社会福利产生分歧的结果。这一反例不适于理论框架。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的观点。我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在这一研究中，我提出了阿尔钦的演进论中所引出的问题，但是没有给予回答。它可以解释无效产权的存在，但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竞争的压力来使之消除呢？为何在停滞经济中的政治企业家未能很快竭力仿效那些更为成功的政策？我们如何解释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绩效的根本差异？

本研究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回答依托于制度与组织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加上标准经济理论中的制约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机会。组织的创立是为了捕捉这些机会。而且，正是由于组织的演进，它们会改变制度。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来决定：（1）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2）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作出的反馈过程。

一个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特征所导致的固定性，来自于组织对制度框架的依赖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系统外部性。

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制度制约，都将由于该框架所内含的激励而导致特定的交换组织的存在，这取决于它们所承担的活动的获利能力。

渐进性变迁来自于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的企业家的如下感知：即他们认为在某些边际上改变现存的制度框架会使他们的境况更好。但是，这一感知主要取决于企业家所获得的信息和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如果政治和经济市场是有效的（即他们的交易费用为零），那末，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往往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变迁发动者事实上常常拥有真实的模型，尽管他们起初拥有不正确的模型，但随着信息的反馈而对之进行了修正。但是，理性人模型的说法会很容易地使我们误入歧途。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且他们常常通过想象来处理所获得的信息，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无效的路径。政治和经济市场中存在的交易费用会导致无效的产权。但是，当行动者企图理解他们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的不完全的主观主义模型会导致这类产权的持续存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持续失败的路径与一条成功路径的比较来扩展关于制度变迁的这一特征。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国经济史中的故事——美国 19 世纪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制度框架于该世纪初就开始演进了（宪法和西北法令以及给辛劳工作付酬的行为规范），它们极大地诱使了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发展（议会、地方政治团体、家庭农场、商人协会和造船企业），这些组织的最大化活动直接和间接地诱致了对教育投资的需求，从而促使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教育投资不仅导致免费公共教育体制的建立，而且也导致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农业试验站的建立；摩利尔法

则产生了土地赋予的公立大学。

由于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为了捕捉这些机会，它们不仅变得更加有效了(Chandler, 1977)，而且还逐渐改变了制度框架。不仅政治和司法框架改变了(第十四修正案，穆勒对伊利诺斯)，产权结构在19世纪末被修正(谢尔曼法)，而且许多行为规则和其他非正规制约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反映在对奴隶、妇女的作用和节欲等问题的态度的变化以及行为规范上的变化)。无论是政治与经济交易费用，还是行动者的主观主义观念，它们所导致的肯定不常是最优的选择，或是与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福利增长(是确定的)背道而驰的选择。获利机会有时来自于贸易壁垒的建立，对奴隶的剥削，或是一种信仰的形成。政府的政策有时(实际上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样，制度常常是那些诱致生产率增长的部分和那些抑制生产率的部分的混合。制度变迁差不多同时为这两类活动创造了机会。但是从19世纪美国经济史的平衡来看，它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故事，因而其所依赖的制度框架尽管同时混杂着某些相反的结果，但它总的来讲是不断增强了对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的激励。

如果我现在来描述一个在上面所描述过的具有一系列相反激励的制度框架，我将以近似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条件及那些世界经济史所具有的许多特征来展开。提供给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机会仍然是一个混合物，但是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多的是有利于促进再分配，而不是促进生产活动；它们所创造的是垄断而不是竞争性条件；他们限制机会，而不是增加机会。他们很少进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教育投资。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也变得更加有效——

但是他们却是在使社会更具非生产性上更为有效，基本的制度结构选择很少有利于生产活动。这一路径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这些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加上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并没有使他们不断地向更为有效的结果迈进。

本研究将通过提供一个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以使这些相对照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出来。下一章将揭示作为制度作用依据的理论基础——人的协作问题。此后的两个核心章节将提供一个关于制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第3章我将主要揭示我们所利用的行为假定，并说明我们对这些行为假定的修正。在第4章我要提供一个揭示交换成本的理论基础，以及它的未被认识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3章，我要清楚地描述制度的三个方面：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以及它们实施的有效性。然后，我在第8章将制度与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的相互关系结合起来。

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框架，第9章揭示了组织及其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第10章研究了制度的稳定性特征，它对于理解制度变迁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变迁很少是非连续的(尽管我将揭示革命性变迁)，而是渐进式的，渐进的制度变迁的性质加上行动者在解释其环境时的不完全方式，以及他们所作出的选择，这些一起解释了变迁路径的依存性及历史变迁的相关性(第11章)。

第三部分是关于制度及其变迁方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第12章我考察了制度分析对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经济绩效的理论意义。第13章和14章将分析框架用于经济史。

第 13 章揭示了在更为复杂的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特征，并对历史交换的稳定形式与导致了西欧现代经济增长的动态制度变迁进行了比较。最后一章阐明了将制度分析系统地整合到经济史中的意义，并展示了其在历史研究中更为广泛的应用。



合作： 理论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建立的理论与我们搜集到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人类相互关系的证据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这在经济学中最为明显——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含义与(能定义和衡量的)经济绩效之间的对比尤为触目惊心。值得肯定的是，新古典理论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时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为此提供了有益的知识 and 著作。不过在另一方面，它却没有为洞察下面这类组织提供更多的方便，如中世纪的庄园，香槟集市，或苏克(具有更多中东和北非特色的集市)。它不仅无法很好地分析这些组织在交换过程中的特征，而且也无法解释这些看似无效的组织形式何以存在了1000年。

经济绩效的悬殊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完全不同的经济为什么会持续存在，这在发展经济学那里也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尽管它为此而作出了40年的艰辛努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所用的理论对于要说明的问题是力所不逮的。他们的理论仍然是

基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基本假定；由这一假定所引出的相应含义是一个无摩擦的交换过程，在此产权得到了完全的甚至是无成本的界定，信息是可以无成本地获得的。尽管稀缺性和竞争假定是无可非议的，它是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基础，但其他假定却无法很好地幸存下来。

在过去的 30 年里，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试图修正和推敲这些在解释中正好被忽略了的问题。简言之，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对人们之间合作与协作性质的理解。这一点在斯密的信徒们那里肯定是毫无疑义的。斯密不仅研究了会产生合谋与垄断结果的协作形式，而且还讨论了可以从交易中实现所得的协作形式。然而，随着科斯著名的“社会费用的问题”(1960 年)的发表所引起的混淆和误解，反映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在从交易中获取潜在收益方面的作用上达成共识是多么困难。科斯在这篇论文和他的“企业的性质”(1937 年)中论及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一个对于建立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启示是：当交易是有成本的时候，制度是重要的。而且，正如瓦利斯和诺斯(1986 年)在衡量美国经济中的市场(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时所表明的，要从事交易是有费用的。

1

尽管经济学家在将制度整合到他们的理论模型中去时进展很慢，但他们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起，都在博弈论框架下

很迅捷地揭示了合作问题。为了简便地应用这一方法，他们在一个过于简化的形式下，假定财富最大化的个人常常会发现，当游戏是重复的，以及当他们拥有关于其他对手过去绩效的完全信息，且参加游戏的人是一小群人时，合作是值得的。这样一种粗略的概括掩盖了一批博弈论者的研究结果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这些学者对这些限制条件都进行了拓展、发挥和修正，并发现了这些限制条件的例外，以从中钻研除此之外的更丰富的含义。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多地谈到博弈论，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在与实际绩效相比较时最好的陪衬(它更有可能是纯粹的新古典经济模型)。

下面让我们将游戏颠倒过来，即当游戏不是重复的(或是一个一次性游戏)，对其他对手的信息也缺乏，且有很多游戏者参加时，合作就是很难维持的。这些相反的极端情形事实上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我们经常会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重复相互作用、相互之间了解了大量信息以及团队的人数较少时的合作行为。但是在另一极端，在一个非常专业化及劳动分工具有非人际交换特征的非常技术化的世界，要从交易中实现的潜在经济收益是很少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有重复往来关系，也不必了解另一方，更不必注意少数其他人。事实上，非人际交换的实质是博弈理论的合作条件的对立面。但在现代西方世界，它事实上是存在的。它是怎样产生的？历史上和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为什么未能从交易中获取潜在收益？现代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实现(至少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经济潜力？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将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大量人类冲突问题。

财富最大化行为与社会合作结果的不一致，是博弈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博弈论的主要依据是所谓的“囚犯困境”，它实质上与 M·奥尔森(Macur Olson, 1965)的搭便车难题有密切联系。它们都表明了人类合作与协作问题上的令人沮丧的前景。不过，奥尔森的分析 and 囚犯困境的最大缺陷是分析的静态性质，它们事实上是一个一次性游戏。也就是说，当囚犯困境游戏只进行一次时，游戏者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背离而不是实现一个相应于游戏者总体福利的有效结果。不过众所周知，如果游戏是不断重复进行的，背叛就不一定是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正如许多集体行动问题所表明的，在一个重复的囚犯困境游戏中，只要游戏是重复进行的，就没有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策略。在当今最著名的一个锦标赛中，罗伯特·爱克斯洛德(Robert Axelord)发现，当比赛是不断重复地进行时，参加者所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策略。

一个游戏者会对其他游戏者的行动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这导致他发表了《合作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1984)，这是一本关于人类在没有国家强制干预时解决合作问题的乐观主义著作。

已有一大批文献讨论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得以维持的问题，这在博弈论中是如此，在那些对政治模型化过程感兴趣的非博弈论学者那里也是如此。我相信，有三本关注合作维持问题的著作能使我们在本研究中关注的问题更为突出：

罗歇尔·哈丁(Russell Hardin, 1982)研究了 n 人囚犯困境(PD)，并揭示了在大团队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哈丁强调，集体行动的困难不仅取决于团队的规模，而且还取

决于成本和收益率。¹⁴习俗(它们会导致某些形式的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这在具有不对称性以及参加者可能揭示相互的动机和重复游戏的能力时尤其如此。哈丁认为,当参加者采取有条件的策略时,习俗也可能会存在。不过,有条件策略包括监察和实施(通过威吓)问题。

米切尔·泰勒(Michael Taylor, 1982, 1987)揭示了在怎样的社会秩序下能维持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的条件。他认为,社区实质上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秩序,社区的关键特征是分享共同的信仰和规范。成员之间具有直接的和复杂的相互关系,而且是互惠性的。泰勒认为,国家破坏了社区的许多要素(梯特穆斯和其他人也提出过这一观点)。利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作用,但它可能由国家的强制行动而减到最小或受到破坏。

H·马格里斯(Howard Margolis, 1982)发展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个人行为部分由利他动机决定。他认为,个人有两种形式的效用函数,既有倾向于团体导向偏好的,也有倾向于自我的偏好,个人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权衡。他的模型允许他能解释某些并没有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逻辑的投票行为。

以上三本著作代表了在检验为维持合作需要怎样的条件方面所作的主要努力。在这一点上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是在本研究中要集中考察的:即在怎样的条件下,自愿合作能在没有胡伯斯提出的由强制性国家施加压力来创造合作方式的条件下存在?在历史上,经济增长一般发生在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强制政治的制度框架下。我们还没有在高收入国家看到政治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国家的强制权力在整个

历史进程中都在被利用，它们都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有害的影响(North, 1981, 第3章)。但是在没有第三方时，要维持复杂的交换却是很困难的。可以肯定，陪审团在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时仍然不可或缺。米切尔·泰勒的论点或许展示的是最悲观的前景，因为社区合作方式在大团体和信息不完全时显然是不可行的。诺曼·斯斐德(Norman Schofield)在一篇对这三本著作的评论中，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合作问题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人们获取关于彼此的偏好及可能行为的知识的方式。此外，既然每个人 i 不仅需要有关其他人偏好的信息，而且要了解其他人所拥有的关于 i 人自己的偏好和策略的知识，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共同知识的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在限定的 n 人PD中，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得到了解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某些形式的行动者很有理由相信其他人所采取的特定形式。在一个限定的社区逻辑下，泰勒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社会规范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并将作为共同知识的基础。这一知识将通过使行为更为明白的机制来维持。不过，在更为一般的社会情形下，一个人很难对其他人的信息作出合理估计。因此，合作所依赖的理论问题可以表述为：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下，一个代理人必须了解的关于社区其他人的信息与欲望的最小量是多少？这些信息是用于形成关于他们的行为与其他人交流

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是什么任何分析社区、习俗与合作问题的核心 (Schofield, 1985, pp.12-13)。

2

博弈论着重强调了合作问题，并揭示了为改变支付给游戏者的报偿所采取的具体策略。但是在一个相对明晰的、准确的和简化的博弈论世界，与人类发生相互关系的复杂的、不准确的和摸索性方式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距。此外，博弈论模型同新古典模型一样，也假定是财富最大化的游戏者。但是，正如一些实证经济学文献所揭示的，人类行为显然要比这一简化的行为假定所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尽管博弈论表明了在各种关系下合作与背叛所获得的收益，但它却没有向我们提供一个作为交易成本基础的理论，也没有分析这些成本在不同制度结构下是如何改变的。要理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到科斯定理。科斯在他的论文(1960年)开始时认为，当交易是无成本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竞争等式能够成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效市场的竞争结构能使双方达成无成本的总收入最大化解决方式，而不必考虑其初始的制度安排。在一个无成本交易装置下这些安排是可以设法得到的，它们甚至会发生变迁。在现实世界这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模仿的，因为竞争是十分强有力的，而且是有效的，信息的反馈使

之接近于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条件，双方能从内含于新古典理论论点的交易中实现收益。也就是说，竞争消除了那些在博弈论模型中使背叛获得报酬的不完全的和不对称信息。

但是，要实现这些结果，信息和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们使游戏者不仅有目标，而且能选择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式。但是游戏者怎样才能了解正确的方式(也就是说，正确的理论)使他们得以实现其目标呢？内含于主观主义(或工具主义)理性模型的新古典回答是，尽管行动者最初的模型是各色各样的和有错误的，但信息反馈过程(以及武断的行动者)将修正最初的不正确模型，惩罚离异性行为，将幸存下来的游戏者引向正确的模型。

有秩序的竞争市场模型暗含的一个更为强烈的要求是，当存在十分显著的交易费用时，市场制度将诱使行动者获取实质性信息，这会将他们引向正确的模型。这一观点不仅表明制度会被用于实现有效的结果，而且因为它们在经济绩效中没有起独立的作用而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了。

这些强烈的要求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个人在信息不完全和具有主观性派生模型的基础上行事时常常是会出错的；信息反馈不足以修正这些主观模型。制度不一定甚或很少是为了社会有效而创造的；相反，它们是为了考虑制定新规则的谈判力量而创造的，至少正规规则是如此。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谈判力量是不影响结果的效率的，但是，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世界，它确实给出了制度具有的群集式不可分性特征，并且决定了长期经济变

迁的方向。

如果经济能通过创造相对有效的制度，从而从交易中获取收益，这也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那些具有改变制度以产生制度等式的谈判力量的私人目标产生或演进成了社会有效的制度。这些环境取决于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制度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有效性，以及制度的适应性与对偏好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因此，我们接下来要研究人类行为、交易的成本以及制度的构成所依赖的决定因素。

注 释

- ① 在最近一份对美国自然资源行业产权形成的历史研究中，Libecap(1989年)得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类似结论，即收益成本率在成功地形成有效产权上起决定性作用。

3

制度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化都隐含地或明确地建立在人类行为概念的基础上。有些方法是基于经济理论中的预期效用假定，并将这一行为假定拓展到其他社会科学中去，可以不严格地将之称为理性选择理论。另外一些方法则提出了某些关于传统经济方法的十分基本的问题。尽管我知道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准确地反映了人类行为，但他们(大多)确实相信有些假定对建立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尽管它在研究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时不甚有用，但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相信传统的行为假定已妨碍了经济学家去把握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对这些假定的修正实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进步。行动者的动机比现有理论所假定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他们的偏好很少是稳定的)。行为假定中较多引起争议的(也是很难理解的)一点是，它常常暗含着，行动者在作出选择时，他们所拥有的认识系统为他们提供了

关于世界的真实模型，或至少行动者获得的信息能使之发散的初始模型得到收敛，这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大多数有意思的问题来讲都是十分错误的。个人在作出选择时所依赖的主观的派生模型在人们之间是发散的，而且行动者在大多数情形下获取的信息十分不完全，以致这些发散的主观模型没有显示收敛的趋势。我们只有在理解了对行动者所作的这些行为修正后，才能意识到制度的存在和制度结构，并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在本章我首先将检验预期效用理论，然后揭示动机问题，以及环境的复杂性与行动者拥有的对现实的主观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结合这些观察来解释制度的存在。

1

什么样的行为是与一个制度免费(或至少是执行制度的功能无费用)的世界相一致的呢？让我先引证 M·马奇那(Mark Machina)关于预期效用理论所内含的特征，这一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行为假定：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理论，预期效用理论模型分享了标准的消费理论所依赖的许多假定。我们假定在每种情形下，选择的对象无论是日用品还是彩券等，都可以得到毫无疑问的和有目的的描述。这些情形最终意味着一系列同样的可行性(如相同的预算约束)将导致相同的选择。我们也假定

在每种情形下，个人能够完成实际决定可得性所必需的数学运算，如增加不同面积容器的数量，或计算复合的及有条件事件的概率。最后，我们还假定在每种情形下，偏好是可以转移的，因此，当一个人对一种对象(或者是一种日用品，或者是一个有风险的预期)的喜欢程度比第二个更大，而对第二种对象比对第三种更喜欢，他或她对第一种喜欢程度就会超过第三种。

(Machina, 1987, pp.124-5)

在过去 20 年，这一方法已遭到了严厉反击，同时它也找到了坚强的捍卫者。它的严厉反击来自于一些心理学家所从事的实证经济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实证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反映了有关这一方法的一些重大的反实证现象。^①简言之，它们可分为下列几类：对可转移性假定的违背；结构效应(framing effects)，即代表同样选择问题的可选方式可能产生不同的选择；反向偏好，即以他们报告的价值为基础的对象序与直接选择情形下的对象序相矛盾；以及在不确定选择中的主观可能性的公式、操作方法与过程的问题。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这些反常大多会出现，而这些实验研究的是一些非常有限的问题。正如我在本章后面要尽力讨论的，它们看来并不能直接用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即揭示在制度的形成与存在中行为假定的作用，但是它们确实形成了一些我们这里必须要检验的和要批判地思考的问题。

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最完美概括，也许要数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了。他论证了他称之为新古典行为假定

的七个经典辩护步骤:

1. 经济世界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是处于均衡的。
2. 单个的经济行动者反复面对同样的选择情形, 或面对一系列非常类似的选择。
3. 行动者具有稳定的偏好, 因而他能按稳定准则评估个人选择的结果。
4. 在反复显示给定时, 任何单个的行动者都可能识别和把握任何改善结果的机会。在商业企业中, 被竞争消灭的痛苦确实如此。
5. 因此不会出现均衡, 单个的行动者不能使他们的偏好最大化。
6. 由于世界是接近于均衡的, 它至少展示了接近于行动者最大化假定所利用的模型。
7. 适应性过程的详情是复杂的, 且将面对可能的行动者和具体的情形。相比之下, 与最优化均衡相一致的准则则是比较简单的; 因此, 对过度节俭的考虑表明, 经济学理解的进步是转向进一步揭示这些理论化的准则, 并将这些结果与其他观察进行比较。²²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经济学家所利用的行为假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与理性选择相吻合的。但是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假定确实是, 竞争的力量将使那些按上面所描述的理性行为方式行事的人幸存下来, 而那些不接近这些方式行事的人会被淘汰; 因此在一个演进的竞争性情形下(它利用了所有关于稀缺性与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经过连续观察的行为是按照这类标准行事的。我在批评这一论点并将它延伸到制度经济

理论之前，说明它的这一非常成功的方面是很重要的。在有些方面接近于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新古典模型是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型。例如在研究金融时，金融市场具有很多上面所描述的特征，因此在利用上述直接假定时取得了巨大成功。

2

为了揭示与制度有关的理性选择方法的缺陷，我们必须探究人类行为的两个特定方面：（1）动机；（2）对环境的解释。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同样，我们发现，人们通过事先存在的心理构想来理解环境，解释环境，并用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无论是行动者的计算能力，还是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性，都必须要考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我们首先揭示行动者的动机。

近年来，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已结合起来，以揭示动物与人类的类似行为模型中遗传生存与演进发展的许多特征。许多经济学家已发现，这一方法不仅是先天性的，而且也反映了对人类行为的大量关注。杰克·哈奇雷法（Jack Hirshleifer, 1987）比较了生物学的演进模型与社会经济的演进模型：

演进模型具有某些特征。第一，它们关注的是群体，即便在我们看来讲的似乎是单个的整体，如果变化的进程是演进性的，它也可能根据微观单位的群体变化来描述。因此，在单个人体内，一种疾病的演进过程是细菌、抗体与细胞等的函数。一个国家经济的演进则是人群、交易单位等等关系变化的结果。演进模型代表了不变数(遗传)与变数的组合。它必须有不变的和可变的成分。而且即便一个系统被说成是演进的，变化着的成分本身也必须是能遗传的。在生物演化中，它所强调的是不同的生存和组织类型的再生或从一代变为下一代的特征。这里的不变性是由于遗传机理的恒定模式的孟德尔不可遗传性。它们是由各种力量所引起的，其中包括这些机理的内部变异(遗传复制错误)，性别再生的基因再组合，以及来自于自然选择的外在压力。社会经济演化则主要关注增长的差异和幸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的非遗传要素有社会惯性的重荷，它受思想教育传统的支持。至于变数，它们也与突变相类似(我们在向传统学习时复制有误)。自然选择也仍然是有效的。最后，模仿和理性思考构成了社会经济变化的追加非遗传来源。(Hirshleifer, 1987, p.221)。

在这一演进性模型中，有效性一词并不一定具有经济学家已赋予它的良好特性，这些特性常常与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团体损害其他团体相联系。但是还应该说明的

是，利他性也可能是模型的一部分，正如道金斯已确切表明的，^④这一方法甚至是与报复、信任和人类行为的其他方式相一致的，这些方面在表面上显得是利他性的，与个财富最大化在某些情形下所表现出来的优越生存特性不一致。^⑤

因此，我们可以在个人预期效用模型内建立一个更为精致的关于人类复杂行为的模型，并将利他性的某些方面整合进去。不过由贝克(Becker, G.)在家庭的研究(1981年)中所描述的一种可选方法，揭示了利他性仍然是效用最大化的一个方面，在此我们从其他人的福利中取得效用。但是这一问题比家庭利他性更深一层。无论是实证经济学还是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指出了搭便车、公平性和公正进入效用函数的问题，它们不一定适合于已描述的狭义上的最大化假定。^⑥这些问题在议员的投票行为中表现出来。广为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一个狭义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无法解释议员的投票行为。在这里代理人(议员)是在信念上追求委托人(公民)的利益。代理人自己的效用函数——他或她自己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方式的想法——在结果中是起作用的。

我们根据意识形态、利他性、对行为自我施加的标准等证据表明，财富与这些价值之间的权衡是一个负斜率函数。也就是说，当个人所表达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价值和利益的价格较低时，他们能作出的选择就较多，但是当要表达的自己的意识形态、规范和偏好的价格十分高时，他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较少(Nelson and Silberberg, 1987)。我将回到这一点，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量的关于制度及

其对决策影响的方式的问题。我认为，制度能根本改变个人支付的价格，因而常常能使思想、意识形态和教条在个人作出的选择中起主要作用。

3

在理解人类行为时的第二个决定性要素是，对环境的解释。这一点在标准经济学家的所有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或不起作用。尽管卢卡斯(Lucas, 1986)承认，如果不了解行动者部分，没有关于稳定均衡与竞争的含义(由温特所引伸)，就无法得出理性预期模型的结果。这样，选择和可选择对象就变得十分清楚了。在正视这一点时，稳定均衡的假定是十分抽象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由显得有规则的、重复的和十分明显的选择路线组成的，我们一天中90%的行动就不需要作很多反映。但事实上，一个内含的制度集合的存在可能使我们无法思考问题，或无法使我们作出这类选择。我们之所以要考虑他们，是因为交换结构已被制度化以降低不确定性。只要我们进行从包含人际间的重复行为的选择到作出包含非人际的不重复的交换的选择，关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越复杂越独特，结果就越不确定。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理论来有效地预测结果，在这类情形下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常常也不允许我们修正我们的模型来改进它们。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非常好地指出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接受价值是给定的和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假定对世界的主观描述就是真实世界，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他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关于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实证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他或她的心力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识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Simon, 1986, pp.210—11）

在我看来，西蒙的表述把握了为什么主观主义的不完全的信息处理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实质，它基于对现实的主观看法解释了意识形态在人类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⑦它将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完全性以及我们在解释它的努

力时所起的作用纳入了进去。它集中于我们在面对这类复杂性问题时，有必要发展有规则的人类相互作用模式。他也表明，我们称之为制度的有规则的相互作用可能是非常不适当的，或在任何意义上来看都是远非最优的。简言之，这样一种观察人类如何改进的方式是与我下面将要讨论的关于制度形成的观点相一致的。

在“可预见性行为的源起”(1983年)一文中，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得出了许多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在解释问题的能力与选择更好结果的困难之间是有差距的，他称之为CD差距，这是人类行为方式的关键。他的论文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即这一差距越大，代理人在考虑与这一差距有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越有可能对反应施加一些有规则的非常有限的模型。海纳认为，这一不确定性确实不仅产生了可预见性行为，而且还是制度的源泉。海纳的论文试图将不确定性与制度的产生联系起来，这一努力是独具特色的。不过，他的框架是演进性的。它没有为关于公正的主观概念进入个人的行为决策留下余地。

4

通过回到经典辩解并对应于温特提出的七点，我们可以对上面讨论的问题进行概括。

1. 对于某些目的，均衡概念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

具，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大多数问题却不是一种均衡，而是多重均衡，因为“代理人能坚持的理论具有一种连续性，他们能不按所面对的事件行事，这会使他们改变他们的理论”。(Hahn, 1987, p.327)

2. 尽管单个的行动者面对许多重复的情形，而且如上所述，在这类情形下，他们可能按理性行事，但是他们也面对着许多独特的和非重复性选择，这时信息是不完全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3. 尽管贝克和施蒂格勒已作出了一个有影响的案例(1977年)，他们用相对价格的变化解释了许多显著的偏好变化，稳定性观点是不容易否定的。不仅心理学在非总量水平上解释了这些反例，而且历史证据确实也表明偏好是随时间变化的，我知道还没有办法解释19世纪奴隶的遗赠，它确实没有考虑一个人占有其他人的义理观念的变化。

4. 行动者确实可能会改变结果，但是信息反馈可能非常差，以致行动者无法看到更好的选择。

5. 竞争可能十分弱，其信号也十分混乱，因此所作出的调整可能十分慢或被误导，经典的演进结果在非常长时期内可能无法得到。

6. 通观世界史，有许多情形提供了比简单的理性非合作行为更为复杂的证据。

7. 经济学家的行为假定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对社会科学关注的他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却是不合适的，而且会妨碍对制度存在、形成与演进的根本因素的理解。

5

用下面的一个准确的和紧密的行为模型来结束本章是非常恰当的，这一模型不仅解释了制度为什么是人们处理信息过程的必要延伸，而且也预言了决定选择动机的复杂组合。我们在向这方面努力时已取得了进展，它确实有助于解释制度的存在，对处理行动者(不准确)动机对制度的决定作用，并提供了将利他性和其他非财富最大化价值进入选择集合的方式。

制度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人们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是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所有的解决问题的软件(用一种计算方法)不足的结果。上面的陈述中并没有丝毫意味着制度是有效的。

环境的复杂性是下一章的主题。这足以表明在人们的相互作用中，由有关他人行为的不完全信息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个人计算的局限性是由处理、组织和使用信息的大脑能力决定的。从这一能力来考虑的与解释环境时包含的不确定性的联系、规则和程序的简化过程，作为其结果的制度框架通过构造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定了行动者的选择集合。

毫无疑问，人们处理信息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行动者的动机怎样进入决策过程？在严格的社会生物学模型中，生存能力的最大化是行动者的动机。这类动机有时

(但不常常)与财富最大化行为相吻合。在行动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给定时,环境的复杂性可能解释了对现实的主观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理解和对制度环境公正或不公正的意识。考虑到经典的描述,就不难理解一种工业原教旨主义怎么会认为他或她是受资本家剥削的,或19世纪后期美国的农民是怎么会感到铁路应对他们的困境负责的。在这两种情形中,现实作出的意识形态构架解释了他们的窘困。但是,人们在依这些观念行事克服搭便车问题时的事实就更难以解释了。

如果人类行动中有些活动,如无偿献血而不留名,对宗教观念深信不疑,甚或为了一些抽象的原因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我们就可以对之视而不顾(正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它们搁置一边一样),但很显然它们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要增进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就必须要将它们予以考虑。既然我们对动机的理解还十分不完全,我们就可以通过考虑制度在改变为确信度支付的价格的方式以及哪些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在影响选择的程度上起关键作用而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考虑这些。但我们首先必须详细检验为什么说环境是如此复杂。

注 释:

- ① 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文献最好参见1985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论文汇编, Hogarth and Re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在这次会议上,

大批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相聚在一起，卓有成效地揭示了经济学家利用的行为分析的复杂性及其所包含的问题。除了这本书外，还可参见 Mark Machina 在《经济展望杂志》(1987)的第一次争论上的概述，1987 年的斯哥特经济与社会年度讲座是由 Frank Hahn 所作的 (Hahn, 1987)。另外还可参见 Shaun Hargreaves-Heap(1989)的“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 ② 见 Hogarth 与 Reder (1986)编的文集中 Winter 的文章(p.429)。
- ③ 收入书中的 Charles Plott 与 Robert Lucas 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在特定逻辑下对新古典模型的假定的有思考力的理解。
- ④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1987)。
- ⑤ R. Frank, “If Home Economics Could Choose His Own Utility Function Would He Want One with a Conscience?” (1987)。
- ⑥ 尤其要参见以下几篇论文: Kahneman, Kuetsch, and Thaler, “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 (1986); Richard Herrnstein, “A Behavioral Alternative to Utility Maximization” (1988), and Hoffman and Spitzer, “Entitlements, Rights and Fairness: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1985)。
- ⑦ 在意识形态上，我是意指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即模型和理论)。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它都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诸如共产主义信仰，宗教信仰，个人所建立的理论都具有根据世界应该是怎样组织的规范看法色彩。

4

关于交换的交易费用理论

我的制度理论是由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结合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中起怎样的作用。如果再在此基础上加上生产理论，我们就可以分析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

信息的高昂代价是交易费用的核心，它由衡量所交换物品的价值属性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察与实施协约的成本组成。这些衡量和实施成本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源泉。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集中讨论经济交换；在第6章我将以同样的框架建立一个政治交换的模型。

承认经济交换的代价高昂，则将交易费用方法与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理论区分了开来。200多年来，通过日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从交易中获取收益一直是经济理论的基石。专业化可以经由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来实现，正如世界经济的成长和劳动的分工变得更

为专门一样，经济绩效中所含的大量交换也扩大了。但是经济学家在将这一方法纳入经济理论整体的长期摸索中，确实没有考虑到交换过程是代价高昂的这一点。一个交换过程中包含着交易费用，这是对经济理论的重大修正，并对经济绩效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¹

沃利斯和诺斯（1986年）衡量了市场交易费用量的大小（如有关银行、保险、金融、批发及零售交易的成本；或按职业[如律师、会计等]划分的成本）。他们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且这一比例比一个世纪以前增加了近25%。因此，经济中用于交易的资源不仅在量上十分可观，而且还在增加。由于交易费用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生产关系作如下再表述：生产的总费用由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投入、一种物品的物质属性（规模、重量、颜色、地点、化学构成等）以及在交易中界定、保护、实施物品产权的资本所构成（产权包括使用权、从使用中引出的收益权、排他性权利和交换权）。

一旦我们认识到生产费用是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我们就要有一个微观经济理论的新的分析框架。²⁰不过，我们在本研究中关心的是一个制度理论，尽管我们不得不超出这一范围来讨论微观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对后一理论的意义系统揭示，将会把我们引向另一方向。不过，我们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即交易为什么会有费用的问题，则是重建微观理论和制度理论所共同的。

1

正如我们在第 2 章所看到的, R·科斯在“社会费用问题”中已明确指出, 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 新古典范例就能产生所暗含的配置结果; 而当交易费用为正时, 资源配置将随产权结构而改变。但是, 无论是科斯还是其后的交易费用研究都没有试图准确地确定交易中的费用有多大, 而这一问题正是本研究的核心, 我现在将转向这一点。首先我将揭示衡量的成本(视实施成本为不变), 然后在第三部分检验实施的成本。

我们从一种物品或服务的各种属性中获取效用, 而在一个代理人的绩效中, 我们则是从构成绩效的各项活动的权重中获取效用。³¹ 在一个共同的意义上, 这意味着, 我在喝桔子汁时, 我是从我所饮的桔汁量、它所含的维生素 C 量以及它的味道中获取效用, 尽管交换本身只包含为 14 个桔子支付 2 美元。同样, 当我买一辆汽车时, 尽管我只购买了一辆汽车, 但我得到的是有关汽车的具体颜色、加速器、型号、内部装置以及长度、油箱所有这些有价值的属性。当我购买医生的服务时, 他们的技能、医务护理、在医务室等待的时间都是所购买的一部分。当一位经济系主任雇用一位助理教授时, 不仅包括他们从事教学的数量、质量以及研究成果, 而且也包括受雇者其他方面的绩效: 如他们是否已作好准备、与上课时间相符、为同事提供外部收益、与系的事务

合作，不滥用他们的地位与学生发生关系，或用系的费用给在香港的朋友打电话。因此，对双方来讲，一种交换的价值就是要花费在物品或服务不同属性上所含的价值。要衡量这些属性要花费资源，确定和衡量所转化的权利也需要追加资源。

一种交换中所发生的转让，包含双方企图决定这些资产的价值属性所致的成本——由于衡量成本十分高昂，有些属性仍然是很难描述的。因此，正如一个购买桔子的人尽管只想用 2 美元来买 14 个桔子，但他所购到的是桔汁量、维生素 C 量以及桔子味一样。同样，当我作为一个潜在的买者在看一辆汽车时，我企图确定的是一辆汽车对我的重要属性。这一点在购买医生的服务时同样成立，在此我要确定的是医生的技能、护理和在医务室等待的时间。

从上面的特例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日用品、服务及代理人的绩效具有许多属性，他们的层次在不同种类或不同代理人间是不同的。要对这些层次予以充分理解和精确计算是代价高昂的。确定所交换的每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单个属性的层次是要支付信息成本的。它是交易在这方面代价高昂的基础。即便所有参加交换的人都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例如，一个企业雇用他们的财富最大化的组合），也仍然存在交易费用，它包括获取关于每一交换单位的特性、买者（卖者）的地点等等的必要信息。但是，当事人之间事实上存在不对称信息，这些再加上个人所依赖的行为函数就得出了经济理论及制度研究的根本意义。

我首先考察不对称性问题。在上面的描述中，卖桔子的人比买者对桔子的价值属性更为了解，卖车的人比买者更了

解汽车的价值属性(Akerlof, 1970 年), 医生比病人更为了解服务的数量 and 技能, 同样, 一个有前途的助理教授比系主任更为了解自己的工作习惯。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的人将比保人更为了解他或她的身体状况。

不仅一方比另一方更为了解某些价值属性, 而且他或她还将从信息的收集获取收益。按照一个严格的财富最大化行为假定, 当进行交换的一方进行欺骗、偷窃或说谎所获取的收益超过他所获得的可选机会的价值时, 他就会这样做。这一假定是阿克洛夫那篇论及关于次品的著名文章、购买人寿保险中由反向选择所致的困境以及道德危险问题(Holmstrom, 1979 年)的基础。它也是在近十几年所形成的新产业组织文献中所讨论的其他观点的基础。尽管进行交换的一方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隐瞒某些信息, 但他们在某些时候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透露信息。有了这一背景, 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个关于交换的交易费用的衡量方面的某些一般化形式。

2

先考虑一下标准的新古典瓦尔拉模型。在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 商品是同质的, 市场集中于空间的单独一点, 且交换是同时进行的。此外, 个人具有关于交换品的充分信息, 交易双方对交易条件也有充分了解。这样, 就不需要为影响交换而付出努力, 而只要分配适量的现金就行了。因此, 价

格就成了为使最有价值的结果得以实现的最充分的配置装置。

瓦尔拉模型包含了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由专业化所产生的收益以及由交换所产生的劳动分工，现在我在此模型中增加了信息成本。正如上面所注明的，它们包括衡量物品与服务价值属性的成本和代理人绩效特征发生变化的成本。从交换中所获得的净收益就是总收益(即标准新古典理论和国际贸易模型的标准收益)减去衡量、监察协议的成本，再减去由监督不完全所致的损失。不难发现，在一个共同的意义上，我们会花极大的精力和努力来对合约进行衡量、实施与监察。授权、作保、制商标、将资源用于分类、定级及时间和动机的研究、代理人的契约、促载、调停及司法过程中的整个体系，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衡量与实施的无处不在。

由于要完全衡量有价值的属性是有成本的，因此，通过将资源用于获取更大量的信息以获取财富的机会就出现了。例如，一个卖水果和蔬菜的人可能会发现，对它们进行分类和定级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另一方面一个买者可能会发现，在水果和蔬菜上花时间去挑拣是值得的。在这一情形下，卖者可能会根据公众态度的变化，花部分买者须花的时间和努力去将它们分开。这同样可以适于一辆旧汽车和医疗服务的买者。由于特性变化很大，衡量物品、服务及代理人绩效的费用就十分高昂。对这些资产和资源就可能采取各种形式的意念上的所有权。在某些情形下，意念的形式是双方间权利的分割。例如，一种耐用品的买者可能拥有某些权利，而其他权利则以绩效保护者的形式保留在制造商那里。

作为一个一般化形式，当其他人在不要承担他们行动的

全部成本时，对某些人资产的收入流的影响越容易，资产的价值就越低。这样，一种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就包含影响某些具体属性变化的各方成为对这些属性的剩余权利的获取者。因此，他们要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并具有使交换在所有权结构中的潜在收益最大化的激励。当一种服务的流量能很容易地衡量时，对这一流量的资产的权利常常会很容易地确定，因为它能很容易地对服务的水平付费。因此，当一种流量是已知的和不变的时候，权利是能很容易地确定的。当从一种资产所获得的收入流可能受到交换双方的影响时，对所有权的确定就成问题了。当收入流是可变的，且是无法完全预期的时候，要决定收入流是否就是应该是那样的特定情形是有成本的。在这一情形下，双方都试图得到某些可竞争的收入流。

3

至此，我们在分析中强调的是衡量方面。不过，正是衡量加上实施的成本才决定了交易的费用。如果我们回到上面所描述的瓦尔拉模型，假定在实施协约时没有成本。确实，只要仍坚持同时交易的物品是不可度量的这一名不符实的假定，监察与实施的问题就无足轻重。但是，当我们追加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尤其是衡量的成本以后，它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一种物品或服务的属性以及代理人的绩效的所有特征，也由于我们不得不将资源用于试

图去衡量和监督它们，由此就引起了实施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对代理人的监督。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事实上暗含着一种合约：为了从奴仆那里得到最大的努力，主人会将资源用于监督 and 计量一个奴仆的产出，并以绩效为基础来施以报偿和惩罚。由于衡量和监督绩效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主人会停止短期的完全监督，而是在边际成本等于从这些活动中追加的收益后再进行监督。其结果是使奴仆获得了某种对他们自己劳动的产权。也就是说，主人可以通过赋予奴仆交换服务时的某些权利以增加他们的财产价值，从而使主人得到的价值更大。由此，奴仆也变成了主人。事实上，对于奴仆来讲，只有在购买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才有可能有这一所有权。这正如在古代经常发生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部也偶然发生这样的情况。^④

尽管奴仆的例子是一个极端的形式，但代理问题在等级组织中却是普遍存在的。监督与计量构成代理人绩效的各种属性问题意味着，与标准的新古典工人无摩擦模型相比，他们要支付减去监督与监察资源成本后的其他成本，而在那里工人支付的是他们的边际产品价值。^⑤在上面的描述中，当我们在论及主人拥有奴仆的概念时，我实际上引入了产权；在关于委托/代理及监督问题的所有讨论中，我们假定，委托人具有约束代理人及实施协约的权力。代理人也可能监督委托人及实施他或她的合约结果。

实施可能还有来自于另一方的回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是(常常也是)一个关键的障碍。当另一方的利益与合约相等时，实施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在没有制度约束时，自

利的行为将导致复杂的交换，因为另一方在发现他或她的利益是否与合约相等时存在着不确定性。交易费用将反映在不确定性上，它包括一个风险金，这一数量将表现为另一方对一方监督的可能性及其成本。通观历史，这一风险金额一般会妨碍复杂的交换，因而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

4

下面我们将分析第3章提出的行为假定、本章前一节所提出的关于交易特征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也就是说，它是制度框架的函数。对于任意产权结构，由于交易费用为正，权利就从未被完全界定与实施过；对于在公共领域的某些有价值属性，人们得花费资源来获取它们。统观历史，由于交易的费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且它在当代不同经济中也同样变化很大，对权利的正式保护和个人企图获取这些权利之间的组合及将资源用于保护自己权利方面的变化也很大。我们只得通过比较本世纪80年代贝鲁特的产权与美国现代小城镇社区的产权来概括这一方面。在前者，大多数有价值的权利都是公共的，由那些成功的潜在违规者所把持；而在后者，法律结构确定和实施了大部分权利，而且那些公共领域的有价值权利一般也按传统的行为规范进行了

分配。这两者的差异是各自制度结构的函数。

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的结构，加上所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制度怎样才能很好地解决合作与生产问题，这是由行动者的动机(他们的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性及行动者辨识和安排环境(衡量和实施)的能力决定的。

为了完成经济交易，制度必须根据它们的复杂性而变化。它们从那些解决简单交换问题的制度，扩展到跨时空和无数人的制度。经济交易的复杂性程度，是承担各种专业化程度的经济交换所必需的，它们是合约水平的函数。当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很高时，非专业化就是一种保险的形式。专业化及有价属性的数量与可变性越大，投入可信制度的权重就越大，它们能使个人从事复杂合约时的不确定性最小化。在现代经济中，交换是由许多延伸了很长时间的许多可变属性构成的，它们必须要有制度的可信性，而这些制度在西方经济中是逐渐形成的。在这里我们并不认为，现代成功的经济不具有从简单的合约与交换形式向复杂形式演进的特征。

在一个形式多样的经济中，由制度建立的经济交易可分成与交换的交易费用模型相一致的一般模型。在大多数经济史中的交换形式，都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它包含着小规模生产与地方交易、重复往来、文化同质性(具有共同的价值)及缺乏第三方的实施(确实很少需要它)，这些曾是其典型的条件。在这些情形下，交易费用是很低的，但是由于专业化和劳动的分工是基本的，它们的转化成本却很高。在这种交换形式下，交易合伙人的节约或收集量一般很小。

随着交换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交易双方试图使交换具

有委托或人格化关系的交换特征。但是交换的种类和数量越大，他们就不得不议定更复杂的合约形式，因而达成交易就越困难。由此，我们衍生了交换的第二个一般模型，即非人格化的交易模型，在此模型中双方都受亲属关系、契约、交换抵押或商人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参加交换的各方常常是在宗教仪式和宗教观念约束下进行交易的。长距离与跨文化交易的早期发展以及中世纪欧洲的集市就是建立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的。它们使得市场扩大，从而使在更为复杂的生产与交换中获取收益得以实现。在现代欧洲早期，这些制度导致国家在保护商人时的作用增强，并利用商人的规范来使这类财政收入的潜力增加。不过在这一环境下，国家的作用是最为不明确的，因为它作为产权的保护者与实施者时，同时又往往使不稳定性与交易费用增加。

第三种交换形式是由第三方来实施的非人际交换。在一些现代经济取得成功的经验中，有一个关键点是，复杂的合约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第三方的实施从来就不是理论上的，也从来就是不完全的，交换的双方仍会将资源用于企图建立托庇性的关系。但是，不论是合约双方的自我实施，还是他们的相互信赖都不完全成功。因此，意识形态或规范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在复杂的社会，机会主义、欺骗、偷懒的报酬同样也会上升。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现代高收入社会如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会创造生产率。第三方的有效实施确实只有在创立了一套规则后才能实现，它们又使各种非正式的制约变得有效。不过，由第三方来实施合约，或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所利用的规则也是不完全的，它只能得到相当不完整的理解。

因此，我们应十分明确地发展一个制度模型，必须更深刻地揭示非正规制约、正规规则、实施以及它们的演进方式的结构特征，然后将它们放在一起揭示整个政治经济规则的制度结构。

注 释：

- ① 交易费用方法只是在认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上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还远未统一起来。我们这里发展的方法可能更具有华盛顿大学交易学派的特色，它是由张五常(1974, 1983)所发起并由在华盛顿大学的有关学者所阐述、修正和发展的，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有：Y. Barzel (1982, 1987), Keith Leffler (及 Klein, 1981), Masanori Hashimoto (1979), Douglas North (1981, 1984)。其他交易费用方法：著名的有 O. Williamson 的研究，可以将他的方法与这里的相比较。
- ② 关于这一理论的开端，可参见 Barzel (1989)。
- ③ 关于消费理论的拓展可参见 Lancaster (1966), Becker (1965), Cheung (1974), Barzel (1977), 及其他学者的研究。
- ④ 参见 Barzel (1977) 对这一点的详细阐述。
- ⑤ Jensen and Meckling 在一篇著名的论文(1976)中已阐述了代理成本中包括的监督、监察与代理人的偷懒问题。

5

非正规制约

所有社会在从最原始状态演进到最发达状态的进程中，人们都对自己施加了一些制约，以给出一个与其他人发生关系的结构。在人们的信息和计算能力有限的条件下，这些约束与没有制度的世界相比，它们降低了人们相互作用的成本。不过，对于所设计的正规规则的描述，与人们建立的用于发生相互作用的非正规规则相比则容易得多，且更加准确。尽管我们对其中大部分非正规约束无法明确地说明，对它们的重要性时行检验也极其困难，但它们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在现代西方世界，日常生活和经济运作是按正规法和产权来安排的。然而，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规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下面的看法将向我们揭示出非正规制约的普遍性，我们日常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

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但是，正规规则所依赖的这些非正规约束却很少是日常相互关系中作出选择的明显的和最直接的来源。

非正规制约本身也是重要的(它们不仅仅是对正规规则的补充)，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证据观察出，即同样的正规规则和宪法强加在不同社会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连续的制度变迁，如革命、政变和武力征服，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为明显的(尽管很少被观察到，尤其是为革命的鼓吹者所观察到)是，尽管一个社会的规则会发生总的变迁，但它的许多方面却会留存下来。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时，日本文化仍幸存下来了；革命后的美国社会也依然保留了许多殖民时代的特征；犹太人、库尔德人以及无数其他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尽管它们的正式地位发生了无数的变化。即便对俄国革命这个我们所知的一个社会的最彻底的正规转变，如果不揭示它的许多非正规约束的幸存和延续，我们也无法对这个社会有充分的理解。

非正规约束来自何方？它们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取决于“大脑对一个或多个结构精致的自然语言的学习能力。这些自然语言可以破译成感性的、态度的、道义上的、行为的及真实的信息”(Johnansson, 1988, p.176)。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代一代的遗承，或者通过对知识、价值和其他要素的教诲与模仿来影响行为”(Boyd and Richardson, 1985, p.2)。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

这一观点实质上可以作为第3章论点的拓展。在那里，

对信息的处理是一个理解比从预期效用模型中衍生出来的模型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的关键。但是我们在那一章强调的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而需要制度来建立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本章要强调的是，文化的渗透方式提供了连续性。因此，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了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

1

让我先检验在没有正规规则时人们的相互关系。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人类学文献可以加以拓展，尽管它们的许多结果仍然是有争议的。它们不仅是研究历史著作和分析原始社会秩序的重要读物，而且对于理解非正规制约的现代意义也很重要。罗伯特·贝茨(1987年)在伊文斯·普林查德(Evans Pritchard)对努埃尔人的经典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分析，表达了他对这类约束的如下看法：

从伊文斯·普林查德的观点来看，其疑惑是，尽管有潜在的偷窃和混乱，但努埃尔人事实上往往生活于相对和谐的环境中。尽管努埃尔人捕牛，他们往往也捕其他人的牛，但在部落内捕牛是相当罕见的。努埃尔人似乎避免了由追逐自利所引起的潜在受损效应，他们即便在没有法院、警察等等这些西方社会专门用于保持和平与阻止违约的正规制度时也这样做。(Bates, 1987,

p.8)

贝茨接着描述了由部落间的补偿以及为保护秩序而恐不和所引起的受损效应。他表明了这一合作方式如何具有博弈论方面的意义。在一个一次性进攻的囚犯困境下将会出现游戏者必然采取一个违规方案，其结果是每个家庭的境况更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重复博弈，在不和的威胁下，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去保护秩序，因而，不去追捕其他家庭的牛群。这里的关键点是，家庭成员自己能阻止其他家庭成员从事捕获。因为不和一旦产生，就会使所有其他成员受损。

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大量文献已清楚地表明，部落社会之间的交换并不简单。在不存在国家和正规规则时，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会导致具有极大秘密性的非正规结构的发展。在这方面，伊丽莎白·科尔松的论述是最为全面的。

不管我们是将它们称之为习惯、法律、惯例还是伦理准则，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汤加这一类的社区没有让他们的成员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行事和表现每种可能的行为手段。他们在一系列规则或标准下行事，这些规则和标准确定了在各种情形下的适当行动。规则的作用一般是通过确定人们对其他同伴有哪些预期来消除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它具有限制需求及允许公众评判绩效的良好效应……

不过在另一层次上，他们将看到在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是有地方性的。在有些地方因为人们生

活于紧密的并列地带，利用相同的空间，需要相同人的支持和关心。不过，即便他们这时已产生了冲突，规则也能减少冲突的机会，因为他们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更明确界定，使模糊性总量减少了。因此可以通过一系列特性如义理来安排人们的生活……从汤加人那里我已学到，我不应该赐予公正，因为我感到给予是一种冒犯，所有的人都不会接受。规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们只能简化生活。

他们也给出了一个用于组织活动的框架。如果一个社会控制系统是在一个社区内运作的，制度标准和应用某些惩罚方式是对规则的必要补充。在汤加这类人群中，旁观者用一些绩效标准对全部人作出总的评价(对分析 *Sics* 时尤其有用)；这反过来又使他们能预期未来行为。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最终达成一致意见。(Colson, 1974, pp.51-3)

从科尔松的这一评论及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清楚地表明了几个含义。他们所描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紧密的社会系统的结果，在那里人们相互之间具有明确的了解，因其对其他成员的重要性，违规的威胁是保护秩序的一种持续力量，背叛行为在这一情形中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对部落团体的稳定性与保险特征是一个基本威胁。

波斯纳的原始社会模型(1980年)对这类社会的许多制度特征形成了一种解释，它类似于我在这里的发展(尽管在我这里没有社会财富最大化或效率的含义，而这一含义是内

含于波斯纳的研究中的)。在他的模型中，高昂的信息费用，有效政府的缺乏，物品的数量不足，有限的交易，有限的食物储存，以及从创新中获取的收益极小，这一切产生了一系列共同特征：

弱政府，基于家庭成员的权利与责任赋予，礼物赐予作为交换的一种基本模式，对受害者的严格责任，强调慷慨和诚实作为高尚的伦理准则，集体犯罪——这些及其他社会组织特征在考虑原始和古代社会时多次出现。这表明，一个简单的原始社会模型，作为对某些社会的许多独特特征的抽象，可以用来解释原始社会制度结构的许多特征。(Posner, 1980, p.8)

波斯纳的论文强调了亲缘连结的重要性，它是原始社会保险、保护和法律实施机制的核心。贝茨对肯尼亚(1989年)的研究在政治/经济条件的逻辑下同样关注了亲缘连结模式的变化，它是理解一个社会在从部落社会快速演进为市场经济中的制度约束的核心。

2

非正规约束也是现代经济的普遍特征。为了消除法和经济学学者关于法律条文居于中心地位的论断，艾利克逊(R. Ellickson)开辟了一个领域，来研究加利福尼亚的Shasta镇的农村居民在解决由漫跑的牲畜非法侵入私地造

成的损害所引起的纠纷。^[1]他发现,居民们几乎从不通过法律赔偿来解决问题,而是依赖于一个精致的非正规约束结构来解决纠纷。在此后的一篇文章(1987年)和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提供了大量的追加实证依据,来表明非正规约束的普遍性。

即便是最具因果关系的反省也表明了非正规约束的普遍性。它们是由重复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些方面包括:

(1) 对正规规则的拓展、阐明与修正; (2) 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 (3) 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我将对这些非正规约束的每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在研究委员会权力的制度基础时,歇普塞尔和温格斯特(Shepsle & Weingast, 1987)推断,国会委员会的权力是无法通过正规规则来解释的,它是一系列非正规的不成文约束的结果,是在游戏者的重复相互作用(交换)逻辑下衍生的。这些约束从正规规则演进到关注交换的基本问题。尽管它们从未成为正规规则的一部分,但它们已被承认是制度制约。委员会头头和委员对立法产生影响,但这不是从正规结构派生出来的。

2. 阿赛劳德(R. Axelrod, 1986)提供了一个对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的生动描述,在与阿隆·布尔(Aaron Burr)进行决斗的前夜,汉密尔顿(A. Hamilton)坐下来,并写下了他为什么没有接受这一挑战的所有理由;其中一个关键的理由当然是他可能被杀。然而,尽管有大量的不去决斗的理论根据,但他感到,他在公众中的有效性将随这一决策而显著递减,因为决斗是绅士之间解决争斗的一种可接受的方式。社会规范决定了选择,它不是由正规规则来决定

的。

3. 上述两种非正规约束都可以在财富最大化模型下被模式化。因此，将它们留给新古典(及博弈论)框架来处理。但是内部实施的行为规范只有在按非正规约束说明时才有意义。只有当个人为了他或她的效用函数中的某些其他价值而放弃财富和收入时，他才会改变选择。已有无数论文揭示了立法者的投票行为，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经由一个利益团体模型无法解释议员的投票行为(在此，议员能忠实地反映他或她的选民的利益)，但是还必须考虑到议员的主观个人偏好(Kalt and Zupan, 1984)。尽管它在给出不明确的答案时存在统计问题，但是这一文献中有大量的质量和数量证据表明，思想、意识形态和信息的价格越低，他们的权重越大，对选择的影响也越大(见 Nelson 和 Silberg 的实证研究，1987)。

3

我们如何解释非正规约束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一个普通的和相对简单的解释是，这类约束形式是在用传统来解决协作问题：“这些规则尽管从来没有被设计过，但保留它对每个人都有利。”(Sugden, 1986, p.54)对这一传统的习惯描述是有关道路的规则。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在交换成本给定时(第4章)，双方都有意采取自我实施，以使衡量和交换成本最小化。根据一个经济中用于交易的总资源，传统

能比本章后面描述的其他非正规约束更能解决协作中的大量交易费用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形下, 交易费用事实上反映了各种非正规约束来源的组合)。

在交换逻辑下出现的非正规约束就更为复杂, 它不像自我实施的情形。因为他们必须保留一些使交换可行的特征, 以此来减低衡量和实施成本。在不存在约束时, 不对称信息和作为其结果的收益的分配将会使过量的资源用于衡量。因为交换是无法实施的, 由此也导致交换无法发生。非正规约束可能采取以较低的衡量成本来达成协议的形式(如标准重量和度量衡), 以及通过特定的认可装置或信息网络以获取第三方的交换绩效, 从而使第二和第三方的实施有效(如信贷配额, 更优良的实业机构, 等等)。这类组织与装置使得合作的行为规范(非正规约束)更为有效。它们不仅是历史中更为复杂的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与博弈论模型所得出的合作结果同样重要, 在那里博弈论模型通过改变贴现率和增加信息等特征产生了合作结果。中世纪后期和欧洲现代早期, 一些非正规制度如早期的约束, 使得更为复杂的交换形式增长。价格的通行及审计和帐簿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关键的(即可衡量的)信息和实施成本。这些可以通过增加合作行动的收益和提高监察的成本, 而在一个博弈论框架下模型化(Milgrom, North, and Weingast, 1990)。

对于内部实施对行为规范的修正, 从理论形式上来研究比从财富最大化的非正规约束来研究更为困难。其难点就在于, 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模型来预测财富与其他价值之间的权衡并作出选择。但是, 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对共产主

义的信仰都向我们提供了为信仰而牺牲个人的历史解释。正如前面所注明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表明个人常常是不搭便车的，弗兰克(Frank, 1988)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及关于这类行为的模型。

上面引证的文献及本书前一章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现实中人的动机比简单的预期效用模型更为复杂。第3章也强调了在某些条件下，信念(如诚实、忠诚与支付相等的回报等)都是严格财富最大化意义上的。仍然还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任意相信用来解释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以及解释向诚实、忠诚、辛劳工作和对投票的支付为负时的社会学理论。

还有两个对此所作的部分解释，即马格利斯(Howard Margolis, 1982)的二元效用模型(第2章中提到)以及罗伯特·赛登(Robert Sugden)关于传统能获得道德力量的观点。马格利斯的观点是，个人不只是一个而是有两个效用函数：由惯常自利偏好主宰的S偏好以及纯粹是社会(团体利益)性的G偏好。马格利斯企图通过发展一个模型来给出他的观点的实证内容，这一模型给出了自利偏好的加权和团体利益偏好的加权，并揭示了在权数变化条件下的情形是怎样的。赛登(1986年)坚持认为，当一种传统为社区内每个成员所遵守时，它给出了一种道德力量。每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与他或她发生关系时，都必须遵循提供给个人的规则，其演进过程按赛登的说法是一种“合作的道德规范”(Sugden, 1986, P.173)。

4

现在是将本章的观点汇总在一起的时候了。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规约束在构成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中的选择集合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关键。

从短期来看，文化确定了个人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因此将影响非正规约束被说明的方式。传统是因文化类别而异的，规范也是如此。不过，伦理规范也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是什么使伦理(如决斗作为一种绅士们分胜负的解决方式)演进或消失？

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弈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实证上揭示和检验什么样的非正规约束最有可能产生合作行为，或这类非正规约束的渐进变化将如何改变游戏，以此来增加(或减少)合作结果。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更为复杂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如金融市场的早期演进。²⁰

交易费用框架同样能用于揭示非正规约束。尽管非正规的制度约束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但是书面的合约、交易的实际成本都向我们提供了非正规约束变迁的间接证据。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的资本市场利率的显著下降表明，产权稳定性的提高是大量正规与非正规约束有

效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合约的实施是从包括惩罚违背协议的商人行为规范演进而来的，其结果是将习俗方式用于正规法。^③

在许多情形下，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对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显然也是重要的。我们对这类行为的来源的理解还不充分，但我们常常可以通过在实证上检验表达信念的成本边际变化，来衡量它在选择中的重要性。这类分析为解释主观观念在影响选择时的力量打下了基础(如表达一个人信念的成本越低，这些信念对选择的决定就越重要)，正规制度使个人以最低的成本表达他们自己的偏好成为可能。这样，个人的主观偏好在决定选择时确实起着很大作用。投票、等级导致在议院中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法官的终身雇佣则是通过正规制度的约束降低了实施一个人信念的成本。

如果不认识主观偏好在正规制度约束逻辑下的重要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历史(或当代经济)，它使我们以零或非常低的成本表达我们的信念和思想，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狂热在决定社会和经济中起的重大作用。

我们在第1章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史的简要描述就是一个充分的描述。我们无论是回溯历史、废奴运动的结果，检验高等法院对它们所控制的决策的理解，还是揭示组织、警察、绿背纸币法以及美国农民的民粹派运动，它们都只有在行动者的主观观念逻辑下才能弄清。正规制度结构改变了个人向他们的信念支付的价格，因此能使他们的选择更为有效。

在第一种情形下，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促使他们去

组织政治团体，加上北方选区对奴隶的无道德信念的增进，和 1860 年的竞选，导致了南北战争和奴隶的消除 (Fogel, 1989)。在第二种情形下，对法官终身雇佣的明确，使他们形成利益团体压力，并允许——促使——他们按他们的信念去投票。他们的信念是从他们对问题的主观构想衍生出来的。从马歇尔法官(1801-1835 年)到李克斯特法官，法官对一系列相同的规则实质上已进行了解释和再解释，法院甚至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因为法官对这些问题的主观看法改变了。第三个例子反映了农民的固执信念由于货币政策、铁路、稻米商、银行家和其他人而发生错误，他们是通过建立组织来按州议院的正确法律目标行事，然后通过美国国会中的民粹党和民主党而行事。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为表达与执行他们信念将会付多少钱？我们很少了解更多关于函数的弹性或函数的变化，但是我们确实有丰富的证据来表明，在许多制度装置中，函数是负斜率的，实现一种信念的价格往往也非常低(因而信念是重要的)。

处理文化信息的长期意义在于，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线依赖性的来源。我们仍然有一个关于文化演进模式的长期方式(尽管如 Gavalli-Sforza & Feldman, 1981, 及 Boyd & Richerson, 1985, 所作的一些有意义的解释)。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文化信念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数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从文化上衍生的非正规约束不会立即对正规规则的变迁作迅速反应。其结果，改变了正规

规则和继承的非正规约束之间的摩擦导致的结果，在经济变迁方式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

注 释

- ① 其专题是“Coase and Cattle: Dispute Resolution Among Neighbors in Shasta County” (1986)。
- ② 关于博弈论的一个有意思的应用参见John Veich, “Repudiations and Confiscations by the Medieval State” (1986)。
- ③ 参见D. C. North, “Institution,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本文载于J. Tracy 编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正规制约

非正规制约与正规制约的差别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对从禁忌、习俗和传统延续到成文宪法的展望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从非成文的传统向成文法的漫长而不平稳的运动决不是单向性的。这正如我们从较简单的社会演进到更为复杂的社会一样，它显然是与同更为复杂的社会相联的日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相关的。^①

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形成制约的报酬率（书写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技术变迁一般会降低衡量成本，促进精确的标准度量衡技术的发展。正规法律体制的创立为处理更为复杂的争端提供了方便；与更为复杂的组织相随而演进的科层制必须要有正规的结构来界定委托／代理关系。人们对从身份地位向合约转变的一般特征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还值得在下面加以强调。

正规规则能贯彻和增进非正规制约的有效性，它们可能会降低信息、监督和实施成本，因而使得非正规制约成为解决更

为复杂交换的可能方式(参见 Milgrom, North, Weingast, 1990, 及本书第 7 章的论述)。正规规则也可能被用于修正、修改或代替非正规制约。双方谈判力量的变化可能会诱致对用于交换的不同制度框架的有效需求, 但是非正规制约仍然会保持完成它的方式。有时(但不是常常)新的正规规则可能会取代现有的非正规制约(这一点将在第 10 章详细讨论和说明)。

1

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 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 再到明确的细则, 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 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改变一个典型的宪法比改变成文法的成本更高, 这正如改变一部成文法比改变单个合约时的成本更高一样。政治规则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 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 即关于财产使用, 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束, 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合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特定条款。

在决策各方的初始谈判力量给定的条件下, 规则的功能在于促进政治的和经济的交换, 现存的权力结构(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确定了游戏者现存的财富最大化机会, 它们可通过形成经济或政治的交换来实现。交换包括在现存制度集

合下所作出的谈判。但是同样地，游戏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改变政治团体的基本结构以进行权利的再安排是值得的。

在相对谈判力量给定的条件下，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歧程度会影响统治的结构。其直接的理由是，利益越众多，政治团体中就越不可能得到样本多数，交换的结构则更有可能用于促进那些复杂的交换形式(它们一部分是正规规则，一部分是非正规规则)以及通过联合来解决问题的其他方式。不过，要注明的重要一点是，正规规则的功能是只能用于促进某些交换形式，而不是所有的交换。因此，麦迪逊(“Federalist Paper Number 10”)认为，维持1787年建立的宪法结构，不仅能促进某些交换形式，而且会提高集团利益的交换形式的成本。同样，在经济交换中，专利法和贸易保密法也会提高那些阻止创新的交换形式的成本。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迄今为止我并不认为规则就意味着效率。正如在上面所强调的，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私人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这至少对那些最优秀的部分来说正是如此。因此，那些否定特许、限制进入或阻止要素流动的规则显然是遍及各处的。这并不是要否定思想和伦理是要紧的，而是要建立一种初步近似，规则是从自利派生出来的。

规则的确立一般包含大脑中的依从成本(compliance cost)，这意味着制定规则的方式必须能确定一种规则是否已被违反了，并要衡量违反的程度(及一方对交换所造成的损失)，还要能辨识违反者。依从的成本包括衡量所交换的物品或服务的多重属性，以及衡量代理人的绩效。在许多情形下，当一定时期的技术给定时，如果衡量的成本超过所

得，制定规则就是不值得的，也不必对所有权进行描述。技术或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改变设定规则的相对所得。

有了这些一般形式作为背景，我们现在就可用第3章和第4章衍生的框架来更确切地描述政治规则、产权(经济规则)和合约了。

2

广义而言，政治规则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规则，尽管其因果关系会以两种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产权和单个合约是通过政治决策来界定与实施的，但是经济利益的结构也将影响政治结构。在均衡状态下，一个给定的产权结构(以及它们的实施)是与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则集合及它们的实施相一致的，一方的变化将会诱致另一方的变化。但是由于政治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将首先分析政治体制的结构。

我们将从一个关于政治团体的简化模型开始，它由一个统治者和公民组成。^②在这一简化形式中，统治者像一个歧视性的垄断者一样行事，他向不同的公民团体提供保护和公正，或至少通过降低内部的无序保护产权以获取税收。由于不同的公民团体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且它们对统治者的谈判力量也不同，因而会导致不同的协议。但是，在关于这些半公共品的法律条款与实施中也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会使总收益增加，但是统治者与公民间增量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谈判力量；边际上的变化(或者是统治者的违约潜

力或是公民的机会成本)将导致增量收益的再分配。此外,由于必须要发展代理人(或一个科层机构)来监督、计量和征集收益,统治者的总收益与净收益会显著不同。所有这些结果都内含于这里的代理理论中。

当我们在这一政治团体模型中引入一个反映公民集团利益的代议实体的概念,以及他们在与统治者谈判中的作用时,这一模型就更加复杂了。这一概念是与现代欧洲早期议会、一般等级及国会的起源相一致的,它反映了统治者为获取更大收益,他或她必须向选民集团提供某些服务条以作为交换。代议实体能促进双方的交换。在统治者方面,它会导致一个代理人等级结构的发展,这是一个从国王家族及其等级的简单(如果是延拓性)管理向一个官僚机构来监督国王的臣民的财富与收入的重大转变。

当我们从现代欧洲早期代议制的历史特征转向现代代议制民主时,我们的故事就更为复杂了。这里要考虑多重利益集团的发展。在相对谈判力量给定时,它又以一个更为复杂的制度结构促进了利益集团间的交换。^⑨这一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是建立在对多重利益集团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反映了投票者在特定地方的集中。因此在美国的政治中,很早就有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的矿主,加利福尼亚的洋葱种植者,密歇根的汽车制造商,等等。由于存在多重利益团体,立法者就不能代表特定的利益集团来形成大多数。因此,立法者就不能成功地单独发挥作用,他必须与其他具有不同利益的立法者达成协议。

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会从反映多重利益集团的立法者间的交换关系中演进?始于伯查南和特洛克(Buchanan &

Tullock, 1962)的先驱性研究,集中于讨论投票交易或相互捧场。这一方法是向认识立法者可能决定促进交换的谈判的方式进了一步。不过,用它来解决包含于立法交易中的基本问题也过于简单。它假定所有的议案和决定都是事先知道的,且对它有一个时间尺度。事实上,在当今的立法中引起了大量交换,它只有通过未来的承诺才能发生作用,有必要设立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允许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交换。正如在第4章中所描述的经济交换一样,这里的问题也是权利交换的衡量与实施问题。

当偿付是在未来进行的,且具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时,可信的承诺是怎样演进到使协议达成的。在这类交换中,自我实施是重要的,而在重复交易中,名声则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但是正如在经济交易中一样,衡量与实施的成本包括发现谁欺骗了谁,何时会产生搭便车行为,以及谁应承担在许多情形下使监察者自我实施无效的惩罚成本。因此,政治制度构成了关于政治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事前协议,它们通过创立一个稳定的交换结构减少了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委员会结构体系的建立。它由正规规则和组织的非正规方式构成。美国国会结构的演进在温格斯特及W·马歇尔题为“国会的工业组织”(1988年)的论文对结构的近期研究中得到了描述。在他们的结论中,对结构类型的演进予以详细的说明:

议员会以特定权利作为交换以允许这些权利的持有者对已经明确界定的政策司法施加追加的影响。这一影响是由对宣传机制建立的产权派生而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可选方式是为投票产生

的，对特定政策的额外影响会制度化为特定的交易模式。当委员会位置的把持者正是那些在投票市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投票拍板的人时，这一委员会体制下的政策选择就是与在一个更为明晰的交易体制下平行的。由于交易被制度化了，它就不必要同每个新的立法会议进行再谈判，它只从属于少数实施问题。(Weingast and Machau, 1988, p.157)

一般认为，从单独的绝对的统治者向民主政府的演进，是向具有更高政治效率的迈进。在一定意义上，民主政府使接近政治决策过程的人数比例更大，它削弱了统治者没收财富的变幻莫测的能力，并发展了一个有独立司法的第三方的合约实施，这些确实是在迈向更大的政治效率。但是如果断言，作为其结果的有效的政治市场就如我们所指的有效的经济市场一样，那就错了。有效的经济市场的存在，必须要竞争十分激烈，经由仲裁和信息反馈，这近似于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条件。这类市场即便是在经济世界也是十分稀罕的，在政治世界就更为稀罕了。一个确切的事实是，朝向一个民主政治的发展会降低每次交换时进行立法的交易费用(正如 Weingast and Marshall, 1988 年所阐述的)。但是不仅交易量会增加，而且选民与立法者，以及立法者和官僚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是巨大的。进而，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在选民方面会不断加大其作用。在许多情形下，它在不完全的主观想象中，对选择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非正式选民在对他所熟悉的地方问题进行决策时确实可能了解他或她自己的利益，但是即

便是正式的选民在作出关于独立的政治经济世界中复杂的非重复问题的选择时，也是茫茫然的。这里的要点是，正规的政治规则就像正规的经济规则一样，是用于促进民主政治的交换的，而不等同于经济中的竞争市场。在考虑有关产权的效率问题时，这一差别十分重要。

3

作为一个初步的近似，我们可以说，与在现状下的选择相对照，产权是关于资源和资产的，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关于确定与实施这类权利的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发展的。当承担界定这类权利的成本变得值得的时候，相对价格或任何形式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都会导致产权的创立。这一简单模型不仅是我的早期著作(与托马斯合著，1973年)的基础，而且是许多产权文献的基础。在此，产权的发展被作为经济成本与收益变化的一个简单函数。产权演进的简单模型是与阿赛劳德的《合作的演进》(1984年)相一致的。但是，这一观点撇开了政治团体的作用，其结果是，产权形式的界定与实施被撇开了。

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中，我修正了1973年的观点，解释了无效产权存在的原因。这些无效性之所以会存在，可能是由于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选民与之作对，这种力量如果存在，就会通过实施有效的规则来反对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可能是由于监督、计量及征税的成本非常高，通

过不甚有效的产权所获得的税收比有效产权时更多。这一观点是对效率观点的一个改进，但是必须要加以扩充。

政治市场的效率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但是，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不仅制度变迁的增量特征，而且制度的设立问题，都可能提供可信的承诺，因而可能形成更有效的谈判。在第11章中，我将揭示这一有效的发展路径是怎样一直持续下去的。

4

规则从政治团体依次到产权再到单个的合约。合约将反映内含于产权结构中的激励—非激励结构（以及实施特征）；因此，行为者的机会集合以及他们在特定合约中设立的组织形式，将从产权结构中衍生出来。

经济理论中特定的合约是简单的、完全的和直接的。它包括在一个特定时间的交易。在现代复杂经济中，合约既是多方面的，又是随时间延伸的。由于有多重方面，与交换的物质特征和产权特征相应的就有必要展示许多规定。此外，合约一般是不完全的。因而，关于一定时期合约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许多是不可知的。合约双方要

将这个问题留给法院或某个第三方来解决合约寿命中的争端。^①

合约不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来衍生有关组织形式的实证依据(因此是检验关于组织的假说的基本实证来源),而且是衍生有关双方在一种交换中将建立的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方式的线索。也就是说,合约将反映促进交换的不同方式。不管是通过企业、特许或其他更为复杂的协议形式,以及从直接的市场交换延伸到垂直整合的交换。^②制度制约的复杂关系以及组织的发展将在第9章讨论。

本章要提出一个警告是:尽管明确的规则向我们提供了检验在变化条件下经济绩效的实证资料来源,但这些规则与绩效的独特关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非正规伦理、规则与实施特征的混合确定了选择集合,并导致其结果。因此,对正规规则本身的考察,会给出一个不恰当的和经常会误导关于正规制约与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

注 释:

- ① 关于我们这里所称的正规规则的有思想性的长篇讨论,可参见 Elinor Ostrom (1986). Ostrom 将规则结构分成以下几类:身份规则,用以说明一系列身份地位以及参与者怎样保持自己的地位;边界规则(boundary rule),用于说明参与者怎样选择保持这些地位以及他们如何离开这些地位;范围规则,用以说明可能受影响的一系列结果以及分配于每一结果的外部动机和成本;权力规则,用于说明在一个具体的关节点上,将行动变成中间的或最终结果的决策函数;信息规则,指参与者在各自岗位上的交流渠道,并

说明进行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和形式。

- ② 这一简化的模型在第3章得到了更详细的发展。见North, "A Neo-clas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981)。
- ③ 在过去25年, 政治理论的发展是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并行前进的, 它们的发展都开始于一个制度装置下。但是, 从正式的理论来看, 政治理论的模型没有稳定的均衡的演进, 周期循环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持续的模式(至少在西方的非意识形态中是如此)。然而, 这一正规结果在实证和描述性研究中是偶然的, 它们没有提供这一非均衡特征的证据, 在政治理论中仍然进一步假定政治体制处于均衡状态, 并在这一假定下揭示制度结构的性质。关于这一演进的描述以及结构诱致的均衡模型, 参见 Kenneth Shepsle,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1986)。
- ④ 参见Goldberg (1976)对关系交易和一些事实上具有现代交易特征的复杂合约的讨论。
- ⑤ 在过去15-20年间, 新产业组织学派已发展了十分浩繁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这类组织形式的演进与控制形式的有价值资料, 反映了解决复杂问题的方式。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 尤其要参见 O.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1975), 以及在他的先驱性研究后所发展的文献。

7

实施

关于交易费用的大量文献都视实施为给定的，它们或者假定它为完全的，或者为永远不完全的。事实上，实施很少如此。在交易的费用及所签定的合约形式中，实施机制的结构，它的不完全的频数和严重程度都起着重要作用。实施一般是不完全的，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要将我们带回到前面几章中去，在那里我们揭示了衡量构成合约绩效的多重边际成本。第二个依赖于实施是由代理人来承担的这一事实，他们自己的效用函数会影响结果。

在第4章中，我在交易双方财富最大化行为逻辑下，检验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关于所交换的价值属性的信息不对称性。在本章，我试图拓展这一分析，以此来揭示由权利的转让所引起的问题。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它显得很简单。从交易中获益这个被经济学家视为经济绩效的基石，确实使得双方为捕捉这些合作收益而值得采取合作方式。正如我在前面几章已注明的，

在某些情形下，问题确实是这样解决的。交易事实上是存在的，即便在稳态的社会也是如此。然而也正如前面已强调的，社会无力发展有效的低成本的合约。¹¹实施方式确实是历史上的停滞和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

I

在怎样的条件下，合约倾向于采取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方式？这在一个财富最大化的世界，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当合约双方的支付额与应付额相等时，合约将是自我实施性的——也就是说，在衡量与实施合约没有成本时，从合约中获得的收益将超过成本。最可能的和确实的实证观察表明，在交换双方相互具有关于对方的大量知识以及交易中包含重复交易时，合约是自我实施的。如前面一章关于部落和原始社会及小社区的情况所详细讨论的，在这些条件下，支付额能很简单地与合约相符。在这样的世界，由于有一个紧密的社会相互作用系统，交易的衡量成本非常低。欺骗、偷懒、机会主义所有这些现代工业组织中的问题，都是很有限的或确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不支付，也不存在由行为规范来决定交换和正规的合约议定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是一个非人际交换的世界，其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由于专业化而要相互依赖，个人的福利依赖于以个人专业化为特征的复杂结构。因此，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在一个完全非人际交换世界模型中，物品、服务或代理

人的绩效具有许多有价属性的特征，交换在不同时间发生，没有重复交易关系。在一个财富最大化世界的逻辑下，衡量成本可能很高，也可能没有实施形式。从欺骗和违约中获取的收益可能大于从合作行为中获取的收益。当然我们陈述的是一种非人际交换的极端形式。在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非人际交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我们都能发现交易双方为确保依从而使情况有所缓和的所有形式。举两个例子，抵押品的交换和对违约商人的排斥，提供了双方按合约行事的激励。声誉取决于信息成本——为双方进行长距离交易以及非人际交换提供了一种实施合约的机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亲缘连结，各种忠诚形式，靠共同信仰组织起来的小团体，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一个按合约行事是值得的框架，此外，应该注明的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由意识形态赋予的团结和诚实也起重要作用。不过，由非人际交换中没有第三方的有效实施所引起的困境，则是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存在的关键。

2

让我通过拓展第2章概述的博弈论框架来更为准确地解释这一困境。^②在那里我从一个非常简单的囚犯困境情形开始，即在一次性交换或单一合约中，双方的支付不符合交换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理性自私的个人将达到帕累托次优解，也就是说，双方都会比他们合作时的境况更差。因为如

果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其中一方的他或她的境况将更糟。现在有一些使双方回避这一困境的方式。他们可能会事先签约同意达到某些标准，他们也可以雇律师来监督合约的实施。要注明的是，他们在这样做时，已将交易费用引入到论题中去了。交易的费用(亦即提供确保双方符合合作方案的机制的费用)可能会超过双方从中获取的收益。

如果我们避开一次性游戏而转向所有游戏都是重复性的或反复性情况，那么正如艾西劳德(1984年)已揭示的，合作方式的可能性将变得更为显然。也就是说，如果游戏无限地继续下去，就能使双方的支付符合交换条件，因为从连续重复游戏中获取的收益会超过从一次性游戏中可能获得的收益及“实现的利润”。不过要注明的是，这样一种游戏被假定为必须是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如果游戏有一次中断，或人们认为游戏可能会中止，那么贴现率确实会进入因对继续合作是否值得的决定中去。持续到下一回合的可能性越小，维持一个均衡的报偿可能就越大；短期收益的可能性越大，支付的报偿必然越大。要注明的是，如果游戏持续运作下去，这也仍然会有交易费用，因为一方仍必须获取关于另一方的信息。不过，在这一合作方案中包含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是很少存在的。它们必须要使游戏持续下去，它们必须要保证由相同的游戏者重复游戏，且它们必须要保证一方能观察到另一方的依从部分。按照模型的观察，依从必须要能准确无误地衡量合约的结果，因而一方能决定另一方是否与合约条件不符。

这一博弈论的演进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些非常简化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当合约双方能获得完全信息，游戏能无限

地持续到将来，游戏是在相同的双方进行的时候，可能会达成自我实施的合作方案。但是不必待言，这些假定不但很严格，而且在现实世界也完全看不到的。在一个非人际交换的世界，我们要与不同的人发生交换，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他们的所有信息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还会由一方到另一方发生显著变化。有许多时候，交换是一次性的，且是面对所有交换的，也不会再重复。在这些条件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存在非人际交换时，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不能根据合作方案得到简单的解决。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则是，在一个财富最大化的世界，使一方在一个非人际交换的世界能从交换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合约议定，必然要伴随某些第三方实施的形式。这一结论确实反映了第2章结尾对诺曼·索菲尔在第2章结尾的引证，在那里他描述了在一个复杂的合作博弈论中，要达到均衡解所必需的条件。

这一博弈论故事可以转换成在前面各章发展的框架。在直接的新古典故事中，从交易中获取收益是在零交易费用下实现的。也就是说，交换双方能无成本地知道另一方的每件事情，且实施是完全的。在一个信息完全的世界，是不需要制度的。然而在信息不完全时，合作方案将会失败，除非创造出的制度为人们监察背离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一种制度要保证合作须有两部分：第一，形成一种必要的交流机制形式，以提供知道什么时候进行惩罚的必要信息。通过获取相应的信息，制度使监察成为可能，它们一般能节约信息。因此，比如行为者不必再知道任何一方的全部过去。第二，由于惩罚常常是一种公共品。在此共同体成员能获取收益，

而成本却由少数人来承担。因此，制度必须要提供一种激励，使这些人在这样做时，进行惩罚(见 Milgrom, North & Weingast, 1990 对这一观点的精彩描述)。应该强调的是，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以诱致可信的承诺，将能确保一个复杂的制度框架，在此正规规则、非正规制约及实施一起使低成本的交易成为可能。

这一观点表明，行为者必须要设定一种制度框架，以增进衡量和实施，因此使交换成为可能，但是这样引起的交易费用却提高了上述新古典层次上的交换成本。越是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交易以确保合作结果，从新古典模型的交易中获取的收益就越少。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越复杂，为实现合作结果需要的制度就越复杂，成本也越高。通过建立由第三方的实施或降低另一方的信息费用的自愿制度，可能使十分复杂的交换得以实现。不过最后，可行的非人际交换将使内含于现代相互依存经济技术下的交易收益得以实现。这需要通过强制措施来实施合约的制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由第三方实施的自愿体制的交易费用将是抑制性的。相形之下，由政治团体来充当第三方并使用强制办法来实施合约，这在监察与实施合约时会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但是在这里存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难点：如果我们没有国家，就什么也无法干，没有其中一方，我们也无法行事。怎样才能使国家像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一样行事呢？

3

如果正式的第三方的实施是必要的，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准确地确定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三方的实施主要包含着——一个有能力的中性的一方能无成本地衡量一种合约的属性，且能无成本地实施合约，因而违约的一方常常不得不补偿受损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违约成为一件有成本的事情。这些严格的条件在现实世界显然是很少能满足的，要衡量属性是有成本的。实施者是一个代理人，也有他或她自己的效用函数，他要表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会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因而实施也是有成本的。即便是去找到违约者确实也是有费用的，而要衡量违约就可能更是代价高昂了，对违约者加以识别和施以惩罚的费用就更高了。

但是，在从事非人际交换时，由第三方来实施合约则是经济中的一个主要难题。在政治方面可信承诺的发展，如政治团体确保双方不违背合约或从事的条件会根本改变双方的财富和收入，这也往往只是相对的；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我们也发现，政治团体通过改变价格水平或规则所有这些方式来改变双方的财富，都影响了个人的福利。不过，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合约的实施看到它们在程度上的巨大差异。

在发达国家，正是有效的司法体系而不是对私人的报偿会影响结果，前者包括非常明确的法律团体以及代理人，如

律师、仲裁者、调停人，人们相信，影响一个案件的结果的是法律上的依据，而不是个人的因素。相比之下，在第三世界经济中的实施都是不确定的。这不仅是因为法律条文的不明确性(一种衡量成本)，而且还由于与代理人行为相应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它们有一种法律体系能对付合约的违背者，实施足以能使合约能明确地作出，便合约者还必须考虑这些边际，不管一种合约是否能完成，都是很难衡量的。因此，在有关将来的不确定性或由于代理而使合约很难实施的条件下，由合约双方建立的合约试图使潜在违约和双方对租金的消耗最小化。^④

我要通过指出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来总结对实施的分析。第三方的实施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作为一种强制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地实施合约成为可能，但是就我们所知，在现阶段还无法知道如何去创造这样一个实体。在一个严格的财富最大化行为假定下，甚至很难抽象地建立这一模型。简言之，如果国家有强制力，使国家运作的人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这一权力，而这又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麦迪逊(在 *The Federalist Papers* 中)提出了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奥斯托姆则在他的复合共和理论(1971)中扩展了这一解；正确的宪法形式将会限制政治权力的专横实施。不过，瑞克的概括仍然是最为合适的：

另一个论题是，对宪法形式在限制政治权力的专横实施中的功效的阐明。这是一个我要加以强调的论题。我想我要反驳他归功于伍劳德罗·威尔逊的观点。不过，我起初倾向于作为一个宪法理论家，按奥斯托姆教授的同样传统来提出问

题。他常常同意威尔逊的观点。但是，我每次都想使自己相信，我已找到了一个例子，在此，宪法形式确实产生了自由的差异。我的发现部分来自于我的工作，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奥斯托姆教授认为，我们是自由人，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某些宪法形式；但是这可能正好很容易被视为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宪法形式，是因为我们是自由人的说法。问题是：是宪法结构造就了一种政治条件和一种大众意见，还是政治条件或公众意见造就了宪法结构？这首先就像鸡与蛋的问题一样没有因果方向；但是我认为，常常有一种原因，且那些宪法形式一般是派生性的。在我看来，公众意见常常可能产生宪法结构，而很少是另一种方式。正如罗塞所提出的，法律的最终书写是人们考虑的核心。(Riker, 1976, p.13)

在接下来的有关历史的章节中，我将简要描述英国17世纪宪法形式演进的方式。但是，尽管这一故事描述了一个成功的结果，但它并没有说明它是如何成功的。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的组合。无论是相对于法律还是诚实、忠诚的评价，它们都是这一成功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是行为的自我实施标准，而且我认为它们是重要的。这类自我实施的合约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所作的部分回答是一个有效实施体系的创立，以及对行为的道德制约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它需要时间来发展它(如果它是处于演进中的)。这一条件在非洲从部落社会快速

变为市场经济时，很显然是缺乏的。对瑞克的引证是创立有效的制度制约问题的核心。

注 释:

- ① 对实施的这种强调是威廉逊的交易费用方法与我这里采用的方法的又一重大差别。威廉逊假定实施是不完全的(否则机会主义将不起作用)，但在他的分析中并没有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变量。这一简单方法并没有将学者引向关心历史演进问题。在历史演进中，制度变迁、合约以及绩效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当事人之间以低成本实施合约的程度。
- ② 本节主要依赖博弈论的大量文献。其中，David M. Kreps的论文“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尤其有用，本文载于Alt and Shepsle 主编的《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
- ③ 参见Barzel(1987)对这些观点的阐述。

8

制度与交易和转化成本

要界定、保护产权及实施合约是要耗费资源的。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这些交易费用。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物品和服务这类产出要耗费资源，这一转化不仅是所利用的技术的函数，而且也是制度的函数。因此，制度在生产成本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前面的章节，我已说明了交易为什么是有成本的，并检验了在约束人们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些制度制约形式。继本章之后(第9章)，我将揭示那些可以修正和改变制度与交易费用(及转化成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习和组织方式。不过，首先我希望将至此为止所讨论的线索进行一下简单的汇总。

一套有序有规则——宪法、成文法、习惯法(甚至地方法规)——将确定某一交换中的正规权利结构。此外，一个合约将以心目中所期望的交换的实施特征来书写。由于衡量是有成本的，而大多数合约是不完全的，因此，非正规制约在实际的协议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非正规制约包括名誉、被广泛接受的行为标准(这些确实是

可观察的)以及在重复关系中形成的传统。在一项交换中,权利与制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描述:第一个层次是单一的直接交换;第二个层次是生产过程中包括的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最后一个层次是整个经济。

1

对于单一的直接交换,我要用美国现代住宅财产的转化来说明。这一转换包括一束附加于一种物质资产上的权利束与货币总量进行交换。权利既包括用来确定可能与财富有关的法律权利,也包括附着于财产物质属性上的权利。货币总量是对资源的一种指令。制度决定了交换的成本有多大。构成资源的成本必须既能衡量交换的法律与物质属性,而且还要能衡量检察与实施协议的成本,并反映对交换形式的衡量与实施不完全程度的一个不确定性贴现。不确定性贴现的量将受关于住房条件的不对称信息(出售者是知道的)这类具体合约要素以及购买者的货币条件(购买者是知道的)的影响,它还受阻止犯罪的有效性这类共同体层次因素及价格水平的稳定性这类宏观因素的影响。

出售者的效用中包含价格、条件以及合约责任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包含购买者与事前合约相吻合的可能性。购买者对住房的价值不仅是价格和信贷条件的函数,而且也是转变为出售者的属性的函数。这类转化的法律权利以及财产的住房面积,有时是容易衡量的,而且肯定是可以观察到

的，但还有一些，如维修和保养成本、邻里特征则可能是很难确定的。同样，在面对违约、没收、不确定的权利以及偷盗时，财产的稳定性将会依照确定它们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的困难程度而变化。

在传统的新古典范例下，信息是完全的（即零交易费用），并假定资产价值的转化不仅是完全信息的，而且其产权也是完全确定的。在这一情形下，由于买者和卖者都能无成本地确定所有属性的价值（无论是物质的还是产权的），而且也没有不确定性或产权的不稳定性，那末，在零交易费用下的标准住宅供需模型将确定资产的价值。事实上，由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属性都会影响住宅对买者和卖者的价值，从理念的新古典模型意义上的贴现越小，市场就越完全。制度总量确定和决定了贴现的规模，而买者和卖者所遭致的交易费用则反映了制度的框架。

转化的交易费用有一部分为市场运作成本（如正当的收费、房地产经纪人的收费、权利保险、信用定额搜寻），有一部分是每一方都必须花费的收集及搜寻信息等的时间成本。获取关于犯罪率、警察保护以及稳定的体制的信息都必须向买者支付搜寻成本。买者的效用函数在一定程度上受邻居的噪声或实物的反向影响，因而要确定邻里特征，明确邻里关系中的伦理和习俗，就必须在这方面投资。

这一住房市场的具体制度矩阵由一个法律规则等级的所有方面构成——它们是从美国宪法的条款和委派给州的权力中派生出来的，州法确定实际财产的转让特征，住宅法限制了那些可以转化的权利，习惯法和成文法则确定或限制了大量的自愿组织——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交易费用，影响抵押市

场的房地产经纪人、所有权保险、信用局以及储备和贷款都将受到影响。这些组织的效率是产权结构、实施和资本市场(包括自愿的和政府的保证及其他存在于资本市场的其他机构)的函数。同样重要的是,非正规制约宽泛地补充和增强了正规规则,它们包含双方之间从邻里行为、习俗到确定诚实程度的伦理准则中的信息交流。

我的描述已强调了那些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但是有一些制度事实上提高了交易费用——如限制进入的规则、进行无用的检查或使产权更不稳定。上面提到的经济规则是由政治团体制定的,它反映了合约参加者、工会及政治市场中其他团体的谈判力量。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各地的制度是由一个降低成本的部分与提高成本的部分两方面构成的混合物。美国的住宅市场是一个相对有效的市场,在此制度的平衡诱发了低成本的交易。

回到第4章的模型,从经济理论中衍生出的无摩擦交换的折现,将随制度结构允许第三方来影响买者的效用函数的属性的价值的程度而增大。这些可能包括邻里的行为、盗窃的可能性、住宅区内地方当局变迁的可能性,它们都会影响财产的价值。买者的不确定性越大,资产的价值就越低。制度结构将决定即将完成的合约的卖者的风险,或在违约的情形下,卖者将得到补偿。值得强调的是,上面所描述的与权利稳定性有关的不确定性,是当今高收入国家相对有效的市场与过去的经济和当今第三世界经济产生差别的关键。

2

现在我们转向检验在直接交易中制度与交易费用的相互关系，以及在物品与服务的生产中所包含的这些费用。制度框架将会影响转化和交易费用；后者是由于制度与交易费用之间的直接联系，前者则受到所用技术的影响。在前面章节已描述了所有通常的衡量与实施问题：产权结构，法院与司法体制的有效性，自愿组织与伦理的补充发展。尤其说明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必须能确定其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由于这些在新古典模型下是无成本地得到的，一个假定的新古典企业与真实企业的对照就十分明显。在没有任何组织、检查、协作、监督与计量成本时，前者只不过是一个生产函数。而一个现实中的企业必须购买投入，它一直需要衡量与计算，如果生产的产出质量不变，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质量的变化能力将对其产品的需求产生反向影响。当存在变化时，消费者(或如果这是一个中间品的生产者)必须将资源用于确定质量。这样就能保证不变质量的生产者将是有利可图的。^①

完全的衡量与实施暗含地假定在我们所称的要素与产品市场中。但是，它们的存在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制度集合来促进要素的流动、技术的获得、无中断的生产、信息的快速与低成本传送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而所有这些条件是永不会达到的，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交换制约那样，实际的制

度框架往往是那些能促进这类提高了生产率活动的制度与那些提供了进入壁垒、促进垄断限制以及抑制信息的低成本流入的制度的混合。

我们只需比较第三世界与发达工业经济的生产组织，就能加深对不明确界定或无效产权的结果的印象。不仅制度框架会导致所利用的技术很少是固定资本，而且还不能达成长期协议。他们的企业一般很小(除那些由政府经营或受政府保护的以外)。此外，有些日常的问题(如无法获得空间或为安装一部电话要等待两年时间)必须要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生产组织。也许一笔贿赂足以通过混乱的进口管制或使电话安装速度加快，但是由此所导致的影子交易费用却足以改变相对价格和所利用的技术。

即便在存在产权相对稳定的高收入国家，一种包含有成本监督的技术组合，会比那种物质产品较少但产品变化较小或对劳动者监督成本较低的技术有效。近期的许多交易费用文献都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制度仅决定了交易费用，而技术仅决定了转化费用。但是技术、制度、转化成本与交易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比之更为复杂。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描述中得到：

1.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点是，在 20 世纪初期劳动力的不熟练性，也就是说，雇员所采用的资本密集性技术，减少了高度熟练的劳动者，他们被半熟练的或不熟练的劳动者所替代。这一论点的逻辑是，熟练工人的谈判力量使他们能有策略地破坏生产过程，当现代技术的“高速生产率”(钱德勒语)使成本较高时，雇员发现它降低了时间进程中的总成本，从而采用的技术供那些不会破坏生产的不具谈判力的欠

熟练工人使用。在这一情况下，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是用于降低交易费用。

2. 使一个油田成为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创造一种具有强制力和监督力的组织来分配一个油田的产出，提高了交易费用(由于用于创立与维持及监督与依从一种组织的资源)。同时，油田的整合降低了转化成本(这是更为有效的抽油和精炼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抵销了交易费用的上升(Libecap and Wiggins, 1985)。在这一情形下，一种提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会受到降低转化成本的更大补偿。

3. 安祖·谢普德(1987年)描述了一个半导体制造商被许可设计针对竞争者的新的薄片的政策。因引，消费者能确定金属片的制造商将不能保住那些采用了新设计的消费者，通过减少消费者的关注，它增加了对产品的需求。尽管这一政策降低了交易费用，但也确实损失了生产者的效率。因为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学习曲线效应都不及竞争性企业。第二种来源表现为一个共同的实践。

相应于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非正规制约常常起着重要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劳动的投入量与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键差别，但它只是到最近才引起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至少近年来，日本和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劳动产出的质量差异就是其部分结果)。关于产出的习惯，用于促进劳动参与和协作的组织形式，以及努力选择那些具有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承诺辛勤劳动的工人，所有这些都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派近来研究的主要对象。劳动市场的独特特征是，制度是用于考虑对生产要素的态度对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的——因此，道德的树立在边际上是对更强监督的投资

的一种替代。

3

统观上面的讨论，它强调的是交易费用反映了构成一个经济的或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中整个制度(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的复杂性。这一完整结构最终勾勒了在个人合约水平上的交易成本。当经济学家在谈论有效市场时，他们已赋予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约束框架。例如，资本的成本有部分是由一个金融中介的精密结构决定的。在此，消费者信贷、抵押市场、股票市场和借贷市场的内在联系是受一个政府管束的与管制机构组成的复杂结构的制约的。它从(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到州法及处理分行利率上限的管理机构。因而，在资本供求的背后仍然有其他制度和组织，如权利保险和信贷配给处。对制度结构的更深入探索还反映了那些决定正规制约的政治制度。在国会委员会中，政治、经济制度与组织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用来研究资本市场和在资本市场中反映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游说组织的，内在联系的网络会延伸到行政分支以及具体的管理机构。所有这些对于新政治经济学家在试图展示与提供一个分析关于国会和其他政府分支机构的制度结构的框架时当然是有用的。

当我们比较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与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中交易的费用时，前者在从事每一交易时的成本更高——而且有时会因为这些成本非常高而使交换无法发生。第三世界的

制度结构缺乏作为有效市场基础的正规结构（和实施）。不过，第三世界经常存在的非正规部门（地下经济）企图提供一个用于交换的结构。这一结构导致很高的成本，因为正规产权的缺乏限制了那些从事人际交换体系的活动，正是这一体系提高了自我实施类型的合约。²但是，在第三世界有比简单的高交易费用更要紧的问题，此外，决定生产的基本结构的制度框架会使发展不足普遍存在。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捕捉有利可图的机会，它将由现有约束的集合来确定，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的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水平或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性活动或黑市上。固定资本巨大的大型企业只存在于政府的保护伞下，它们得到政府的补贴、关税保护和政治平衡，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

4

我通过总结前面的分析来结束本章。

1. 制度制约确定了个人的机会集合，它是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的组合，它们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网络，通过各种组合确定了各种逻辑下的选择集合。在这一理解给定的条件下，我们能很容易地表明，为什么制度是稳定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产生许多作出选择的不同边际。

稳定性是由下面的事实引出的，即大量特定的制约会影响某一具体选择，诸如上面所描述的住宅财产的出售。这一制度框架的显著变迁包含一批制约的变迁，不仅有法律制约，而且还有行为规范。尽管制度制约不可能是理念上的，对在一个具体交换中的个人集合也不是有效的，但对综合其他选择的同样制度集合仍可能会影响一个谈判的有效性。此外，正是考虑到个人与组织的谈判力量，只有当某些具有充分谈判力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正规规则时，才会发生正规制度框架的重大变化。

同时，非正规制约和正规制约的组合将使得某一边际上的持续的渐进变迁成为可能，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的较小变化将最终改变一段时期的制度框架。因此，在演进中，选择集合比在开始时更大。无论是制度的稳定性特性，还是它的边际渐进变迁，都在第二部分中进行了简要讨论。

2. 制度制约的复杂性将导致正规和非正规制约的各种组合，这反过来又反映出衡量与实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越高，参与交易的双方就越会用非正规制约来规范交换，当然尽管在极端上不会发生任何交换，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对这些成本的部分解决方案。尽管组织内的衡量成本会与演进市场不同，它们不一定就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非正规制约将主宰交换的形式，它们将获取确定监督其他方的可能性的方式。因此，如第7章所描述的，自我实施的合约将支配交换的形式，尽管当第三方的实施不可能时，对限制的认识是必须能得到的。

3. 交易成本是对作为交换制约基础的制度框架中最能观察到的部分的度量，它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由市场

的可以衡量的成本(参见 Wallis & North, 1986), 一部分是一些难以衡量的成本, 如获取信息、排队等候的时间、贿赂, 以及由不完全监督和实施所导致的损失。这些难以衡量的成本部分使得要准确地评价由一种具体的制度所导致的总交易成本是多少更为困难。不过, 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程度有多大, 我们就在衡量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

资本市场中的利率水平也许是制度框架的效率的最明显的数量度量, 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 电话系统停工, 无力得到所需配件, 无限期的生产中断, 为了得到许可而排长队等候, 以及产品变质, 等等,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在这些国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制度基础设施。

4. 从本章所引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益是, 制度框架在一个经济的绩效中起主要作用。本章开始所描述的房屋的销售就表明了其关键所在。大量的制度使得众多的住房市场和资本市场得以运作, 一些制度使产权得到保障, 还有大量的自愿组织则促进了交换, 它们在使美国的住宅市场同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的住房市场或美国以前的住房市场相比更为有效上起关键作用。不过, 我还努力指出了某些制度制约使交易成本提高。因此, 整个市场是一个制度的混合物, 其中有些使效率增加, 而有些则使效率减低。通过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制度框架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工业国家的过去历史相对照, 就能清楚地表明制度框架是经济取得相对成功的核心关键, 这无论是从截面看还是从历史进程来看都是如此。制度制约在历史进程中的演进方式以及它们对经济的绩效特征的决定作用, 是本书后部分关注的核心。

注 释

- ① 关于生产者为确保稳定的质量而必须支付的巨额资源成本的深入分析，可参见 Susan Sheehan 的论文“Peas”中对豌豆生产的详细描述，该文载于 1973.6.17《The New Yorker》。Green Giant 所碰到的麻烦是要确定豌豆的产量、嫩度和甜度。这些在开始时就包含着巨额的监督和计量资源，而且直到把它们制成罐头运往零售商时才终止。
- ② 参见 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1989)对秘鲁经济结构以及较大的非正规部门的特征的有洞察力的分析。

第 二 部 分

制度变迁



组织、学习与制度变迁

在第8章，我们从制度和交易费用转向了一个经济的绩效方面，但在那些分析中，组织被排除在外了。在第1章，我介绍了制度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再回到这一点。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所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及它们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制度变迁的代理实体，并勾勒了制度变迁的方向。我在本章要揭示的是，组织是怎样诱致变迁的。

让我先回到科斯1937年提出的交易费用是企业存在的基础的观点。如果信息和实施是无成本的，就很难期望组织会起显著的作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组织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被视为一种剥削工人的工具(Marglin, 1974)，一种用来克服资产专用性和事后合约的机会主义问题的工具(Williamson, 1975, 1985)，以及一种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衡量成本的工具(Barzel, 1982)。

这些不同方面的正确性到底如何(它们不能被放在一起而共同排它)？本书要研究

的是，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

在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不过，它们对社会来讲不一定是具有生产性的。因为制度框架常常会挫伤激励，组织将被用于促进其创新者的目标，它们不仅仅是制度制约的函数，而且也是其他制约(如技术、收入与偏好)的函数。这些制约的相互作用确定了经济或政治性的企业家的潜在财富最大化机会。如果我们想揭示行会或中世纪欧洲庄园的存在、现代欧洲早期的受管制的公司、15 世纪法国的世袭财产以及议会的委员会结构、黑手党或 20 世纪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我们的模型就不仅要考虑近来发展的关于企业和政治团体的文献，而且还要结合分析那些用来规范这些组织和目标的制度制约方式，各种知识和技能将通过组织在促进其目标时获得，它们反过来又对知识存量的演进和使用方式起重要作用。

1

以竞争性的运动队作类似，在一系列在广义上用来确定进行游戏的正规和非正规规则及实施特征给定时，我们怎样才能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者呢？很显然，一个决定性的要素是行为者的技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关于游戏的知识。即便在一系列规则不变时，一个业余选手和一个职业选手之间，以及同一个队的第一次比赛和第一百次比赛的结果也会

不同。这一差别来自于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之间进行交流的知识和默认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差异, 以及由于在重复性队中边学边做的差异。

顾名思义, 交流的知识是那些能由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人的知识。默认的知识(该词是由 M. Polanyi 于 1967 年杜撰)有一部分是从实践得来的, 且只有部分可进行交流。不同的人在获取默认知识时具有不同的天赋。一个人不可能单从书本上学到一手很好的打网球的技艺。即便对于实践来讲, 行为者之间也有明显不同。组织中的边学边做, 正如该词所暗含的, 它意味着一个组织能获得进行协作的技能, 并能在重复相互作用中开辟劳动的路径(Nelson and Winter 于 1982 年揭示了这些问题)。

一个组织中的成员可以获得的各種知识、技能及学习机制, 将反映内含于制度制约中的报酬支付——激励形式。黑手党能开发与通用汽车的决策者不同的技能, 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史中选取一个更有益的例子来说明。商人冒险家(15 世纪的羊毛衣出口商)所具有的主要技能和知识显然不同于现代纺织出口企业要获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正如这一点自身所表明的, 它对制度变迁具有深远的意义。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创造对知识存量和分配的追加需求, 且需求的性质会反映为获得不同形式的知识而支付的报偿的现行观念。因此, 当今美国对知识投资的需求是与伊朗或中世纪的欧洲对知识的需求有根本差异的。(私人)报酬率使知识增加, 这可能反映了改进军事技术(中世纪欧洲)、去追逐和提炼宗教教义(康斯坦丁时期及此后的罗马)或去探索更精确的计时器(以使航海家能确定航程的长度, 以及在探险年代

提供较大的报酬)的报酬较高。

获取纯粹知识的激励不仅受到货币报酬与惩罚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个社会对其发展的容忍性的影响。从伽利略到达尔文这一长串有创造力的人就是一个证明。研究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文献十分浩繁,但我感到其中许多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揭示本研究所定义的制度结构与获取纯粹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过,西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对纯粹科学研究的效用的逐步认识。

由纯粹知识变为应用知识是许多学者所直接关注的课题。关于技术变迁的文献是极其浩繁的,从熊彼特、施莫克勒到戴维德和罗森伯格。关于这一文献,有四点应该是应该加以强调的。

1. 在缺乏产权激励时,市场规模是决定创新与技术变迁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Sokoloff, 1988)。

2. 一个激励结构的发展,从专利法、贸易保密法到其他用于提供创新报酬率的法律,也会导致发明行业的发展,并会整合到现代西方世界演进的经济方式中去。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第二次经济革命。

3. 正如罗森伯格 1976 年所指出的,纯粹知识和应用知识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纯粹知识是应用知识的前提,但是应用知识的发展也扩大和揭示出应该揭示的问题。因此,应用知识是纯粹知识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4. 技术的发展阐明了技术变迁的路线依赖特征(Path-dependent character)。这一点对于本研究的其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报酬递增给定时,一旦技术沿着一个具体的路线发展,可选路径和可选技术就可能会被撇开或忽略

掉。因此，发展可能会整个朝向一个具体的路线。其结果就不常是最优顺流(optimal downstream)，这一点已为阿瑟(Arthur, 1989)和戴维德(David, 1985)论证了。

知识的分布也是近来有关人力资本的大量文献所讨论的课题。它反过来又主要是现有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的发展的函数。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是(至少部分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特征的函数，因此，它是这一分析中的一个因变量。其关键点是，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一般是互补性的。在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全给定时，就无法保证人力资本的增长赶上物质资本结构的增长。

在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而且对这方面的了解也很少。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种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发展用来规范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性认识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些感知又规范了对知识的研究。很显然，在中世纪西方有关学习的智力生活是教堂主宰的，即便是到今天，世界许多地方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法容忍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纯粹知识的发展。知识发展的方式会影响人们关于他们周围世界的观念，因而会影响他们对世界进行的理论化、解释和评价，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合约议定的成本。如果人们对体制规则结构的感知是公平的和公正的，这会降低成本。同样，在给定衡量和实施合约是有成本的时候，如果他们认为体制是不公正的，则会提高合约议定的成本。

2

组织的最大化目标是制度框架的条件，我将把它同知识存量的增加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从新古典企业开始研究，管理者的唯一功能就是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出量与投入量，这意味着决定数量和价格的因素确定了。由于这样做的信息也是免费可得的，计算也是无成本的，模型就将管理者在这些绩效中的任何有意义的生产率的意义都抛开了。

这一新古典方法首先在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92年)，接着就是在科斯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中受到批评。它们使经济学家开始间接地研究组织问题。奈特强调了企业家在试图减少不确定性中的作用，而科斯则引入了交易费用概念，他开始认识到企业的存在。事实上，管理者的真正任务是设计和发现市场，评估产品和生产技术，并积极地管理雇员的行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不确定的，且对它们的投资都需要信息。²

市场的发现、对市场和技术的评价以及对雇员进行管理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要解决与衡量和实施有关的问题的复杂性，就需要默认知识。信息的形式和由企业家所获取的知识是某些制度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逻辑不仅规范了内部组织，决定了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和控制结构，而且还决定了提供使组织目标最大化的最大承诺的易受影响的边际。因此，我们有必要检验制度逻辑，以明确对于不同形式

的知识和技能到底存在哪些形式的需求。

要想突袭成功，就必须要有大量关于海战的知识，以及关于商船的贸易路线、兵器、索具、可能牺牲的船员数和船只市场的知识。成功的突袭还要获得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这类活动将会大大提高突袭者和牺牲者对增进海战技术的需求。

在 20 世纪初，美国的一个化学制造商要想获得成功，他必须要有关于化学和在不同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制造中化学原料的使用以及市场和大规模组织问题的知识。成功的化学制造商会增加对应用化学和纯化学研究的需求，及对市场和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的新组织形式的研究的需求。

如果基本的制度框架使得收入再分配(突袭)更有利于(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的实现，我们预期会有不同于提高生产率的经济机会(20 世纪的化学制造商)的知识和技能的发展。用极端的例子来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正如思想类型规范了大多数经济史一样，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与知识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并不是指在预测顺流结果中存在一个简单的关系，企业家的最大化努力往往具有不可预期的结果(第 10 章)。例如，对海战的研究会产生用于掠夺的技术，对 20 世纪企业组织的研究可能会发现建立化学工业的新的法律方式。但是我相信我这里描述的一般观点是十分清楚的：(1) 制度框架将勾勒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方向；(2) 这一方向将是该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企业或其他组织在知识方面的投资能提高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生产率，并能增加企业家的默知识，那么，其生产率的增加也是与该经济的增长

相一致的。但是，如果企业的最大化行为是由损害或摧毁竞争者、劳工组织、罢工或是农民要求政府去限制农产品产量并提高价格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就明确了组织的最大化机会。即便是在现代世界最具生产性的经济中，由制度框架形成的信号也是混合的。这正如当今美国经济中大多数关于正规规则和实施特征的因果调查所揭示的。我们有向限制产出，罢工及犯罪付酬的制度，正如我们有向生产性经济活动付酬的制度一样。平衡起来看，后者的权重要超过前者，但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以及在当今许多第三世界经济中却并非如此。

因此，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通过以下几方面规范了制度变迁：（1）对所有类型知识进行投资的派生需求（上面已讨论）；（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及制度框架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将讨论）；（3）非正规制约作为组织的最大化活动的副产品的渐进变化（第10章将讨论）。

3

企业的最大化行为可能会采取在现存约束或正在改变的约束内作出选择的形式。威廉逊和其他学者关于企业的现代文献，揭示了在现存制度约束内最有效的控制结构和组织。³企业的这类最大化活动导致边做边学和对报酬支付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进行投资。企业或经济组织到底采取怎样的方式，这取决于它对报酬支付的主观概念。很显然，在现代美国经

济中，经济组织会将资源用于这两方面。是什么在决定相对报酬支付和制度变迁，以使组织试图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呢？

在第6章中，我建立了一个政治团体的交易费用模型，并简要揭示了经济与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里我将集中讨论会导致这一相互作用发生变迁的渐进过程。当一个方向上的最大化支付超过现有制约下的投资支付时，具有充分谈判力量的组织就会利用政治来实现目标。但是，整个制度框架的渐进变迁，比经济组织将资源用于直接改变政治规则以增加他们的利润率时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组织也将促进社会对间接贡献于他们的利润率的各种技能和知识的投资。这类投资将规范技能与知识的长期增长，它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以美国经济史为例来说明。19世纪知识和教育的增加使预期报酬增加，诱致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及农业与工业活动中应用研究的公共与私人投资。由此不仅导致德勒(1977年)所描述的经济组织的不断转化，以及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宣传机构和对政治团体施加影响的教育组织的增长，而且政治家和投票者对这类投资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其结果确实不是单向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让位于创造论，宗教教义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冲突延续至今。不过整个结果还是增强了最初关于经济绩效与知识增长与传播的投资之间的互补性观念。美国在20世纪是极具生产性的。这一故事的重要意义在于，知识市场加上行为者的主观观念恰好使得对知识的私人与公共投资接近于社会报酬率。

从大多数历史来看，在生产性知识方面进行投资的制度

激励是十分缺乏的。在当今第三世界经济中，这类激励往往也是误导的。即便第三世界国家在教育上进行了投资，他们也常常被误投于高等教育，而不是初级教育(后者在第三世界国家比高等教育具有更高的社会报酬率)。他们为什么会同美国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如果私人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正确的投资就有可能通过自愿组织来进行。但是，如果这种市场是不完全的，私人报酬率非常低，从而使作出这类私人投资变得不值得。那么正确的投资(对初等教育)就只有由公共投资来承担。假定社会成员在这类投资中获取的社会报酬率较高。但事实上，这类公共投资没有人承担或被误导了，这不仅表明高昂的交易费用导致不完全市场，而且不完全的知识和理解还建立了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

4

我打算抽出有目的的组织(及它们的企业家)与历史上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些含义来进行讨论。对技能和知识的系统投资以及它们在一个经济中的应用表明，该经济的动态演进必须要有一系列特定的制度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描述要求我们思考一个不同于直接配置效率逻辑下的问题。在配置效率中，标准的新古典帕累托条件可以得到。另一方面，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确定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¹它还要研究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

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间的瓶颈的意愿。

我们还远未了解怎样作出适应性效率的所有方面，但是很显然，整个制度结构在社会与经济将促进探索、实验与创新的程度上将起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将这些归结为适应性效率。制度框架中所内含的激励结构会导引边学边做的进程以及默认知识的发展，后者将个人的决策过程引向不断演进的系统，以使之不同于它们开始时的情形。我们只需重谈阿尔钦(1950年)的著作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对我们所面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因此，就没有人能使利润最大化。允许试验的最大化形成将更有可能解决时间进程中的问题（哈耶克有一个类似的观点，1960年）。因此，适应性效率提供了促进分散决策过程以揭示解决问题的可选方式的激励。我们也必须从失败中学习。因此，变迁将包含正确组织的形成以及错误组织的消失。这一进程没有那么简单，由于意识形态给予人们的各种答案不是朝向适应性效率的偏好，组织的错误就不仅是可能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

由此可见，不同的制度规则对默认知识将产生不同的激励。也就是说，特定的制度不仅决定有利可图的和可行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而且会确定企业内部结构及其他受到管制、进入壁垒、控制结构及组织灵活性的适应性效率。尤其是，促进默认知识的发展与利润的规则以及促进创造性企业经营能力的规则对于有效的组织也将是重要的。尼尔逊和温特(1982年)以及巴里肯(1987年)的研究对有效组织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很显然，竞争、分散的决策、明确界定的产权、合约以

及破产法都是有效组织的关键。那些不仅能消除错误的经济组织而且能消除错误的政治组织的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规则的有效结构不仅要成功地支付报酬，而且还要能禁止组织结构的不适应部分的生存。这意味着有效的规则将废除不成功的努力。

我们还远不能理解如何去实现适应性的有效经济，因为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常常是不一致的。配置有效的规则将使当今的企业和决策更安全——但是它又常常以牺牲熊彼特表明的创造性毁灭为代价。此外，政治进程的这种性质促进了有利于当今有影响的谈判集团的制约的增长。但是适应性有效的制度框架已经存在过，且确实是存在的，正如适应性无效框架已经存在过或确实存在过一样。

注 释

- ① 不过，从Richard Nelson最近一本题为“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即出)的著作来看，作者揭示了企业试图从创新中获益的各种方式，并认为，尽管专利在各行业都很重要，但随着创新进程变得更为复杂，保密和其他制度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 ② 沿着这些线索发展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精彩分析，可参见H.Demsetz, “The Theory of the Firm Revisited”(1988)。
- ③ 参见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1985)对这些问题的透彻分析。
- ④ 参见P.Pelikan(1987)对这一观点的阐述。

10

稳定性与制度变迁

变迁的代理人是对内含于制度框架中的激励作回应的单个企业家。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变迁的进程主要是渐进式的。我在本章将这几部分放在一起讨论。

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一个制度框架的总体稳定性使得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换成为可能。对稳定性特征的回顾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变迁过程的渐进性的理解。

稳定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制约来实现的，它们既包括在一个等级下的各种正规规则（在这里，每一层次的变迁比原先变迁的成本更高），也包括非正规制约——是规则的延伸、阐述和验证，且由于它们已成了习惯性行为的一部分，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它们使得人们在每天的交换过程中，不必去准确地思考一种交换在每一时点和每一情形时的条件。我们用惯例、习俗、传统、习惯这些词来表示非正规制约的存在。正是正规规则与非正规制约的复杂关系，加上实施它们的方式，规

范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我们在世俗(正是这个词使我们想象到制度的稳定性)活动中的指导。正是这些世俗活动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正如我已讨论的，尽管规则与准则的组合会变化，这一组合向我们提供了了解我们正在做的和将在哪里进行的舒适情感。

不过，这里要再次强调的很重要一点是，这一系列稳定性特征无法保证所依赖的制度是有效的(“有效”一词在一定意义上是本研究要使用的)，尽管稳定性是人们发生复杂相互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一定是实现效率的一个充分条件。

1

制度变迁及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是该变迁的重要源泉。对于非经济学家(或许对某些经济学家)来说，将相对价格的变化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可能难以理解。但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个人在人们相互关系中的激励，这一变迁的唯一其他源泉是嗜好的变化。

制度变迁的所有下列源泉都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如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的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包括十分显著的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技术)，这些相对价格的变化中某些将是外生于前面章节所发展的分析框架的(如土地与劳动的比率的变化导致了中世纪欧洲晚期的瘟疫)；但是

它们大多数是内生的，它们反映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企业家的最大努力将改变相对价格，因而将诱致制度变迁。企业家获得技能和知识的过程就是通过改变可观察的衡量与实施成本，以及通过改变新的谈判与合约的可观察成本和收益来改变相对价格。

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再建合约的努力，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合约。由于我在过去的研究中(North and Thomas, 1973; North, 1981)已分析了相对价格变化所起的作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深化这一问题，而是将揭示更加繁难的嗜好变化问题。

我们对偏好或嗜好为什么会不断变化的原因很少了解。很显然，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嗜好的变化中起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相对价格在一段时期的根本变化，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改变人们对构成行为标准的方面所进行的合理化解释。我选取了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20世纪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基本上是由工作、闲暇及避孕技术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富斯(1983年)和贝克(1981年)的著名研究已详细论述了本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方式。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已发生了对道德观点及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意识形态态度的变化。要解释现代西方妇女行为准则的复杂变化，如果仅按照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对这一复杂的且仍然缺乏理解的人类行为作出解释，这是过于简单化了。相对价格的变化通过事先存在的精神构想来进行过滤，从而构成了我们对这些价格变化的理解。很显然，思想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方式在这里是起作用的。价格变化与观念这两者的确切组合仍然远没有搞清楚。

我再用另一个古典的例子来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一项重大制度变迁本身是不可能完全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解释的。在这些例子中，对奴隶观念的变化是人类文明中对一个人占有另一人的不断憎恶，进而是全世界反奴运动兴起的结果。很显然，正如我们已在大量关于美国奴隶性质的学术争论中已了解到的，这一制度在南北战争时期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当然，反奴运动具有长久的基础，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它被某些集团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例如，在 19 世纪前半期南北之间有关西部在美国国会的政治控制问题的变化关系中，奴隶问题曾被用来改变他们在区域冲突中的谈判力量。但是每一时期反奴运动的心智力量使得政治家利用了这一观点(Fogel, 1989)。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或许是，个人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表达他们对奴隶的憎恶，同时还要向奴隶所有者偿付一个非常高的价格。这一点使得我在前面章节发展的关于制度结构的观点更增强了。在竞选过程中，它使得人们有可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有效的意识形态。因此，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正如在 1860 年的美国一样，投票者要对奴隶问题作出评价(尽管在英国拥有奴隶的所有者得到了补偿，在美国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北方预见到在南北战争中要付出的代价)。这里的关键是在制度结构中没有一种方法使南部的奴隶所有者向投票者贿赂或补偿，以阻止他们表达自己的信念。

对消除奴隶制的简要分析，是建立在有一种制度结构能允许人们以最低的成本来表达他们的观点的基础上的。我并不是说人们不愿意为了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作出巨大的牺牲，人们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感觉的强烈程度常常可能会引

导他们作出非常巨大的牺牲，而且这类牺牲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制度通过降低我们向我们的信念支付的价格，使得观念、教义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反过来讲，对制度变迁理解的增进要求对拥有的思想是如何作出的以及意识形态是如何保持等问题有比现在更多的理解。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能以非常准确的词来定义相对价格的变化同形成人们观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两者在诱致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2

组织是持续演进的，价格一直是处于变化之中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何时会导致制度变迁，以及它们何时是在现有规则框架内再建新框架的一个来源？思考这些问题的最便利方式就是在一个均衡逻辑下进行。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

制度变迁的进程可以描述如下。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一方或双方去进行一项交易（不管这一交易是政治的还是经济

的), 设想一方或双方在一个改变了的协议或合约下境况可能会更好, 因而将作出对合约进行重新谈判的努力。不过, 由于合约是在一个规则等级下形成的, 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规则(或违背某些行为准则), 再谈判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情形下, 坚持能增进他或她的谈判地位的一方可能正好试图将资源用于建立更高层次的合约。在行为准则情形中, 相对价格的变化或嗜好的变化会使它逐渐消失, 或被不同准则所替代。在整个时期, 规则可能会变化, 或被简单地忽略掉, 或不执行了。同样, 一种习俗和传统可能会逐渐被淘汰或被另一种所取代。这一非常简化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可能是非常复杂的——通过议程的力量, 通过搭便车问题, 或通过行为准则的顽强生存。但是, 正如制度变迁的模型所概括的, 它提供了某些基本特征。

在这里, 概略的模型中省略了为首的行动者。尽管没有个人或组织的任何具体的有目的的活动, 但非正规制约——行为准则的变化会不断演进。正规规则和实施的变化常常要耗费巨额资源, 或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来克服搭便车问题。正如上面描述的, 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会对(可观察的)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作出反应, 通过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或(当在现有规则内变化是无法实现的时候)间接地通过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将资源用于改变规则或规则的实施。

(政治或经济)企业家可能会将他们的技能或默许知识用于探寻获利边际, 估计成功的可能性, 以及冒险将组织的资源用于捕捉潜在收益。很显然, 组织的效率取决于这些可观察的和可实现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 有大量的支付会影响规则 and 他们的实施, 他将向创立经济组织与政治团体间的中

间组织(贸易协会、游说团体、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报偿,以实现政治变迁的潜在收益。社会的资源受政府决策影响的比重越大(直接的或经由管制),用于这类抵制性和防御性(以防受相反的影响)的组织资源就越多。

非正规制约是怎样变迁的?尽管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解释决定文化变迁的力量,但很显然,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会不断变迁,事故、学习和自然选择都起着部分作用(Boyd and Richerson, 1985)。最为一致的解释主要是从演进理论中学到的,尽管有些附加的特征所获取的特性是通过文化传播得到的。不过,文化演进论还羽毛未丰,它在分析具体非正规制约的变化时还不具备很直接的价值。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即文化特性的存在在相对价格、正规规则或政治地位的变化时,会使得非正规制约的变化率与正规规则不同。

如果我们在文化遗传的宏观层次上仍所知甚少,但我们可能在微观层次上对非正规制约的变迁有较多的了解。正如上文所揭示的,相对价格或嗜好的变化有一部分会导致这类制约简单地被忽略掉,然后凋谢。按照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非正规制约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补足或延拓正规规则。因此,正规规则或它们的实施的变迁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构成一个稳定选择理论逻辑的是正规与非正规制约及实施方面的总和。不过要注明的是,其中一种制度制约的变迁,会改变交易成本,并引发演化新的习俗和准则以有效地解决将要出现的新问题的努力(Ellickson, 即将发表)。一种新的非正规均衡将在正规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¹不过,正规规则有时会被用于否定和替换现存的那些不再适应

新演进的谈判结构的非正规制约。准则(非正规制约)常被演进来补足稳定时期存在的正规规则,但在变迁期间会被新的正规规则所推翻。因此,1974年美国议院分委员会的权利议案导致了一些正规规则的巨大变迁,它们废止了原来的非正规委员会结构,这一变迁反映了团体在立法权力上的下降,以及代表不同代理团体的新的自由民主派人数的急剧增加;先前的委员会主要由保守的南部民主党操纵,他们的人数较少使得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Shepsle, 1989)。

实施的变迁也会为有组织的企业家提供新的获利机会,这又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美国19世纪的土地法历史就是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特别的例子。特定的存款规则组合的变化(规模、信用条款、价格及准备金要求)、获利机会(导致运输、人口、技术和资源的变化)以及联邦政府用于实施的少量资源(尽管它变化很大),都导致个人、集团及组织企图从土地的利用中获利。通常在法律实施的逻辑下逃避法律是一种成功的策略。土地公司、非法占地者、权利俱乐部、木材公司、铁路公司、采矿公司及牧牛协会都会决定美国的土地处置及联邦政府所作出的反应。²例如,在革命战争后,非法占地者习惯性地居住在土地上,国家只得赋予他们居住权。然而,当联邦政府于18世纪90年代接管对土地的处置后,这种做法就不再适用了,而是被非法占地者烧光了。战争导致了政策的不连贯、普遍的侵权,国会在1799—1830年间通过了20多个法案对某些特定地区赋予非法占地者以居住权,最终于1830年通过了一个一般居住法,并于1841年成为永久性法案。³

3

战争、革命、武力征服以及自然灾害都是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源泉，这些是本章下面一节的主题，但是在我们开始分析这些问题时，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因此，当我们思考封建社会和庄园制的衰亡时，我们发现它由一个框架的逐渐再建构所组成。在这一框架中，正规与非正规制约及实施特征的内在联系演进了几个世纪。主仆之间的协议反映了主人对仆人的绝对权力；但是，14世纪人口的下降所导致的边际变化改变了机会，增强了仆人的谈判力量，导致主仆之间传统协议的逐渐瓦解，不动产所有权(copyhold)的出现，最后出现了无条件继承土地的所有制。这些改变封建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一个长时期的其他边际变化（如军事技术），庄园习俗被废除，以及正规的法律变化（如威尔士法），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变化是有文字记载的无数具体的主仆之间协议的微小改变的加总，它们的总和构成了基本的制度变迁。

4

关于非连续性的变迁，我所指的是正规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和革命的结果。我没有提供一个革命的理论，它是一批浩繁文献的主题，⁴从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在已发展的理论框架给定的情况下，有几个观点是贴切的。⁵

1. 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的双方(至少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收益而再签约。这类再签约可能从非常简单的形式到斯克波尔所称的政治革命形式，后者是用政治制度内涵使得双方从事新的谈判和妥协成为可能。政治制度(无论是正规的或是非正规的)可以为演进性变迁提供一个周密的框架。如果这一制度框架没有演进，参与交易的双方就没有一个解决争端的框架，从交易中获取潜在收益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前面章节描述的)企业家就可能企图通过罢工、违纪和其他方式来形成压力集团，以求打破僵局。

2. 无力达成妥协的解决方式可能不仅表现为调停制度的缺乏，而且还表现为企业家谈判的自由及仍然维持他们的选民集团的威信有限。因此，冲突双方的实际选择集合可能没有交叉，这样即便从解决违约中能获取较大的潜在收益，企业家有限的谈判自由与缺乏减轻困难的制度的结合会使得这样做没有可能。

3. 由于争端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获胜的艺术，双方就必须结成联盟，以对付其他利益团体。不过，由于革命成功的最终结果，由于在联盟内重建规则时的冲突，会使得其结果非常不确定。因而报酬的分配会有冲突，这样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4. 对暴力行动的广泛支持需要意识形态的承诺以克服搭便车问题(North, 1981, Chapter 5)。参加者的意识形态越强，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革命就越有可能成功。

5. 这些不连续的变迁与非连续的演进性变迁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在人口理论中被作为均衡的中断特征)，但是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许是，它在表面上看有许多是不连续的(或在革命的旗号下)。之所以很少是非连续的，这部分是由于结盟是革命成功的实质核心，它往往具有短时的效果。意识形态疏远与一个共同对手被无力解决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冲突性的偿付需求所替代。一种力量可能会简单地消去另一方，但是更为共同的特征是长时期的不稳定的和激烈的妥协。

此外，尽管意识形态承诺是大众支持革命的必要条件，但这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在面对一个共同的受憎恨的压迫者时，放弃财富和收入以换取其他价值是一回事，但是这种交易的价值会随着压迫者的消灭而变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新的正规规则是建立在一种为意识形态承认的激励体制上的，他们会被破坏掉，并会被迫转向更能相交的制约，正如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已发现的那样。

所有这些中也许最重要的是，正规规则会变迁，而非正规制约却不会变迁，由此会形成非正规制约与新的正规规则

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许多规则相互之间是不一致的一样。随着向先前的正规规则的延伸，非正规制约会逐渐演进，如上所述，一个顺势的趋势是，新的正规规则会补偿现存的非正规制约，这类变迁有时是可能的，尤其是在一个局部均衡逻辑下。但是它忽略了作为许多非正规制约基础的深层的文化遗传。尽管正规规则的整个变迁可能会发生，但同时有许多非正规制约却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因为它们仍能解决参加者之间基本的交换问题，这些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则，在一般时期的结果倾向于在两个方向对整个制约进行重建，以产生一个新的远离革命的均衡。

注 释

- ① 关于议会政治模型化的过程，可参见Shepse and Weingast (1987)。
- ② 对大量这类文献的一个较老的但仍不失为优秀的概括，还是由Carsten (1963)作出的。
- ③ 参见North and Ruttan (1987)。
- ④ 参见Skocpol (1979)的有思想深度的贡献。
- ⑤ 这一观点是由Barry Weingast与本人在一本有进展的著作中所作的阐述、拓展与描述。

11

制度变迁的路线

现在我转向讨论社会、政治与经济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如果我们回溯远久的历史，对差异性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简单。群落和部族在不同的资源赋予下面临不同的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能力，且处于不同的气候下。他们对于这些生存中面临的共同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包括不同的语言、习惯、传统和禁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解决方式是类似的，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考虑到信息成本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会趋于收敛。然而，在数万年的文明后，尽管信息成本急剧下降，尽管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的意义也表明了趋同，但不同经济之间仍存在很大差异。

由此将我们引向第二个问题。即怎样解释那些经济绩效一直很差的社会和经济的生存？从查尔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

对我们理解社会生存具有强烈影响，它已内含于阿尔钦1950年的文章发表以来的经济文献中。这一理论的意义是，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存活下来，因此，更为有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是逐渐演进来的。

我在本研究中使用了“有效”一词来表示一系列现存的制约将产生经济增长的条件。尤其是，那些能使交易双方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制度，会相对于那些不能实现这一潜力的制度而增长。由此将导致向更为成功的经济的转变，或是与这些经济中的制度竞争。下面再回到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能产生居支配地位的总收益最高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交易费用不为零，我们就可能预期不同的绩效能反映制度框架在降低交易（及转化）费用中的成功程度，但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呢？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如果制度在零交易费用框架下存在，那么历史将不会是这样：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会诱使制度的重建向有效性调整，这正是第2章的竞争模型中所描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达到今天的制度的过程是相关的，且制约了未来的选择，那么，不仅历史会是这样，而且长期的不良绩效以及长期不同发展模式将派生于一个共同来源。

1

作为考虑这些问题的最初近似，我将转向经济文献中主要研究技术进化的有兴趣部分。但是它们提出了与制度变迁类似的大量问题，尽管大多数是暗含的。这些方章中首先引起经济史家注意的是路线依赖性(path dependence)问题，它由保罗·大卫在 1985 年提出。在这篇文章中，大卫企图解释惯常的字版文字组织是怎样变得标准化的和固定的，并解释了有哪些偶然事件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存在。即便是在面对更为有效的选择时，这种类型的技术异常是很难发现的。窄轨铁路的存在，交流电对直流电的成功，煤油引擎在蒸汽引擎汽车下的生存，它们都被用于描述技术渐进变迁的特例。

一旦开始具体竞赛，可能会导致一种技术方案战胜另一种技术方案，即便到最后，一旦这一技术路线可能不比放弃的一种更为有效时也是如此。

一些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这一观点首先由 W·巴兰·阿瑟(W. Brian Arthur)发展，¹ 我将沿着他提出的线索来阐述我的观点。让我们考察一下两种都产生了报酬递增的竞争性技术，每种技术增进的方式都与组织的演进相类似(第 9 章)，每一代理组织都采用了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利用新技术和设备的更为有效的方式，不过我们不可能预测哪一种技术会产生最为有效的方式。由于报酬递增率对这两者不可能保持不变，它们也不

可能以同一比例增长。此外，在不知道原先的行为者时，一种技术的不断突破，可能导致另一种技术处于垄断支配地位，因为报酬递增暗指在一段时期只有一个获胜者。简单地讲，某些小的事件可能会使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技术更有优势。因此，一种技术将获胜并维持一个垄断地位，尽管它的成功的创新同被废弃的可选技术相比处于劣势(或一种滚雪球的游戏)。阿瑟论述过四种自我加强的机制：(1)大规模地组织或固定成本，由此产生了随着产出增加而单位成本下降的优势；(2)学习效应，随着它们不断处于支配性，会使产品改进或生产它们的成本降低；(3)协作效应，将优势转为其他具有类似行动的经济组织的合作；(4)适应性预期，它们在市场上不断处于支配性，从而增强了进一步处于支配性的信念。²

在阿瑟看来，这些自我加强机制的结果会导致四个特性：(1)乘数均衡，即许多方式是可能的，其结果是不确定的；(2)可能的无效率——一种技术内含着比另一种失效的技术更好，这是由于在获取关联性时运气不好；(3)锁闭(lock-in)——一旦达成，一种解决方案就很难退出；(4)路线依赖性——小的事件和偶然情形的结果可能使解决方案一旦处于优势，它们就会导致一个特定的路线。

这一技术变迁的观点是否能拓展到制度变迁中去？这要评论一下它的假定：阿瑟考虑了竞争性市场，代理人对最大化机会作出反应；他会分析竞争性技术，这些技术都是报酬递增的。事实上(尽管我不认为阿瑟作出了这一区别)，竞争在技术间还只是间接的，而内含于技术间的组织间的竞争则是直接的。由于结果可能反映了比竞争技术的具体方面更为

不同的组织能力(企业家的默知识),这一区别是重要的。阿瑟最终确实考虑了组织中的决策,正如本研究的制度模型一样。

2

有两种力量会使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尽管阿瑟的技术分析是与第一种力量共生的,但无论是他还是大卫都没有明确分析第二种。我下面将考虑这一点。

在一个不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市场的可竞争性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我在第2章讨论的,即如果行动者最初的模型是错误的,且对它们起作用,那么它们或者会消失,或者有效的信息反馈会诱使他们去修正他们的模型。

但是,在存在报酬递增时,制度则是重要的,阿瑟的所有四个自我增强的机制是适用的,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当制度的创立如美国1787年的宪法一样是重新开始的时候,初始建立的成本就很高,由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正如在第9章阐述的),其结果,组织将演进到考虑由该框架所确立的机会。但是正如在技术情形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所获取的技能会导致社会效率的增加。与其他组织的合约会产生直接的协作效应,通过政治团体的互补性活动会间接诱致投资。更为重要的是,正规规则将导致大量非正规制约的创立,它们会被

用来修正正规规则，以及将它们延伸到具体的应用。还会产生适应性预期，因为随着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不断居支配地位，会诱致关于该规则永久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

在存在报酬递增时，制度是重要的，它确立了经济的长期路线。但是只要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模型的，长期路线也具有这里已使用的有效一词的含义。在关于偏好的无争议的假定给定时，路线的分歧和持久的不良绩效将会处于支配性。但是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且交易费用也是十分显著的，那么，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将会被非常不完全的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那么，不仅路线的分叉而且持久的不良绩效将居于支配性，历史上由行动者派生的观念就会规定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在一个具有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中，行动者的不完全的与探索性的努力反映了在决定可得的精神构想——思想、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环境时的困难。

下面我们回到在第 10 章简要描述过的中世纪和现代西欧早期所发生的制度演进。14 世纪人口的急剧下降，改变了农民同地主的谈判力量，并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暗含合约的长期渐变，其间转化的边际只有通过历史上派生的交易成本以及历史上他们拥有的关于世界的派生模型才能理解。交易费用内含于庄园习俗中，它在确定主仆之间的关系时是不断演进的。历史上各自拥有的关于世界的派生模型包括具有主仆地位特征的不平等的地位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避免消除这一不平等时的变迁。按照历史上的这一相互关系，渐进变

迁还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制度不是属于报酬递增的，而且主观观念常常按真实的模型进行修正，那么暗含的假定是，行动者将通过再签约以达成一个更为有效的联合解决方式。事实上，由于制度框架存在报酬递增，其变迁过程是渐进式的，而且如前所述，它由正规与非正规制约以及实施变迁的缓慢演进所构成。由于在这一特例中，竞争性的政治力量以及关于双方地位的精神构想的缓慢变迁会转化为产生更有效的结果(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我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它描述为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是在经济史中也有一个例外(见第 13 章)。统观历史，代理人的经历和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却不能组合起来导致有效的结果。由于要对持续无效路线的来源进行系统的检验，我将试图用几个例子来更清楚地描述路线依赖的进程。

3

习惯法的演习这种制度变迁形式，有助于我们对整个制度变迁的理解。习惯法是以先例为基础的——它提供了连续性的实质上的可预见性，这是降低合约双方不确定性的关键。过去的决定内含于法律结构中。这些变迁在边际上作为新的案例的出现，包含着新的问题。这至少从过去的不可预见的案例来看是如此。当这些决定作出时，它们反过来又变成了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司法决定反映了在历史建构法律框架逻辑下，对信息的主观处理过程，事实上即便习惯法现在

是有效的，正如许多现代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它也是由于竞争过程会使得司法人员去改正模型。但是，如果司法的决策者是在不完全信息及他们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主观意识形态观点下行事的，那么就不应该得出这种论断。⁹然而，我们解释了司法进程，在法院处理案例之前，制度框架就由组织的有目的活动而得到了持续的和渐进的修正。

西北法案是一个特别的立法法案，它描述了历史上由路线依赖性及其报酬递增的顺流结果所暗含的派生连续性。这一法案本身对美国政治团体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基本大法。它于1787年在大陆会议上通过，与此同时，宪法会议在费城举行。这一法案是有关西部广阔土地的控制与居住的一揽子问题的第三个法案，它提供了一个将边界整合为新的联邦的框架。描述这一法案的规则来自于哪里，它们是怎样整合的，以及它们与路线依赖性问题有怎样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法案非常简明扼要，它提供了土地继承和无条件占有土地所有制的规则，并确立了边界政府的基本结构，提供了边界逐渐自治的机制。此外，它还为一个边界何时被认可为一个州作了规定。接着还有一系列性的简洁的文件，明确了边界的一系列权利(如提供宗教信仰自由，人身保护的文书，陪审团的审讯，保证合约的实施，对财产的补偿)。另外还有对印第安人良好信誉的附加规定，以及在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上的自由航行，公共借贷，土地的处置，在西北疆域内可以分割的许多州等，最后是在边疆禁止奴隶(尽管向奴隶提供了回报)的规定。

我们不难追溯大多数条款的来源。法学家的主观主义模

型可直接用于回述英国与殖民地思想的历史演进(Hughes, 1987)。在过去的 150 年间, 具体的条款已成为殖民地的政治单位的规则的一部分。这些规则包括继承法、无条件占有土地制及许多权利。不过, 因为立法者预见到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如州)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例如, 关于新州的规模以及它们被承认的条件的条款。因此, 尽管它们是以先例为基础的, 但有些也引起了争议。先例是从特许证的最先条款及从联盟文件中派生出来的, 但是由于将边界承认为新州的条件所引起的争论主要受到现有法律的相对权力和谈判力量的影响, 其中一个规则(禁止奴隶)看来是西北法案的起草者与宪法起草者之间进行投票交易的结果; 奴隶在以前的宪法条款中作为一个人的 $3/5$ 计算的方法受到禁止, 由此增加了会议中南方奴隶的代表人数(这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

西北法案提供了一个描述美国在 18 世纪的扩张模式的基本框架。尽管这一提案在当时受到新观点和争论的修正, 但它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制度演进的路线依赖模式。由产权结构、继承法及边疆的政治决策规则所引起的报酬递增特征是从法案中派生出来的, 它反过来又萌生了新的组织及在法案顺流中诱致边际改变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确实, 法案的成功反映在西部新边疆和州的影响的强增, 以及由他们的代表在为他们的利益修正土地政策上的成功努力(North and Rutter, 1987)。因此, 要理解美国土地史必须了解这个包括了制度框架与相应组织间的相互作用的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

不过, 如果已经发生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那也不

是这样。沿着这一方式的每一阶段都存在选择(政治的和经济的),它们提供了真实的选择。路线依赖性是一种在概念上使选择集合变窄的文式,它将不同时期的决策联结了起来。从过去能清晰地预言未来这一点来看,它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对上述过程进行简要的再考虑时,这些条款中有部分是从殖民地特许证中派生出来的,但是最终的条款的显著改变是以下几种因素的结果:(1)边疆进入条件上各州之间的冲突(它决定了现有州在下一轮的谈判地位);(2)北南双方在奴隶问题上的矛盾;(3)在费城同时召开的宪法会议。

现在,我们将制度渐进变迁的路线依赖特征与长期持续增长或下降模式结合起来。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增长情形中,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如第9章所述),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去它们。要注明的是,西北法案不仅提供了适应性的有效经济发展——通过无条件地占有土地制及一个明确的继承体制反过来又使得土地在低交易成本下的转让成为可能,它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体制,使得将边疆整合成州政府的政治交易成本降低。对19世纪某些相继的土地法的无效性确实无需赘述,西北法案的基本条款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它们使土地能更便利地转让,而不管它们有多么不适合。我们也可以在这以后设计土地分配方案,西北法案的基本条款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它们的成

本降到最低。

但是尽管如此，非生产性路线仍然继续存在，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约下创造了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这类制度提供了促进政治团体与经济的军事主宰、宗教狂热或直接的简单的再分配组织，但是它们为经济上储存与增加有用的知识所提供的报偿较少。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因此，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的著作及依附理论都解释了拉美经济的不佳绩效，它是以工业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及其他外在于这些经济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解释的。这一解释不仅使拉美经济的结构合理化，而且也包含增强现有制度框架的政策意义。

由于所有的经济都有为组织创造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机会的制度框架，任何经济都将反映为某些混合的结果。要记住的一点是，制度变迁的装置为那些试图使它们的边际最大化的政治或经济企业家提供了最有利的(短期)选择。不管最有利的选择是在贿赂方面投资，还是建立一个石油卡特尔，或开发一个功率更高的计算机，正是现存的制约和激励的边际变化决定了机会。但是要注明的是，代理人(企业家)不仅受到现有制度的选择的制约，而且在实现他或她的目标时具有不完全的知识。因此，即便目标是与生产率的增进一致的，也不能保证这一目标就能实现，无法预期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果(例如，一项技术突破会使得产权更不稳定以及向恐怖组织的支付额增加)。结果，在利润最大化方面

的短期努力会导致对持续无效活动的追逐(在制度制约给定时)，而且即使它们会追寻生产性活动，也可能导致无法预期的结果(当然，这也可能在另一方面发生作用；掠夺者最终可能发现，赠予财产和交易是更有利可图的，正如维京人所做的那样)。

不过，认为成功的路线会因小的事件或错误而颠倒过来，这是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特征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规则与非正规制约，它们总起来决定了经济绩效；单个的具体的正规或非正规制约的变迁可能会改变历史，但是绝大部分是不会使这一变迁方向倒转的，对美国土地政策的简要解释很清楚地表明，尽管某些具体法令是无效的，但整个制度框架(不仅由西北法案构成，而且还有两个先前的法案、内含于美国宪法的补充提案以及处于演进的同样补足性的非正规制约)降低了它们的无效结果。

路线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并在经济绩效的模型中确定它们)。但是，我们对路线依赖性的意义的严肃研究才刚刚开始。

4

为什么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会使两个社会产生差异？答案现在应该清楚了。在每一社会，变迁将会导致边际上的适

应。受影响的边际将是那些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其解决方式将由参加者的相对谈判力量决定。也就是说，组织将在特定的制度逻辑下演进。但是要注明的是，它将是一个边际调整，是建立在先前的制度安排下的。由于一个社会不同集团的谈判力量显然与另一社会不同，每一社会的边际调整一般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动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在这类情形下的边际调整就不会导致趋同。

当一系列共同的规则被强加给两个不同的社会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来描述这一点。在 19 世纪，美国宪法被许多拉美国家所采用（作过一些修正），许多成功的西方国家的产权法被第三世界国家所采用。但是，其结果与美国或其他成功的西方国家不一样。尽管规则相同，实施机制和实施方式发生了变化，行为准则和行动者的主观模型却不同，真正在经济结构和预期的正式结果也都不同。因此，相对价格的一个共同的根本变迁或一系列规则的共同强加在制度安排不同的社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

5

本章的核心是关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所发生的持续的边际调整。我们对这一变迁形式的强调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它是社会和经济已经演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正如前一章所简

要讨论的，通过武力征服或革命所发生的非连续的制度变迁也是重要的，这类制度不连续性只是坚定了我们的观点。不过，在游戏的正规规则发生根本改变时，制度制约的顽强生存是一个制度的报酬递增特征的最好证据，例如，北美和南美的革命导致了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它们从西班牙和英国的独立。北美与拉美的演进与开始时根本不同，这反映了宗主国的制度模式对殖民地的强加，一种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构想构造了行动者的观念。

在北美的情形中，英属殖民地是在这样的—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当时发生了保守党与王室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宗主国的宗教分歧和政治分歧同样在殖民地反映出来，且反映在 18 世纪的雄辩的思想与模型中。它们在王室、所有者、特许的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地方政治控制的一般发展方向以及集会的增长是确凿无疑的。同样，航海法把殖民地置于整个英帝国政策框架之内。但是，在这一广义的框架下，殖民者自由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经济。有时，殖民者本身对所有权施加的限制确实比宗主国更多。

法印战争(1756—1763 年)是美国历史中的类似突破点。英国努力对殖民地征取—个非常适当的税收，也控制了西部移民，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殖民者的主观观念是，英国的航海法威胁了殖民地的繁荣。事实上，航海法的负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理由假定，殖民地保留了英国的一部分，正如加拿大—样，他们将会成功。但是，殖民者的观念是不同的，基于这些观念的行动(由个人和组织采取的)导致了独立战争、独立宣言、联盟文件、西北法及宪法，这一切构成了—致的演进性制度模式的制度表达。然而，尽管革命

创造了美国，但革命后的历史只有根据革命前带来的非正规制约与许多正规制度制约才能理解。

在西班牙的印第安人情形中，武力征服正好发生于卡斯提尔议会的影响下降的时期。征服者给现存社会(部分是墨西哥及秘鲁人的领地，这里的农业社会发展很好)强加了统一的宗教和官僚行政管理机构。官僚组织在政治与经济的每一方面应有尽有(其中有许多有效地应用于有人居住的和有价值的地区，它比游民及空白地区更为有效)，但由于代理问题及官僚机器的控制问题而产生了不断的危机。尽管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发生了颠覆集中官僚政治的努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帝国内的贸易自由化，但颠覆是局部的，且马上就产生了负效应。代理人的控制是卡里洛人在接管官僚政权以追逐他们自己利益的努力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尽管独立战争产生了官僚控制与地方殖民地控制和帝国控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但是斗争灌输了来自于美国和法国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独立产生了受美国鼓舞的宪法，遗憾的是，结果却大不相同。在美国，宪法的实体首先是英国的遗产，然后是殖民地经济和政治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致意识形态模型的补充；而在拉丁美洲，它是一些外来的规则强加在集中官僚控制这种遗产下的，并伴随着对这些问题意识形态观念。结果，拉丁美洲的联邦方案及分散化的努力在独立后的一些年里并未起作用，这些国家分别于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恢复了具有拉美特征的官僚集中控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强加的制度模式继续在拉美政策与观念的演进中起着基本作用，而且与大陆的历史区别开来，尽管在独立后强加的一系列规则与确定了北美路线的英国制度传统相类似。¹

6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两者都呈现出路线依赖性的特征，用一个单一的模型能否解释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它们确实有许多共同点。报酬递增是这两者的实质性部分。行动者的观念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观念对模型的主观建构的影响构成了选择。在一个制度逻辑下的选择更是多重的，因为在正规与非正规制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结果，在制度情形中，无论是锁闭还是路线依赖性都比技术情形中更为复杂。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影响制度变迁的谈判力量有差异的许多行为者，以及许多非正规制约赖以存在的文化遗产的作用，这一切都构成了这种复杂性。

我在本章的结尾要强调的是这一分析的某些意义，长期经济变迁是无数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短期决定的累积结果。它们直接和间接地(通过外部效应)决定了绩效。所作的选择反映了企业家对环境的主观模型。因此，结果与期望一致的程度将反映企业家的模型是否为真实模型的程度。由于模型反映了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信仰，它们只有部分是由法律政策的实际结果所作的信息反馈所提炼与改进的。具体政策的结果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期的。即便是对政治与经济选择的最具因果性的观察，统观历史和现在，期望和结果之间都存在显然的极大差距。不过，制度矩

阵的报酬递增特征及行动者的补偿性主观模型表明, 尽管具体的短期路线是无法预期的, 长期的总体方向却是较可预测的和较难逆转的。

注 释

- ① 对阿瑟的观点的简要评述和对他的许多著作的概述, 可参见他的“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载于《The Economics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1988)。
- ② Arthur(1988), p.10.
- ③ 在“Imperfect Decisions and the Law: On the Evolution of Legal Precedent and Rules”中, Heiner(1986)在分析共同法的演讲时, 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 即代理人必须要越来越多地去解释那些不太熟悉的“非当地的”信息(这是他所用的词), 对它们的处理也是不完全的。因此, 立法程序是建立在法官可以遵循的相对简单的标准上的。这一结论正好与认为共同法的有效结果是大多数法律和经济研究的结论针锋相对。
- ④ 对拉丁美洲经验的概括可参见C. Veiz, “The Centralist Tradition in Latin America”(1980)或 W. G. Glade,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A Study of Their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1969)。

第 三 部 分

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

我们不可能看到、感受到或接触到制度，我们甚至也无法衡量制度；制度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但是即便是最令人信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它们的存在，他们一般也暗含地或明确地将其作为模型的参数。制度是否重要？关税壁垒、管制和规则是否重要？政府是否会使绩效产生差异？当我们跨越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时，我们能否解释经济福利的根本变化？是什么使市场起作用或不起作用？在交换中诚实是否会产生一种差异，它是否起作用？我希望前面章节的分析已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关于制度结果的框架。

不过，我要揭示的是，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关于变迁的动态理论（这一理论不知为何被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只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不完全的论述），就必须建立在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上。尽管其中有些疑难问题在这里仍被忽略了，但我相信所

勾勒的变迁方向是清楚的。

在以下几节我要做的是：(1) 说明新古典理论必须作出怎样的变迁才能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理论中去；(2) 概括对经济绩效进行静态分析的意义；(3) 揭示制度分析对于建立一个关于长期经济变迁的动态理论的意义。

1

行动者对信息的处理是交易费用的结果，它是制度形成的基础。这样，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是，无论是理性的含义还是交易的特征都妨碍了行动者在零交易费用模型中去实现联合最大化的结果。

新古典主义工具的理性假定认为，行动者拥有正确评价选择所必需的信息，从而能作出使期望的结果得以实现的选择。这一假定事实上暗含着存在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信息。如果信息能完全被动地起作用，它们就不会约束行动者的选择，而且行动者也拥有作出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这样，工具理性假定就是一个正确的分析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行动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他们会设计出一些主观主义模型来指导选择，而且他们根据信息反馈也只能对他们的模型作非常不完全的修正，那么，第3章描述的过程理性假定就是进行理论化的实质分析基础。

前一个假定是在西方世界高度发达的、有效的市场发展的，且被作为分析这一逻辑的有用工具。但是，这类市场具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件，就是交易费用极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我知道还没有一个用于分析当代世界中大多数市场的方法。纵观历史，这一行为假定也不存在。而另一方面，过程理性假定则不仅可以解释具有不完整和不完全市场特征的当今和过去世界，而且还可以将研究者引向到底是什么使得市场不完全的这一核心问题，这又会将我们引向交易的费用问题。

从事交易之所以会有费用，这不仅是由于信息是有成本的，交换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还由于行动者发展构成人们相互关系的制度的任何方式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市场不完全。事实上，制度的激励结果向参加者提供了混合的信号。因此，即便现存制度框架能比早先的制度框架更有利于从交易中获取收益，它仍然也具有产生欺骗、搭便车等等导致市场不完善的激励。在人类行为特征给定时，我们还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设计用于解决复杂交换问题的制度，而且与此同时，也难免存在某些不相容的激励。为此，近来产业组织与政治经济领域的许多文献都试图把握经济与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ies*). 经济史中的一些成功故事已向我们描述了那些使交易费用降低及允许从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因而使得市场扩大的创新。但是，大部分这类创新都没有产生新古典模型中的有效市场所必需的条件。政治团体对经济市场上产权的界定与实施以及政治市场的特征，是理解市场不完善的本质核心。

怎样才能使政治市场接近于适合有效市场交换的零交易费用模型呢？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很容易陈述的，即所制定的

法律应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要达成这一交换所必需的信息和制度条件是：

1. 有关双方必须拥有关于这些条款的信息和正确模型，并了解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和所遭受的损失。

2. 其结果可以传递给他们投票一致同意的可信的代理人。

3. 投票是根据总的净收益或损失来权衡的，因而可以确定净结果，受损者也能得到适当的补偿。

4. 这一交换可以在一个十分低的交易成本下实现，以使双方进行这一交换是值得的。

具有普选权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最接近于这些条件的制度结构。投票交易、对数滚动，以及新增加者在选民面前揭发竞争者的不足之处的激励从而使代理问题减少，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取得更好的结果。

但是还要考虑一下将负激励置于系统中去的问题。理性投票者的无知是公共选择理论中最感疑惑的一词，理性的投票者不仅不可能获得那些关于影响他或她福利的大多数条款的信息，而且选民(甚至包括立法者)也可能无法拥有能准确权衡结果的模型。代理理论已提供了关于立法者在有争议时会不顾选民的利益行事的程度的大量证据。就立法者而论，他们会以假定的投票数为基础来进行选票交易，这些票数是他或她所坚持的收益或损失。这常常是一个反映所有选民净收益或净损失的长期过程。怎样才会经常有一种向受损者提供补偿的激励呢？在新古典模型中实现的更好的和有效的结果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正如大量现代政治经济文献所

要证明的那样。从我的目的来看，有必要强调两个特别突出的实质性条件：即有关双方都具有准确评价结果的信息和正确模型，以及所有各方都能同等地参与决策过程。这些条件即便是在历史上能有效作出政治决策的最有利的制度框架下也是不能满足的。

由于经济规则是由政治团体来制定和实施的，产权也很难有效就不足为奇了(North, 1981)。但是，即便有效的产权被设计出来，它们也仍然具有监督和实施成本非常高的特征，这反映为所存在的负激励特性，以及提供了企图背叛、偷懒、偷盗或欺骗的方面。在许多情形下，非正规制约可能会发展出来用以减轻这些负激励的结果。尽管现代西方世界也提供了市场的运作接近于新古典思想的证据，但是它们却往往是一些特例，而且也是很难达到的。对制度的需求仍然是很迫切的。

2

制度在当代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可概括如下：

1. 经济(和政治)模型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中会发生根本变化，模型是有制度类别的，它在许多情形下对制度制约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些制约的自觉认识不仅对理论建设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公共政策问题也十分重要。我们不仅对模型在孟加拉国或 19 世纪的美国所起的作用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而且更为直接地，对它中另一些发达国家(如

日本以及未来的美国)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也无从评价。

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制度制约划定了组织运行的边界，因而使得游戏规则与行动者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可以理解。如果一些组织(企业、工会、农场集团、政治党派以及议会等等)将它们的努力用于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制度制约则为从事这类活动提供了激励结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制约对其政治经济活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补偿规则没有促进生产性活动。社会主义经济直到现在才开始承认，他们所依赖的制度框架是绩效不佳的根源，因而他们试图通过重建制度框架来再引导激励，以引导组织向提高生产率的方向发展。至于第一世界，我们不仅有必要评价整个制度框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而且还必须对现在不断发生的边际变迁的结果作自我反省——不仅要看这些结果对总体绩效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对经济的具体部门的影响。我们很早就意识到，税收结构、管制、司法决定、成文法等各种名目的正规制约，决定了关于企业、工会及其他组织的政策，因而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具体方面；但是，这些感知还没有促使经济理论去研究那些产生了这些结果的政治经济进程的模式。

2. 对制度的自觉纳入将会促进一般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去反省他们的原理所依赖的行为模型，因而能更加系统地揭示信息成本和对信息的不完全处理对行动者行为结果的意义。社会科学家已将信息的成本融纳入他们的模型中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去把握个人在处理信息的精神构想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他们的选择的影响。在经济学中，一个暗含的假定是，行动者能正确地识别他们所处境地的理由

(即具有真实的理论), 知道各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 并知道如何去进行选择(Becker, 1983)。对理性选择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先入为主已使我们无法了解信息的不完全及环境的复杂性和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知所具有的意义。勿庸讳言, 理性行动者范例不能由对人类动机的复杂性的认识以及由信息处理所引起的问题所医治。社会科学家不仅要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 而且还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影响结果的。

3. 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 制度在决定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作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进而, 通过构造人们在某些方式下的相互作用, 正规制度会影响我们为自己的行动支付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 正规制度会被明确地或偶然地用于降低按一种思想行事的价格, 它们为人们将其思想和意识形态融合到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中去提供了自由。正规制度的一个关键影响是机制性的, 如民主选择中的投票制, 科层组织结构, 它们能使代理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且会产生与其他许多经济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简单利益团体提出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影响。

4. 在理解一个经济的绩效时, 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无可争议的内在联系, 因此我们必须发展一个真实的政治经济原理。一系列制度制约是用来决定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 因而它们决定了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运作方式。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 而且在现代世界中, 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 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和各种管制, 也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有关经济的宏观方面或微观方面的模型必须要将制度制

约建立到模型中去。例如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来说，除非其实践者认识到，通过政治进程所作出的决定会显著地影响经济的运作，否则它就永不会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我们已在一个特定水平上认识到这一点，但还必须实行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更大整合，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将特定制度与政治和经济交易的结构相结合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模型化才能实现。

3

要将制度分析整合到静态的新古典理论中去，就必须修正现有的理论实体。但是，要设计一个经济变迁的模型，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因为还不存在这类模型。路线依赖性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这一方法所给出的承诺是，它可以拓展新古典理论的最具推断性的部分(无论是稀缺性/竞争假定，还是作为其推动力量的激励)。但是，要对该理论作出修正，就必须要将不完全信息和对现实的主观模型以及制度的报酬递增特征融合进去。其结果，这一方法有可能将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与由制度框架提供的宏观层次的激励连结起来。渐进变迁的源泉是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为增进他们的目标从技能、知识以及信息的获取中取得的收益。路线依赖性来自于报酬递增机制，它能巩固曾经给出的路径的方向，而路线的交替则来自于选择的无法预期的结果、外部效应以及那些外生于分析框架的力量。路线的逆转(从停滞到增长，反之亦然)则可能来自于上面描述的路线

交替原因，但是它一般是由政治团体的变迁导致的。

下面我将再回到第 11 章讨论的英国—北美路线与西班牙—拉美路线的比较，来拓展路线依赖性的有关特征。

背景

在 16 世纪初，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演进路线非常不同，英格兰已发展起相对集中的封建制度，这是诺曼征服的结果，并由波斯沃斯战争(1485 年)建立了都铎王朝。与之相比，西班牙则是从 7 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统治时期就已形成。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费迪南德的与伊莎贝拉的联姻使卡斯提尔与亚拉冈合在一起，但它们在规则、议会和政策方面仍然继续维持分治。不过，英格兰和西班牙在与欧洲其他正在形成的国家的关系方面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面对军事费用的上升，他们都需要获得追加收入来维持生存，国王过去还能自己养活自己，即他能从他的地产及传统的封建权益中获取收益；但是随着新的军事技术(如弩、长弓、矛、火药)的有效使用，这些资金就不够了。约瑟夫·熊彼特(1954 年)首先分析了国家的这一财政危机，这一危机迫使统治者与选民进行谈判。这两个国家在选民方面发展起某些代议制形式(英国的议会和西班牙议会)以换取收益。尽管新的技术使这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都发生了变化，但其结果却根本不同。在英国，它导致了用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的政治与经济的演进，并使它主宰了西方世界。而在西班牙，尽管它初始条件更为有利，但却导致了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没收财产、不稳定的产权以及三个世纪的相对停滞。

在英国，统治者与选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 1215 年的大宪章。财政危机后又是百年战争，斯塔布斯描述了这一结果：“议会的权力被立法承认，它能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调查，并能分享对国家政策的指导。这些权力实际上是用货币从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那里购买来的。”(Stubbs, 1986, p.599)此后直到 1689 年的历史以及议会的最终建立则是众所周知的。

在西班牙，亚拉岗联盟(差不多由瓦伦西亚、亚拉岗及卡塔罗尼亚人组成)以及卡斯提尔加入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地区。亚拉岗是在 13 世纪最后 50 年再次被阿拉伯人征服，它已变成一个延伸到萨丁尼亚、西西里及希腊的一部分的主要商业帝国。议会反映了商人的利益，并在公共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与之相对的，卡斯提尔人却在继续从事战争，他们或者反对穆尔人，或者进行内战。尽管议会是存在的，但它很少聚集起来开会。在它们结盟后的 15 年，伊莎贝拉不仅成功地控制了那些战争狂似的男爵，而且还控制了卡斯提尔人的教堂政策。尽管在近来的学术著作中，卡斯提尔议会的作用有所提高，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卡斯提尔是一种集权的君主制和官僚化制度，而且正是卡斯提尔人确定了西班牙的拉丁美洲的制度演进。

制度框架

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集中化或分散化来区分两个社会，这一特征确实是使它们产生重大差别的关键，而且是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差异的征兆。英国议会不仅使代议制政府开始，并使陷入财政危机的斯图亚特王付出的条租行

为减少，而且议会的胜利表明产权的稳定性的增强和一个更为有效的公正的司法体的建立。

西班牙政体却由极其集中的官僚系统所组成，“对日渐成长的判决司法指导实体的管理，既使行政管理机器合乎义理，而且也决定了其行动过程”（Glade, 1969, p.58）。经济与政体的每一具体方面都是为了增进国王的利益以创立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有力的王朝。但是，随着荷兰人的反叛，加上新世界财政流入量的减少使得财政需要远远大于收入，其结果是破产、国内税收的增加，没收以及不稳定的产权。

组织的意义

在英格兰，议会创立了英格兰银行，并建立了一个将开支与税收结合起来的财政体制。金融革命不仅使政府建立在强有力的金融基础上，而且也为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更加稳定的产权、对商人限制的减少以及纺织企业逃避城市行会的限制，这几项因素为企业在国内及国际市场提供了扩张的机会。市场专利法的创立也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西班牙，1557年至1647年间银行不断地破产却与那些为避免灾难所采取的危險方法连起来。战争、教堂及对复杂的官僚体系的行政管理则为西班牙提供了主要的组织机会，其结果是，军官、教士以及司法官成了报酬丰厚的职业。穆尔人和犹太人的被驱除，对土地租金上限及小麦价格上限的规定以及对在塞维利亚的商人的白银汇款的没收（给予他们一种称作 *jueros* 的相对低契约的补偿），这些都是对生产活动产生负激励的象征。

路线依赖性

为了使上面的简要对比成为对路线依赖性的一个可信描述，有必要将每一社会的政治、经济与司法体系解释为构成制度矩阵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正规规则与非正规制约的一个网络。正是这些规则将经济引向了不同的路线。必须论证的是，网络的外部性限制了行动者的选择，而且妨碍了他们对制度框架进行根本改变。这一分析任务是我所熟悉的现有经验证据难以胜任的，我只能通过这些证据间接地推断这些含义。

艾伦·麦克法兰在一份有争议的研究《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年)中指出，至少从13世纪起，英国就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农民社会的传统特征。一些传统特征(如家长制、延伸性家庭、妇女的低下地位、联系密切的农民村社、自给自足、家庭作为工作单位)到13世纪就不复存在了。他所描绘的情况是具有易变的个人主义导向的，在其中，家庭结构、劳动组织以及受有关财产、继承、妇女的法律地位所补充的村社社会关系。麦克法兰要表明的一点是，英国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其差别可回溯到以前的历史。不过，在表达这一观点时，他收集的大量证据却清楚地表明，正是正规制约与非正规制约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依赖系统，才促进了路线依赖性的报酬递增特征。

在西班牙的制度结构的报酬递增特征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尽管国王和其官僚组织意识到国家的衰落，但他们却无力改变西班牙路线的方向。在17世纪，西班牙从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最有实力的国家降为第二位。乡村人口减

少，工业停滞。在加泰隆人和葡萄牙人叛乱的同时，拥有新世界的贸易体系也瓦解了。最直接的缘由是周期性的战争以及财政危机，使奥利韦拉斯(1621-1640年)去寻求一些冒险措施，但这些措施却使得基本问题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制度制约逻辑及行动者的观念下，被认为可行的一些政策就是价格控制，增加税收以及一再地对财产进行没收。从行动者的观念来看，简·德·弗里斯在他对危机时期的欧洲的研究中(1976年)，描述了他们为扭转衰退所作出的努力：

不过，这还不是一个对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意识的社会。所有的经济改革家……提出的新措施堆积如山……在1623年一份题为“Junta de Reformation”的给新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建议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鼓励早婚(因而能刺激人口增长)的税收政策，对拥有仆人数量的限制，建立一个银行，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关闭妓院，以及禁止在小镇上教拉丁文(以减少同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的冲突)。但是却找不到力量来完成这些建议的意图……据说只有一项改革实现了，那就是不准穿皱领大衣，这一时尚是那些濒临破产的洗衣店施加给贵族的条款(De Vries, 1976, p.28)。

将工具理性用作政务会的理论基础看来是有疑问的。

尽管英格兰和西班牙在17世纪都面临财政危机，但是，它们所走的不同路线看来已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所依赖的制度特征。

下游的结果

美国经济史的特征是，有一个联邦政治体制、检查与平衡机制以及一个促进长期合约达成的基本结构，它是资本市场的创立以及经济增长的实质。尽管在其整个历史中曾有过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内战，但它也没有改变其基本制度矩阵。

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经济史却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化传统，下面是约翰·科茨沃斯描述的墨西哥在 19 世纪的制度环境特征：

干预主义以及制度环境中普遍的仲裁性质，迫使每个企业、城市或农村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方式下运行。他们利用亲戚关系、政治影响以及家庭地位来获得补贴信贷的特权，利用各种策略去征招劳工，去征收贷款和实施合约，去逃税或去困扰法院，以及去保护或维护土地权益。在经济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常常取决于生产者与政治当局的相互关系。地方当局在安排事务时会先考虑同自己亲近的人，如果情况需要，殖民地的中央政府也会对法律和地方层次的干预作出象征性的解释。小型企业被排斥在法人特权和政治有利者系统之外，它们被迫在一种长期是半公开的状态下经营，常常处于法律的边缘和那些下层官员的恩惠下。他们从未得到仲裁法的保护，也绝不可能阻止那些强有力的人的权利(Coatsworth, 1987, p.94)。

英国和西班牙在新世界所确立的两种不同路线还远没有归一，尽管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起作用。在前者，制度框架已演进到允许政治稳定及为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复杂的非人际交换。在后者，人际关系仍然是大量的政治经济交换的关键。制度框架演进的结果既没有使政治稳定，也没有实现现代技术的潜力。

经济史上的稳定与变迁

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它已为人们创造出秩序，并试图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和转化成本，因而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性与可行性。它们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了起来，因此，经济的历史绩效主要是一个制度演进的渐进过程，它只有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才能得到理解。它们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一相互关系对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结果的关键。但是，为什么某些交换形式是稳定的，而另一些却导致了更为复杂的生产交换形式呢？我已讨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方面，现在我将揭示历史变迁的具体特征。

在检验历史上的稳定与变迁时，首先一个要揭示的问题与本研究开头提出的问题相同(见第2章)，即怎样的制度组合才能允许在任何时候都能从标准的新古典(零交易费用)模型中内含的交易中获得收益呢？这一问题放在一个历史逻辑下就显得更为

复杂。历史之所以十分复杂，是因为历史往往不是从部落开始的，而是从过去的历史演变而来的。在前面几章阐述的历史的路线依赖性模式，在某些情形下导致了没有演进的稳定交换模式，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则发生了动态变迁。在本研究发展的观点认为，现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组织形式，以及它们的最大化方向是由制度结构提供的机会集合派生出来的，而它反过来又会发生渐进的演变。为什么在有些情形下是稳定的，而在其他情形下则发生了变迁呢？我们下面将先描述经济交换的某些更为复杂的形式，然而转向为实现这些交换形式所必需的制度与组织结构。¹

1

让我从一个村社的地方交换甚或从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简单交换开始(在这种社会男人从事狩猎，女人从事采集)。这一世界的专业化是初级的，大多数户是自给自足型的。贸易扩大迈出的最初细微的一步是超出单个村社范围，专业化已有某些增加(常常是用于对大多数自足户的补充)。随着市场扩展到区域贸易，它不仅意味着在一个更大区域的多重贸易的增加，形成了一些用于贸易的专业化市场，而且从事交易的合伙人也急剧增加。尽管在这一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仍占绝对比例，但从事贸易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则在日益增加。

长距离贸易的演进和发展，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显著变

迁。这类贸易要求一些人为了生计在其交换过程中更加专门去从事贸易，这暗含着贸易中心的早期发展。这些贸易中心或者是临时的聚集地(如欧洲的早期集市)，或者是更为永久的集镇和城市，在例如种植农业中的某些规模经济就是这一世界的特征。换言之，地理的专业化开始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而且还发生了某些职业的专门化。

市场扩张的下一阶段必须要有更加专业化的生产者。规模经济导致科层生产组织的开始，以及在一个集中的场所或一个连续的生产流程中工作的全日工，形成了集镇和某些中心的城市，人口的职业分布现在开始显示出来。此外，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剧增，尽管人口仍以农业为主，它也反映为向城市化社会的显著转变。

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现代西方社会。专业化增加，农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巨型市场具有全国和国际性特征。规模经济意味着大规模的组织，它不仅在制造业是如此，在农业中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承担一个专门的功能，而且他们的生活依赖于一个提供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存在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劳动力的职业分布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最终以服务业为主。这是一个绝对城市化的社会。

2

我们已通过各种方式熟悉了这些经济史的阶段性故事。

无论是德国历史学派，还是更近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都揭示了这一点。不过，我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关于这些阶段的特征的不同故事：我要检验的是，要使交易与转化的成本所达到的水平能允许日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生，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

小规模个村社贸易存在于一个受非正规制约约束的紧密的社会系统内。这些非正规制约促进了地方交换，在这一类逻辑下的交易成本也很低。尽管部落和村社组织的基本社会成本可能很高，但他们没有反映在交易过程的追加成本中。人们相互之间有明确的了解，对违约的恐惧是保护秩序的持续力量，因为他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也有意义。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地区间的贸易导致更高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已被交易者之间不常进行的交易合约所替代。因此，必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衡量和实施。在这一世界，一般没有集中的政治控制，也缺乏任何统一的政治结构和正规规则，宗教戒律常常能对交易者的行为准则施加约束。它们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取决于人们所掌握的这些戒律对交易者的约束程度。

长距离贸易的增长，提出了两个独特的交易成本问题。一个是古典的代理问题，它在历史上常被用于交托组织(commenda)以及其他在长距离贸易中使用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早期组织形式中。也就是说，一个坐商会送给他的亲戚一般货物去进行销售谈判，并获得一般货物的回报。衡量绩效的成本，血缘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背信弃义的代价，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类协约的结果。随着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的扩大，这一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主要的困境。第二个问题，就

是在世界的其他陌生地方的合约完成与实施问题。在这里，没有任何用于实施合约的便当方式，实施不仅意味着在海上和陆地抢掠途中物品和服务的保护，而且还意味着在一个陌生地区对协议的实施。标准度量衡以及计量单位、交易手段、公证员、领事、商事、法院以及通过外国王储来保护国外飞地以获取收益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以及这些组织、制度与手段，使得交易和从事长距离贸易成为可能。自愿的和半强制性的组织的组合，以及那些能有效地驱逐违约协议商人的组织，使得长距离贸易得以发生。

下一阶段，是资本市场的创立与具有大额固定资本的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随着交换的更为复杂的和非人际形式的演进，人际连结、自愿的制约以及被驱逐的恐吓变行不再有效。这并不是说它们已失去了重要性，它们在我们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缺乏有效的非人际合约议定的情况下，从违约中获益太大已妨碍了这类复杂的交换的达成。稳定的产权要求政治和司法组织有效地公正地实施跨空间和时间的合约。

在最后阶段，专业化使得一个社会用于交易的资源比例增加，因而交易部门构成国民总产值的一个很大比例。这一情形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贸易的专业化。金融、银行、保险以及经济行动中的简单合作，使得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增加。因此，它们必须要有高度专业化的交易组织形式。国际专业化及劳动分工要求有保证跨国间的产权的制度与组织。这样，资本市场和其他交易形式就可以可信地委托给其他交易者。

上面描述的非常公式化的阶段可以合并成另一个关于合

作演进的有趣故事。但是它们是怎样演进的？使游戏参与者从欠复杂的交换形式转向更为复杂的形式有任何必然联系吗？在这一演进中，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是，不仅较低的信息成本、规模经济以及合约实施的增进与发展将允许和促进经济交换从较简单的形式过渡到更为复杂的形式，而且那些组织也具有获取知识和信息以诱使它们向更具社会生产性的方向演进的激励。但我们要非常仔细地注意的一点是，统观历史，还没有一个使这一发展发生的必要理由，它可能确实论证了我们所描述的且在当今世界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大多数早期交换和组织形式。原始部落社会仍然还存在，斯库克(中东市场经济中从事的区域交易)仍然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进行，尽管商队贸易已经消失了，它的衰落(以及其他两种原始交换形式的逐渐消失)是外部力量的反映而非由于内部的演进所致。

相比之下，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则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也就是说，长距离贸易的开始通过较低的信息成本、规模经济以及地方实施合约的发展，诱发了西欧的演进模式同上述原始交换形式的稳定性形成鲜明对照。各种学习和技能形式在威尼斯地中海贸易或香槟集市以及在汉萨联盟贸易中的鲁贝克，都诱发了更为复杂的制度安排的创立。不管我们是考察汇票的演进，还是研究商业法规加入正规法律步骤，我们发现，在贸易机会扩大的逻辑下，正是组织对获利机会的追逐促进了制度的演进。

有些经济的演进已产生了一个能允许第三方实施发展的政治结构，以及一个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复杂制度结构。即便是在西欧，也不是所有经济都以同样的方式演进。

相反，在有些情形下(如西班牙)，由于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了破产及对生产性制度创新的负激励，因此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结果。通过更深入地检验交易的原始形式以及西欧的发展，我试图集中于对第一种情形下产生了制度和组织稳定性的力量同第二种情形下导致了动态经济变迁的力量进行对比。

3

最早的人类交换形式可能也确曾发生于没有语言的时候：记号语言和用臂膀的长度来观测物品都曾作为交换的基础(至少是如希罗多德所言)。有规则的交换在家庭还没有兴起时就存在了，交换的规则曾由家庭团体间因担心不和而实施。不过，在部落社会的交换也并不简单。尽管正规的成文规则没有国家支持，但它为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所补偿。由于我在第5章已描述了这种交换形式，这里我只追加一点对伊丽莎白·科尔松(1974年)的简单引证：

在社区里，所有人在一个微妙的权力平衡的约束下生活。在这里，他们常常受到危害，但从不予以考虑：每个人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时，他不得不表达他的良好意愿。在关于人们在不同情形中的行为是否正确的判断给定时，习俗和习惯就显得很不灵活和易变……但这正是因为人们是在被评价，而不是犯罪。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受到蔑视，就相当于被宣

布为一种不合义理的权力，而且成了被反对的部分证据。(Colson, 1974, p.59)

科尔松的分析与理查德·波斯纳(1980年)分析的含义是，离经叛道和创新可被视为是一种对团体生存的威胁。

第二种交换形式——斯库克(the suq)——已存在了数千年，且在当今的北非和中东仍然存在，它具有广泛的、相对非人际交换的以及交易成本较低的特征。²其基本特征是，小规模企业的多样性(使得全镇40%—5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于这一交换过程)，低廉的固定成本，非常细微的劳动分工，种类繁多的小型交易(每一种交易几乎却与下一种交易不相干)，面对面的接触，以及不同质的商品与服务。还没有特定的制度来集合与分配市场信息，度量衡制还十分复杂且没有完全标准化，交换技能已达到非常全面的发展；他们各自的所有权都作了标记，且是集市上认兴隆谁不兴隆的首要因素，他们在有关交换的方面的条款上的争论十分普遍，且十分激烈和争论不休，买卖没有实质的差别，而是单独的一项活动。交易过程包含着对具体合伙人的不断搜寻，他不仅仅是对一般公众的商品提供者。解决争端的规则包含对事实的可行证据，它们不是不仅仅有对竞争性的司法原则的衡量。政府对市场场所的控制是边际的、分散的，且大多是华而不实的。

概言之。斯库克的主要特征是：(1)高昂的衡量成本；(2)在委托人(clientization)方面的不断努力——也就是说，与其他合伙人的重复交换关系的发展并不是最完全的；(3)在每一边际的煞费苦心的讨价还价……其核心是人们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利。实质上，这种游戏的名目是要

提高其他参加交换的人的交易成本。

我们不难理解在部落社会中的创新为什么被视为一种对生存的恐惧，但却很难理解这些无效的讨价还价形式为什么在斯库克中会继续存在。我们可以预言，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中，自愿的组织会演进到能保证抵御这类信息不对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但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斯库克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法律制度的基础和司法实施将使得这类自愿组织成为可行和有利可图。在它们不存在时，就没有改变这一体系的激励。

在一个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又不存在有组织的国家的世界，贸易是怎样进行的呢？商队贸易向我们描述了精致的非正式制约会使这类贸易成为可能。C·格尔茨(1979年)提供了本世纪初摩洛哥的商队贸易的情形：

从狭义来讲，“一小片布”就是一种通行工具(它源自于北非柏柏尔人的“TAZETTAT”)，当商队在穿入那些强人控制的地区时，他们要向他支付一笔金额以换取保护，但事实上或更恰当地讲，它还不仅仅只是一笔支付，而是整个复杂的道德仪式，以及具有法律和尊严力量的习俗的一部分——这些习俗集中于宾主关系托庇关系，原告与被告关系，流放者与保护者的关系，以及祈灵者与神灵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是摩洛哥农村所有交易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方式。当一个外来的贸易商(或至少是他的代理人)进入部落的物质世界时，他也进入了其文化世界。

尽管大量特定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是它们各自的特征，但在阿特拉斯山脉高原和中原的柏柏拉社会，其保护的特征是十分明了的，且没有变化。保护是个人的、绝对的、

明确的，且被想象为是对一个人声誉的修饰。声誉可能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个性特征上的，有时还包括所有这四个方面。交易的实质是——一个人对那些认为“这是我的人，你伤害他就是侮辱我；侮辱我你就要负责”的人的“敢说敢为”（正如这句口头禅所说的）的考虑。祝福、殷勤、庇护，以及平安通过就等同于：他们依赖于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概念：尽管个人从其本质和表象来看是个人的，但它不可能不打上其他人的特性的印记（C·格尔茨，1979，P.137）。

4

部落组织，斯库克及商队贸易是一些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合作非常有限的稳定模式，在这几种情形下，组织或其中的个人的成功对技能和知识的需求不一定会诱发对基本制度框架的生产性修正，它们的制度变迁的源泉来自于外部的力量。

相比之下，在现代欧洲早期，长距离贸易的历史则是一个组织的更为复杂的连续的故事，它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我将首先简要描述创新，然后揭示它所依赖的某些源泉。

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由组织创新、创新手段、特定的技艺和实施特征组成。这些创新是在以下三个成本边际上发生的：（1）使资本的流动性增加；（2）使信息成本降低；

(3) 使风险分散。很显然, 这种分类有些重复; 不过, 它们提供了一个区分使交易的成本降低的特性的有用方法。所有些这创新在早期都有其源起, 它们其中大多数是从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或伊斯兰国家或拜占庭借鉴而来的, 且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变得更加复杂。

在影响资本流动性的创新中, 其技艺和手段的演进是为了逃避高利贷法所致, 这些伎俩高超的方式使利息隐蔽在贷款合同中, 其中有“不按时偿付就受罚”的规定, 有操纵汇率的(Lopez and Raymond, 1955, p.163), 还有早期的抵押形式, 但所有这些方式都增加了合约的成本。高利贷法的代价不仅使得合约的书写隐蔽了利率的复杂性和麻烦, 而且也使这类合约的可实施性更成问题。随着高利贷法的逐渐被废除, 以及允许较高的利率, 书写合约及实施合约的成本也降低了。

在影响资本流动性的创新中, 还有其他一些也引起了极大注意。这就是汇票的演进, 尤其是那些允许谈判的技艺与手段的发展和贴现方式的发展。谈判与贴现又取决于所创立的一些制度能允许那些使这类事务得以进行的交易中心的利用与发展。这类中心起初是集市(如香槟集市), 接着是银行, 最后是可以专门进行贴现的金融机构。这些发展不仅是特定制度的函数, 而且也是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数量的递增使得这类制度发展成为可能。除了规模经济所必需的汇票的发展外, 合约可实施性的改进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会计、审计手段的发展与其使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征收, 借贷及合约的实施, 就是这一改进十分重要的证据(Yamey, 1949; Watts and Zimmerman, 1983)。

影响资本流动性的第三项创新是由为控制长距离贸易中的代理人问题所引起的，在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对这些问题的传统解决办法是，利用亲缘和家庭关系来约束代理人，由他向委托人作出委托人的指令能得到有效贯彻的保证(教堂对代理人的控制较为成功，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上帝或信仰的恐惧)。不过，随着商业贸易的范围和规模的增加，离散性行为已延伸到委托人的亲属以外的人，这就要求有对代理人行为进行监督的更为精细的会计程序的发展。

在降低信息成本方面的主要发展是对各种商品价格的印刷，以及对各种手册的印刷，它们提供了关于重量、标度、习俗、佣金、邮政体制，尤其是关于欧洲的金融家与贸易世界之间的复杂汇率的信息。显然，这些发展是国际贸易量的函数，从而也是规模经济的结果。

最后一项创新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能确定一个事件的概率，因而无法达成一致的方式。而风险则意指对一个事件的发生的可能性作出实际决定的能力，因而能对这一结果进行担保。我们认为，现代世界的保险和责任分散是将不确定性转变为风险的方式，通过对套头交易以避免易变性的规定，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当我们在考察中世纪和现代世界早期时，我们能准确地发现相同的结果。海上保险从只对那些偶发性事件支付部分补偿的合约向由专门的企业来签定的合约的演进就是一个例子。

到 15 世纪，海上保险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在这之后的 300—400 年间，保险单已变成了铅印形式，但变化很

小……在 16 世纪，印刷形式已经通用，单子上有一些空格供填写船名、船长名、保险额、保险费以及其他一些便于不同合约填写的项目(de Roover, 1945, p.198)。

海上保险是一个关于有记载的可查明的风险发展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商业组织通过责任分散或通过一些允许投资者去从事有风险的活动制度的制度来分散风险，交托组织本身从犹太人、拜占庭人及穆斯林人的源起(Udovitch, 1962)，经由意大利人之手到英国人的有规章公司，最后到股份公司的演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将风险制度化的演进性故事(尽管如本章后面要讨论的，这些发展产生了对委托人而言的新的代理问题)。

某些特定的创新及制度手段的演进，是两种基本的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与贸易量增长相联的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实施机制的改善与发展，使得合约以低成本实施成为可能。确切地讲，因果关系是沿着两种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长距离贸易量的日益增加，提高了商人设计有效的合约实施机制的报酬率，而且这类机制的发展又降低了合约完成的成本，并使贸易更为有利可图，从而也使贸易量递增。

当我们考察实施机制的发展时，我们会看到，这一进程是很长的。尽管有许多法院在处理商业纠纷，但商人们自己实施协议机制的演进也是十分有意思的。³可实施性可能是在内部行为准则对在指导商人的兄弟般秩序的发展中开始的；那些不履行诺言的人会受到被排斥的威胁，商人们在长距离贸易中会铭记这些行为准则。因此，比萨法律在马赛的海上准则中也通用。奥雷隆和鲁贝克产生了欧

洲北部的法律，巴塞罗那产生了欧洲南部的法律，而意大利则产生了保险与汇票的法律原则(Mitchell, 1969, p.156)。

更为复杂的会计方法的发展和这类方法的使用以及纠纷事件中的公证记录，使得证据成了确定纠纷事实的基础。自愿合约实施结构与由国家实施的内部商业组织的逐渐融合，是合约越来越具有可实施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商人法从自愿开端与普通法和罗马法在解决问题的不同的长期演进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两类法律从一开始就互不相容，这在保险合同中出现道德危险和信息不对称时以及在交换中出现欺诈行为时尤其如此。关于商人准则的法律是由英国的共同法法院所采纳的，且继续按商事法的最高宗旨来执行，也就是说，作为一项法律，它是以习俗为基础的。案例偶尔也会被制定成特定的规则，因为它无法将习俗与事实分离开来。当习俗为事实所支持时，其习惯是，将习俗和事实交付给陪审团，法官将委托陪审团来决定与应用习俗。这一政策最终也发生了变化，当曼斯菲尔德勋爵于1756年成为英国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时，他沉湎于现存习俗，并建立了一些用于裁决未来案例的一般原则。他不太喜欢英国人的普通法，因此，他所确立的许多原则是从外国法学家的著作中派生出来的(Scrutton, 1891, p.15)。

法律商人除了为商人的独特需要提供所必需的法院外，还促进了某些旨在降低交换的交易费用的重大发展。在这些发展中可能包括委托人对其代理人的责任的认可[它建立于委托契约(mandate)的罗马法基础上]。它既产生了收

益，也招致了成本，它允许商人扩大他的经营范围及增加代理者人数，但同时也增加了委托—代理问题，这一法律认可最初只是对委托人已熟知的代理人有效。事实上这一般是给予了代理人以信誉，因为一般来说，代理人会按主人提供给他们明确机会行事，这也使代理人自己受益。不过与此同时，为了控制委托—代理问题，也会在此时利用特权。在代理人将委托人给他的信誉特权扩展来从事个人交易时，商人可以用使代理人丧失目前地位的办法，来提高他这样做的机会成本，如果代理人滥用他的地位，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他的工作，而且还有信誉的价值。

商事法规对合约及销售的效应尤其促进了贸易的扩大，既有的罗马法和德意志法并没有为商人提供他们在谈判中所需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保护商人们所购买的物品在失窃后的原先所有者的权利。封建地主对集市和市场价格的认识只限于它是收入的一个来源，以及具有保护诚实买者的重要性。在商事法规下，如果物品再回到原先的所有者手中，诚实的买者被允许保有其物品或偿还其购买价格。

对诚实买者的保护不是普通法的一部分。不过在商业纠纷中，良好的信誉原则较早就在一个更大的范围被使用（罗马契约法的基础源于公元200年），它首先是从集市契约演进而来的，在集市上的销售只有在契约上签印后方可生效。它起初是一个自愿的措施——集市的习俗允许通过证人来定借贷合同签约，避免欺诈和同时以使收益增加的期望，需要有一个使所有的销售都能通过一个密封的契约所认可的法律，一旦密封，其契约即行生效，它只有在其封

条被证明是伪造的时候才无效。

商人法的许多规则之所以得以发展，是由于普通法妨碍了贸易。例如，当被窃物品完全回到原先的所有者手中时，普通法未能保护诚实的买者，这就向商人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要完成这一搜寻所需的成本和时间是抑制性的；且造成了第一个作为普通法例外的商事法规的形成，这种状况 13 世纪至 16 世纪的发展可以通过对拥有欺诈骗权力的物品买者的处置方式来衡量。在 13 世纪，当物品的购买者发现所购物品与所要求的不符合时，他会将它们退回给物品的所有者。到埃德蒙兹·科克于 1606 年被任命为首席法官时，对一种物品的最终(信誉良好的)购买者在某些法院被承认对物品具有唯一可行的权利，这使得他所进行的任何合法购买都能以合法的方式回到所有者那里。

在这一演进中，一个主要的游戏参与者是国家。国家的财政需要与它在与商人和一般市民的相互关系中所享有的可信任度之间起着连续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演进受到国家政策的重大影响。由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它所作的不没收财产或不滥用强制权力来增加交换的不确定性这些承诺的约束，这使得金融制度的演进和更为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创立成为可能，统治者的裁决行为的束缚以及非人格化规则的发展对国家和自愿组织都成功地施加了约束，这是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一种制度流程的发展中，政府的信贷循环成了一个有规则的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政府通过有规则的税源来筹措信贷的过程，是资本市场演进的主要步骤。(Tracy, 1985;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在荷兰；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正是这些众多的创新和制度一起形成了有效的现代市场的雏形，它使得交换和商业的增长成为可能；一个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商人；一些有助于长距离贸易的有效办法也得到了发展，它们正如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贴现手段所起的作用一样，也使得从事这一贸易的成本降低，一些用于分散风险以及将不确定性转换为可记载的可查明的风险的技艺的发展，以及一些大规模市场的创立，却使得信息成本降低，以及有谈判力的政府负债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Barbour, 1950)。

5

这些关于稳定与变迁的历史，都是一些关于人类经济条件方面存在的核心疑难问题。在前一情形下（原始交换下），行动者的最大化活动并没有诱发知识和技能的增加，或去修改制度框架来诱发更大的生产率；在后一情形下（西欧），演进是一个渐进变迁的过程。它是由人们为了实现私人所得，通过提高生产率而使制度和制度发生变迁所诱发的。为了使这个过程更为可信，有必要将西欧的变迁同知识存量与其应用方式的演进以及与经济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在将欧洲与中国、伊斯兰及其他地区进行对比时，所作的传统解释是，成败的差异是由政治单位之间的竞争所

引起的。这种竞争无疑是该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显然不是全部。欧洲也有部分没有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停滞了数世纪，欧洲其余部分的经济增长也并不均衡。正是荷兰和英国成了制度变迁的发动者，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的路线依赖性特征表明，英国和西班牙的不同初始条件在这两个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注 释

- ① 我在19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有许多区域经济其开端是从一种出口型经济演进而来的。这一观点正好与我们已根深蒂固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相对立，在那里，演进常常是从地方自给自足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加。我们这里所提供的模型是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模型，尽管它不可能对许多情形的特征都作出正确的描述。
- ② 有一大批关于the suq 的文献，我尤其依赖于Geertz、Sefrou、Morocco 对the suq 的精致分析。
- ③ 下面对法律演进的简要讨论要特别感谢由华盛顿大学法律系的 John Drobak 和 William Jones 以及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 Dick Helmsoltz 对初稿的批评性评论，我要感谢他们，但他们不必对这里的任何错误负责。

1

将制度分析明确地融入经济史的著作（及读物）时，会使之与一般历史著作有哪些差别呢？写历史构造的是一个关于一定时期人类生存的某些条件的有关故事。这一构想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我们不是要再造过去；我们建构的是关于过去的故事。但是，对于一部好的历史，故事必须要给出一个一致的、有逻辑的解释，同时它要受到可得证据和可得理论的制约，对这一问题一个简要回答是，将制度融入历史，能使我们比在其他情况下讲述一个更好的故事。计量经济史实际上是建立在制度上的，那些最成功的实践家都设法向我们提供一个连续性的制度变迁图景。也就是说，提供一个演进性的故事。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支离破碎的理论与没有整体结构的统计上的，因此，不能用它来将超出单个故事的具体特性进行一般化或加以分析。计量史的贡献就在于它将一个系统的理论（新古典理论）应用到历史中去，并将复杂的数量技术应用到历史模型

的说明与检验中去。

不过，我们已为不加分析地接受新古典理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将价格理论系统应用于经济史是一个重大贡献，但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是在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而历史学家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中的一个限制性特征是，要解释历史的变迁。此外，在新古典理论中假定资源配置发生于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制度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世界。这两个条件都远离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真实问题：即试图解释他们社会在历史上的成长、停滞与衰败的不同模式，以及揭示人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极大差异性结果的过滤方式。

通过将新古典理论应用于历史，经济史学家就能研究选择和约束，这两者对所有物品肯定都是适合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考察是哪些制约确定和限制了人类的选择集合。不过，制约不是由人类组织的局限性所强加的，而只是由技术的限制和收入所施加的。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即便是技术也常常被作为一个外生的因素，从未真正将它放到理论中去。尽管在技术史及技术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上，已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但技术实质上仍被置于任何正式的理论之外。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¹

但是，马克思的故事所得出的结果是乌托邦的(尽管沿着这一方式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更加有害)，这

--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

计量经济史家也将技术置于中心位置，确实，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史上的巨大分水岭，是建立在 18 世纪发生的不连续的制度变迁率上的。它使得技术成了人类福利的创造者，它所论述的是一个关于生产能力递增的简单的乌托邦故事。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按照这一理论，人类要实现其结果，人类行为就必须实行根本的变迁，但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一变迁的证据(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 70 年后的今天)。传统的史学家集中研究的是工业革命，技术变迁被作为乐观的核心，这可能也是不足的，因为许多世界还没有实现技术的潜在收益。现代技术确实可能会解决许多人类冲突问题，但技术确实也使得冲突更为僵持。

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故事，它研究的是人类为解决合作问题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一研究角度的优点是，它不仅能把握技术，而且能把握构造文明的人类努力的其他方面。

2

对技术的强调是经济史著作所作出的值得称道的突出贡献。二战以后，由西蒙·库兹涅茨、W·W·罗斯托、E·丹尼森、M·阿伯拉莫维茨、J·肯德里克等人所进行的大量研究，通过对生产率变化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尽管这 40 年的研究仍未揭示出生产率变化源泉的所有

神奇性，但是它们增进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基本力量的知识，对生产率增长的关注无疑是在朝着揭示这些基本力量的正确方向迈进。技术提供了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为了使本书的逻辑简单化，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社会人类潜在福利的关键。有待分析的是潜力为什么会没有实现，以及在大多数技术对每个人都是可得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真实世界的差距与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模型建构中的差距是平行的。

新古典理论并没有直接研究增长本身的问题。然而，根据该理论的基本假定，假定增长问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倒是合理的(尽管增长率可能会变化)。由于产出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的，我们可以在新古典世界通过对那些边际报酬率最高的项目进行投资，以增加资本存量来获取最高的边际报酬率。在增长的因素中没有一个是固定的，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投资来克服资源稀缺性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新知识的投资以克服那些潜在固定要素，来克服其他任何的稀缺性。但是，可以肯定，如上所述，这一新古典公式已回避了所有有趣的问题。为了完全摆出这一问题，近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建立在报酬递增(Romer, 1986)及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Lucas, 1988)的基础上。然而，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鲍莫的研究(1986年)曾暗含地得出了这一结论。他发现，只在16个发达国家有趋同现象(他们大多具有类似的激励结构)，但是集中计划经济及欠发达国家都没有这种趋同(他们显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结构)。为了试图解释不同的历史经验以及

当今的发达经济、集中计划经济与欠发达经济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

在另一个极端，是马克思主义模型和那些起初曾受马克思主义模型启发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这些模型确实主要取决于对制度的考虑。不管是帝国主义论、依附论，还是中心/外围论都认为，正是制度构架导致了剥削和不公平的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式。这些模型所描述的制度与激励、选择及其结果的可信关系是与本研究的观点一致的。而且由于人类大多数经济史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时与其不平等的谈判力量作斗争的故事，如果这类最大化活动常常不以牺牲他人为前提，那倒是令人惊奇了。确实，这一研究的中心议题是，人们在用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时会碰到哪些问题。交换结构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反映了人们在获得资源、资本、信息上的不平等，因而对每个游戏参与者产生了非常不均等的结果。剥削模型只有在论证了制度框架确实产生了理论所暗含的系统的不平均的结果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无论是新古典模型还是剥削模型，都受财富最大化游戏者所驾驭，因而它们也由制度激励结构所决定。这里的差别是，前者暗含的制度结构产生了有效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它受报酬递增或资本积累及增长所驱使；而在后者，帝国主义国家或核心国经济的增长却是由一种靠剥削依附国或边缘经济的制度结构所致。由于历史上和当今经济中都存在大量的关于经济处于成长、停滞或衰退的例子，对那些决定绩效的制度特征的分析就是有价值的。有效的市场是由什么构成

的？如果贫穷国家的贫困是由于它们的制度结构妨碍了增长，那么，其制度结构是由外生强加的还是内生决定的，或是两者的某些组合？对制度的系统研究应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尤其要开发关于这类经济的交易与转化成本的实证资料，然后回顾这些成本的制度起源。在第8章，我对美国住房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和它所依赖的制度进行了简单的检验，在那一章我也简要论述了第三世界经济中交易和转化成本极为高昂。但是，对一些特性(如得到所需部件或一部电话的时间长度)都还只是描述性的。我们还必须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识别使经济变得非生产性的成本及相应的制度，然后，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些制度的源泉。

3

在这个结论性的章节，我想论证一下在本章及前几章已提出的问题。我相信这一分析框架已对其中某些问题做出了回答，并提供了回答那些未解决问题的承诺，尽管它还不能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已进展到了哪一步。

激励是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它们内含于我们已利用的理论中，且假定具有特定的形式和效果。应该将激励置于它应有的位置来研究，即它是经济绩效的关键。在前面章节发展的中心论点是，激励曾随时间而变化，且现在仍然如此。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去，只是从另一个

方向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强调，但这并没有放弃已经发展起来的理论工具。这一强调有必要修正理性的概念和含义，将思想和意识形态整合到我们的分析中去，明确研究政治和经济市场运作中的交易成本，以及理解在经济史演进中路线依赖性的结果。同时，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基础工具和由一代计量学家所发展的复杂的数量技术将继续作为我们分析工具的一部分。这一方法会使我们的观点和经济史的著作有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通过美国经济史来描述。

将制度分析引入理论框架时，英国的制度遗产和为创建殖民经济所需的思想，以及作为那一时代特征的相对有效的市场，都具有实质的重要性。由此所形成的用于考虑相应机会的组织(种植园主、商人、造船企业、家庭农场)产生了一个繁荣的殖民经济。遗产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和思想上的——市镇会议和自治政府、殖民集会、以及从胡布斯和洛克那里继承的思想传统。它们实质上是将 1763—1789 年的事件整合到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故事中去了。这些组织由新兴独立国的制度结构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观观念所驾驭。尽管我们已理解了政治与思想潮流的重要性，但制度框架可以将分析从某一具体的描述转向一个整体的故事，这将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期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19 世纪的美国经济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是什么使得环境变得有利，这往往使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检验宪法的结果、法的演进以及边疆的作用、本土出生的国民和移民的态度和社会中其他影响激励的特征。事实上，正是制度矩阵的的效特征(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制约都内含于态度和价值中)形成了一个对组织的生产活动

和其技能与知识的发展给以报偿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那么，这一矩阵的确切实质是什么，是什么创造了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和灵活的反应，以及什么是其他目标的偶然副产品，这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更深刻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也要对增长中须支付的成本给予重视。这些成本中有部分是为适应性效率支付的代价。这一体制清除掉了失败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在边疆破落的农民和失败的船运企业主。因为我们在船运方面失去了比较优势；遭受失业的劳工以及在 1850 年代由移民的竞争所导致的工资下降。不过，这些成本中还有部分是个人和团体所利用的制度的结果——印第安人、奴隶、移民、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更优越的谈判力量中受益。简言之，无论是增长的源泉还是在该增长中必须支付的成本，都是该制度框架的共同衍生物。

政治框架使得失败者能从那些引起他们不幸的来源中获得补偿，尽管这一补偿是不完全的。这些可观察的来源由现行的思想传统和行动者的意识形态中分离出的可观察部分组成。农民常常能看到铁路商或稻谷商对他们进行的价格歧视，贫民党的纲领则反映了整个意识形态观点，如关于黄金标准的可察负担、普遍的垄断以及银行家的致命后果。如果不理解这些知识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抵抗运动和这一时期的政策描述。

不理解它们，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由这些运动所致的政治和经济变迁的方向。不管由 19 世纪不满所产生的农民运动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农民的观念是重要的，而且它导致了政治与经济制度框架的变迁。

但是，不仅农民的观念是重要的，其他组织的行动者的

主观主义模型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制度矩阵的结果。高等法院是否理解“穆伦对伊利诺宜斯案”的意义，以及其他许多法院的决定是否逐渐改变了法律框架，这取决于对现存法律的结果所作的信息反馈是否准确，因而是否给予了它们真实的模型。不管它们是对还是错，它们在模型中的作用确实逐渐改变了司法框架。

制度分析对美国经济史的全部贡献，就在于它能使整个历史成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有时它甚至使计量史失宠。这一历史的许多部分是简单地依赖路线的，现行的制度特征来自于过去对现行选择集合所施加的限制，因而也使得现行的选择建立在可以理解的基础上。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特征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路线依赖性的更为基本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组织作用的增强提供了一个制度矩阵或系统的外部性；报酬递增的其他来源也为美国经济史提供了一些明确的特征。但是，组织也诱发了渐进性变迁，稳定与渐进变迁的混合使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和更满意的解释。

4

我将通过对经济史中的核心问题的思索来结束本研究。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那么有效的制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很显然，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所存在的更具生产性的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制度的绩效特征的较低信息成本，为变革那些运行不佳的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东欧社会于1989年

发生的巨变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能否对那些推动这类变迁的力量作一个一般概括呢？它们是怎样妨碍一个特定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特征的呢？我相信，前面的分析为揭示经济制度矩阵中的两个相关特征：即非正规制约及内含于政治进程中的交易费用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观点。

非正规制约源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来源于用于解决具体交换问题的正规规则的延拓与应用，也来自于解决简单协作问题的方案。总起来讲，它们对制度结构具有普遍的影响。有些有效的传统(如勤劳、诚实、正直)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且能使复杂的生产交换成为可能，而这些传统往往又为支撑这些态度的意识形态所进一步巩固下来。那么这些态度和意识形态又源自于哪里？它们是怎样变迁的？行动者的主观观念不仅是由文化派生的，而且经受了实践的不断修正，而实践又是由现存的(由文化决定的)精神构想过滤出来的。因此，相对价格的根本变迁将最终改变伦理和意识形态。信息成本越低，这一转变就越迅速。

我们在第12章的一个主要论题是，交易的成本即使在那些最完全的政治市场中也是相当高昂的。这就使得政治行动者在作选择时常常具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不管现代美国政治舞台上有关国会议员在选民制约下的自由度有多大的委托代理争论的结果如何(Kalt and Zupan, 1984)，但事实上，无论是历史上的政治行动者，还是第三世界和东欧的政治团体，他们受选民利益的制约却很小。在某些情形下，政治家要承担组织的成本及提供实施一个有约束力的承诺的法律框架。这可能促进了那些会进行更为根本的经济变迁的团体的

形成。这里的关键是，政治家的激励导向可能使那些愿意承担变迁的选民比其他选民更为重要。这样，政治行动者就处于能进行更为根本的变迁的地位。³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特征同前面讨论的美国 17 世纪的政治变迁连结起来。在与巴里·温格斯特合作的最近一篇论文中(North and Weingast, 1989)，我们坚持认为，作为光荣革命结果的英国政体的根本变迁，是影响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些事件可概括如下：17 世纪初叶，斯图亚特王朝不断发生的财政危机，迫使他们采取强迫贷款、出售垄断权以及从事大量出租那些不甚稳定的产权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财富)。保守党和共同法法院与王权进行了不断的斗争，这最终导致内战，随之是进行了几次有关可选政治制度的失败试验。君主制度于 1660 年恢复，但其结果是斯图亚特的财政特权再度发生政治斗争，最终使得国王被废黜。革命者已寻求解决王朝仲裁权和没收权利的控制问题，‘确立了议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财政事务开始集中由(议会)控制，皇家特权被废除，司法独立(至少是从国王那里获得独立)，以及普遍法法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主要结果是使产权更加稳定。

这些变迁的最显著结果是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继光荣革命之后，不仅政府在经济上变得有偿付能力，而且其所获得的资金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是在这 9 年里(1668-1677 年)，政府的借入资金增加到一个量级。出借者供应资金意愿的急剧变化反映出的一个明确概念是政府会信守协议。

1694 年英格兰银行作为一种中间公共借款机构的建

立，也使它能承担私人业务。大量其他银行也在这时开始营业。一批范围广泛的稳定的和有谈判力的机构也于 18 世纪初形成，而且私人信贷的利率也大致与公共信贷利率平行。

产权的稳定和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是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也是其取得政治霸权和最终主宰世界的基本因素。英国如果没能金融革命就不可能打败法国(Dickson, 1967)；1668-1677 年信贷的增长使得英国资金增加，这是英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取得成功以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1703-1714 年)英国形成主宰世界的主要力量的必要条件。

我们是否可以将英国的兴起归功于政治斗争以及议会的最终胜利呢？这确实是英国人成功的最接近的源泉和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议论，如果斯图亚特获胜，英国是否会步大陆国家之后尘？如果将英国产权和普通法的基本力量对皇家行为的影响给予更大权重的考虑，就可能会给出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答案。回顾一下在第 12 章对路线依赖性的讨论，在那里谈到，英国人的社会态度和伦理显然不同于那些大陆国家，那么，非正规制约对 17 世纪的事件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政治家的主观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作出了使革命是非正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函数的选择呢？我们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得出非正规制约有助于正规规则的变迁这一点还是可能的，支持这一内容的最好证据是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当正规规则因与现存的非正规制约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紧张状态将会导致长期的政治不稳定。

一个政体所获得的有效制度，已为创立和实施有效的产

权创造了激励，但是它很难甚至不可能去给那些不受其他观念约束的由财富最大化的行动者所组成的政治团体模型化。在公共选择文献中发展的关于政治团体的经济模型使得国家就像黑手党那样的组织或像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一样，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模型中，国家就成了一个再分配财富和收入的机器。现在我们去超前考察国家的这些特征，但是传统的公共选择文献所做的还远未实现他们所声称的目标，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故事。非正规制约是重要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由文化衍生的伦理行为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正规规则发生相互作用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不会有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注 释

- ① 参见North, "Is It Worth Making Sense of Marx?" (1986), 载于Jon Elster 的 *Making Sense of Marx* 的专题讨论中, 还可参见 N. Rosenberg, "Karl Marx and the Economic Role of Science" (1974).
- ② 不过, 要注明的是, 意识形态在本书的制度模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意识形态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然而,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乌托邦社会有关意识形态的大量证据表明, 它作为一种初始力量在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缔造革命领袖或诱发人们行动方面是十分有力的, 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 随着它背离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来源时, 它的作用会不断减弱, 东欧近来发生的事件就表明了

这一点。

- ③ 罗伯特·贝茨近来对肯尼亚Mau-Mau政变独立以来的政治经济研究(1989)为这一论点提供了饶有兴趣的经济内容。我必须一提的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 ④ 这一特征无疑像Whing史，但事实上它是反映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的动机比国王更为纯粹，即使他们对社会演变有远见。

参 考 文 献

- Akerlof,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488-500.
-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211-221.
- Arthur, W. Brian. 1988.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 In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and David Pines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 116-131.
- Axelrod, Robert.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6.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095-1111.
- Barbour, Violet. 1950.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artzel, Yorma. 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87-110.
- 1982.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Jour-*

-
- 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27-48.
-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tes, Robert H. 1987.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Rural Ken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mol, William J.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 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072-1085.
- Becker, Gary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 493-517.
-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72-399.
- and George Stigler. 1977.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76-90.
- Boyd, R. and P. J. Richerson. 1985.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arstensen, V. (ed.). 1963.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Cavalli-Sforza, L. L. and M. W. Feldman. 1981. *Cultural Transmis-*

-
- 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ndler, Alfred. 1977.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und, Steven N. S. 1974.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 23-45.
-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53-71.
-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 86-405.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Coatsworth, John H. 1978. "Obstacles to Economic Growth in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3: 80-100.
- Colson, Elizabeth. 1974. *Tradition and Contract: The Problem of Order*. Chicago: Adeline.
- David, Paul. 1975.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332-337.
-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msetz, Harold. 1988. "The Theory of the Firm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4: 141-162.
- De Roover, Florence E. 1945. "Early Examples of Marine

- Insur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 172-200.
- De Soto, Hernando.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Row.
- De Vries, Jan. 1976. *The Economy in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Peter G. M. 1976.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St. Martin's.
- Eggertsson, Thrainn.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ickson, Robert. 1986. "Of Coase and Cattle: Dispute Resolution Among Neighbors in Shasta County." *Stanford Law Review*, 38: 624-687.
1987. "A Critique of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ocial Control."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6: 67-100.
- Ellickson, Robert. Forthcoming. *Order Without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Pritchard, E. 1940.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gel, Robert. 1989.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New York: Norton.
- Frank, Robert H. 1987. "If Homo Economicus Could Choose His Own Utility Function Would He Want One with a Con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593-604.
1988.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
- Fuchs, Victor. 1983. *How We Live: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From Birth to Dea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9. "Suq: *The Bazaar Economy in Sejrrou*." In C. Geertz, H. Geertz and L. Rosen, *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H. Geertz, and L. Rosen, 1979. *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wity Press.
- Glade, William P. 1969.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A Study of Their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New York: American Book.
- Goldberg, Victor. 1976.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426-428.
- Hahn, F. H. 1987. "Information, Dynamics and Equilibriu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321-334.
- Hardin, Russell.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rgreves-Heap, Shaun. 1989.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Blackwell.
- Hashimoto, Masanori. 1979. "Bonus-Payments, On-The-Job Training and Lifetime Employment in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1086-1104.
-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vi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r, Ronald. 1983. "The Origins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560-595.
- .1986. "Imperfect Decisions and the Law: On the Evolution of Legal Precedent and Ruel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5: 227-262.

-
- Herrnstein, Richard. 1988. "A Behavioral Alternative to Utility Maximization." In S. Maital (ed.), *Applied Behavioral Economics*, Volume 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irshleifer, Jack. 1987. *Economic Behavior in Ad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ffman, Elizabeth and Matthew L. Spitzer. 1985. "Entitlements, Rights and Fairness: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4: 259-298.
- Hogarth, R., and M. Rader (eds.). 1986.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supplement).
- Holmstrom, Bengt.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74-91.
- Hughes, J. R. T. 1987. "The Great Land Ordinances." In D. K. Klingaman and R. Vedder (eds.), *Essays on the Old Northwes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M. and W.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 Johansson, S. Ryan. 1988. "The Computer Paradigm and the Role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Social Systems." *Historical Methods*, 21: 172-188.
- Kahneman, D., J. L. Knetsch and R. H. Thaler. 1986. "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 In Robin M. Hogarth and Melvin W. Ra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supplement), 59: S285-S300.
- Kalt, Joseph P. and Mark A. Zupan. 1984. "Capture and Ideology in

-
-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279-300.
- Klein, Benjamin and Keith Leffler. 1981.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ssuring Contractu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615-641.
- Knight, Frank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Kreps, David. Forthcoming.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caster, K. 1966.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132-157.
- Libecap, Gary D. 1989. *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teven N. Wiggins. 1985.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Contractual Failure on Regulation: The Case of Oil Field Unit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690-714.
- Lopez, Robert S. and Irving W. Raymond. 1955.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ucas, Robert E., Jr. 1986. "Adaptive Behavior and Economic Theory." In Robin M. 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supplement), 59: S401-S426.
- .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
- Macfuriene, Alan.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Blackwell.
- Machina, Mark. 1987.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Problem Solved and Unsolv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121-154.
- Marglin, Stephen. 1974. "What Do Bosses D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6: 33-60.
- Margolis, Howard. 1982. *Selishness, Altruism and Rationality: A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grom, Paul R., 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W.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1-23.
- Miller, Gary. Forthcoming.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William. 1969. *An Essay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Law Merchant*. New York: Burt Franklin Press.
- Nelson, Douglas and Eugene Silberberg. 1987. "Ideology and Legislator Shirking." *Economic Inquiry*, 25: 15-25.
- Nelson, Richard. Forthcoming. "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 *Research Policy*.
- and Sidney G.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55. "Location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243-258.
- .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 Norton.
- .1984." Government and the Cost of Ex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255-64.
- .1986." Is It Worth Making Sense of Marx?" *Inquiry*, 29: 57-264.
- .Forthcoming."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Andrew Ritten. 1987."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D. Klingaman and R. Vedder (eds.), *Essays on the Old Northwes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Barry W. Weignast. 1989."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803-832.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86." 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Public Choice*, 48: 3-25.
- Ostrom, Vincent. 1971.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 Compound Republic: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s Presented in the Federalist*. Blacksburg, VA: VPI,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 Pelikan, Pavel. 1987." The Forma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In Stefan Hedlund (ed.), *Incentive and*

-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lott, Charles R. 1986. "Rational Choice in Experimental Markets." In Robin M. 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supplement), 59: S301-S328.
- Polanyi, M. 1967.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Anchor.
- Posner, Richard A. 1980. "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w."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1-53.
- Riker, William H. 1976. "Comments on Vincent Ostrom's Paper." *Public Choice*, 27: 13-15.
-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8.
- Rosenberg, Nathan. 1972.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 . 1974. "Karl Marx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713-728.
- . 1976.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mookler, J. 1957. "Inventors Past and Pres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321-333.
- Schofield, Norman. 1985. "Anarchy,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A Review."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 207-219.
- Schumpeter, Joseph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54.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4: 5-38.
- Scrutton, Thomas Edward, 1891. *The Elements of Mercantile Law*. London: W. Clowes.
- Sheehan, S. 1973. "Peas." *The New Yorker*, 49: 103-118.
- Shepard, Andrea. 1987. "Licensing to Enhance Demand for New Technologi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8: 360-368.
- Shepsle, Kenneth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Herbert Weisbe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1989. "The Changing Textbook Congress." In John E. Chubb and Paul E. Peterson (eds.), *Can the Government Gover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and Barry W. Weingast, 1987.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mitte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85-104.
- Simon, Herbert. 1986.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Robin M. 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Supplement), 59: S209-S224.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koloff, Kenneth L. 1988. "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 1790-184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813-850.
- Stubbs, William, 1896.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
-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ugden, Robert. 1986.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 Taylor, Michael. 1982.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cy, James D. 1985. *A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Hapsburg Netherlands: Renten and Renteniers in the County of Hol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Udovitch, Abraham. 1962. "At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Commenda: Islam, Israel, Byzantium?" *Speculum*, 37: 198-207.
- Veitch, John. 1986. "Repudiations and Confiscations by the medieval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31-36.
- Veliz, Claudio. 1980. *The Centralist Tradition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lis, John J. and Douglass C. North. 1986.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 L. Engerman and R.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tts, R. L. and J. L. Zimmerman. 1983.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613-633.
- Weingast, Barry W. and William Marshall. 1988. "The Industrial Or-

ganization of Congress; or, Why Legislatures, Like Firms, Are Not Organized as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132-163.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inter, Sidney G. 1986." Comments on Arrow and on Lucas." In Robin M. Hograth and Melvin W. Reder (eds.),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supplement), 59: S427-S434.

Yamey, B. S. 1949." Scientifi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1: 99-113.